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老師：曾士榮教授



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誕生  
暨陳逢源個案研究

研究生：藍士博

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 謝辭

論文的完成，學業生涯暫時得以告一階段，首先要感謝我的父母，他們容許我在校園中自由遊走，而將生活的重擔扛在肩上。感謝他們的寬容與理解，讓我直到今天仍然走在知識的道路上。

指導教授曾士榮老師對於我研究論文與生活方面的提攜、關心，我永遠放在心裡。另外也要謝謝兩位口試委員蕭阿勤、張文薰教授對於本論文的認真閱讀與精彩評析，提供了本論文許多修正與後續發展的方向。黃美娥老師當初對於我們課業的要求，以及後來在陳培豐老師研究室的短暫工作經驗，也都直接地影響了本論文的完成，必須特別地表示謝意。

我是一個幸運的人，生命中遇到不少貴人、許多照顧我的老師。國中時期的陳莉娟老師、專科時期的李淑媛老師、康榮吉老師、王萬儀老師，他們啟蒙了我對台灣文學、中國古典文學、文學概論的興趣，改變了我的一生，我始終記得他們賜於我的一切。

大學時期受教於台大中文系，同時也在歷史系的課程中得到滋養，研究所時期受益於政治大學與台灣大學，在台灣文學所、台灣史研究所與社會學研究所中摸索自己的研究興趣與方向。在此，謹向所有我曾經就教過的師長、學長姐，以及一起學習的同學、學弟妹們表示謝意。

幾年來在各方面受益於人者太多，請原諒我在此以組織名稱向眾人致謝。這些單位分別是：台灣大學濁水溪社、TWLS 台灣文學研究討論會、覺教室文理補習班、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獨立台灣會、台灣教授協會。我不僅在當中結識了許多摯交好友，也從而得到不少工作經驗、待人處世的道理，他們在學術之外填補了我的生活，讓我的生命圓滿。

最後，讓我向與我一起走過五年研究所生涯的俐茹致謝。我想妳知道，我是多麼懷念當初深夜與妳走在貓兒巷的時光。

國際新城 2011.10.03

## 中文摘要

本論文嘗試結合印刷媒體與世代這兩項過去在台灣文學研究中分別獨立的研究範疇，以印刷媒體世代的概念對應以往將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知識社群區分為「傳統文人」或「知識份子」的研究傾向。一方面回頭檢視過去台灣文學研究對於世代概念的引用延伸概況，另一方面也透過卡爾·曼海姆的世代理論，重新檢視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人是如何透過現代印刷媒體的引進，促成一個文化世代的萌芽與成形。日治時期台灣地區在活字印刷媒體的影響下，形成了一個有別於過去的「文化重疊地域」，印刷品輸入的多源性特質創造了台灣文化的多向性特徵。自此以降，台灣文化菁英與印刷媒體刊物之間的關係愈形緊密，而過去所缺乏的「同時性」與「現實性」認知也越趨明顯，讓這些台灣人在共同參與印刷媒體刊物運作下而形成一個台灣歷史當中的特殊世代。本文在此將之定義為「印刷媒體世代」，進而以個案陳逢源來檢視上述論述的適切性，與未來後續研究運用上的可行性。

關鍵字：傳統文人、知識份子、印刷媒體世代、陳逢源

##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develop a new concept, the Taiwanese Print Media Generation, through integrating two separate research fields, the print media and the theory of generation. The aims of the new approach are twofold: first, to challenge a common conceptual usage of dividing the Taiwanese intelligentsia into “the traditional literati” and “the intellectuals;” second, to reexamine how did the colonial Taiwanese contribute to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a specific generation through introducing modern print media. This dissertation will argue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print media, a “cross-cultural field” was formed in the colonial Taiwan. Various sources of publications have created diverse characters of Taiwanese culture. Since then, after recognizing the need for an instant system that transfers information of the reality, Taiwanese cultural elites and the print media developed into a tightened relationship. This relationship eventually created a special generation of, as this dissertation defines, the “Taiwanese Print Media Generation.” Finally,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argument mentioned above in terms of its validity and applicability.

Keywords : the traditional literati, the intellectuals, the Print Media Generation

## 字詞說明

---

本論文為求一致，行文中一律使用「台」字。

本論文所使用的「台灣人」、「台灣民眾」等相關詞彙，雖然大多泛指當時居住在台灣(含澎湖)的所有人口。實際上，焦點卻似乎更集中於西部地區的漢人社會。論文中若有需要對島內不同種族、族群進行區隔，則再另外使用諸如「內地人」、「本島人」或者是「在台日本人」等符合當時歷史情境、當前研究論述的慣用詞語。



# 目錄

---

|  |    |
|--|----|
| <b>第一章 緒論</b> .....                          | 1  |
|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                            | 1  |
| 第二節、研究課題與前行研究之回顧 .....                       | 5  |
| 第三節、研究範疇與方法 .....                            | 26 |
| 第四節、論文章節提要 .....                             | 29 |
| <b>第二章 清帝國統治時期台灣社會發展與教育、出版情況</b> .....       | 33 |
| 第一節、從地方豪族到「士紳」(gentry) .....                 | 33 |
| 第二節、清帝國統治末期台灣社會文教系統的擴張 .....                 | 36 |
| 第三節、傳統儒學教育與公共空間的缺乏 .....                     | 40 |
| 第四節、小結 .....                                 | 45 |
| <b>第三章 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誕生</b> .....             | 46 |
| 第一節、帝國統合與傳統依存下的「世代位置」 .....                  | 46 |
| 第二節、「實存世代」的啟蒙意識與反抗行動 .....                   | 55 |
| 第三節、「世代單位」的分立、對抗、聯合 .....                    | 64 |
| 第四節、小結 .....                                 | 73 |
| <b>第四章 印刷媒體世代的個案研究：以陳逢源(1893-1982)為代表</b> .. | 75 |
| 第一節、陳逢源與印刷媒體刊物 .....                         | 75 |
| 第二節、啟蒙論述的提出 .....                            | 82 |
| 第三節、政治運動與政治論述 .....                          | 89 |
| 第四節、記者身份的回歸及其經濟論述的轉向 .....                   | 96 |

|                                    |     |
|------------------------------------|-----|
| 第五節、小結.....                        | 105 |
| 第五章 結論.....                        | 107 |
| 參考書目.....                          | 109 |
| 附錄：.....                           | 117 |
| 圖一：曼海姆的世代概念與理論示意圖.....             | 117 |
| 圖二：曼海姆概念下日治時期 1920 年代台灣印刷媒體世代..... | 117 |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論文嘗試結合印刷媒體(print media)、世代(generation)這兩項過去在台灣文學研究中被視為是各自獨立的知識範疇，提出「台灣印刷媒體世代」(the Taiwanese Print Media Generation)一詞回應既往將「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視為不同知識社群的研究傾向。透過關注日本統治時期印刷媒體在台灣傳播與生產現象，本論文嘗試在以往就反殖民主義與後殖民理論的政治層面之外，尋找另外一種觀看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不同視角。

以往學界大多習慣將日治時期台灣文化菁英(cultural elite)區分成「傳統文人」或「知識份子」，顧名思義，傳統文人強調的是對象本身具備的傳統漢文化特質，而知識份子則更著重於其在現代文化、啟蒙知識上的授受與傳播。然而，這兩個詞彙指涉的群體本身並非不存在模糊、難以辨識的灰色空間：尤有甚者，傳統文人或知識份子其實不論就閱讀書寫能力、文類或認同傾向等等，都存在著彼此重疊或隨著時間流轉替換的特殊現象。因此，本論文採取的無非是異中求同的策略，試圖在兩個過去被視作是不同台灣人社群中尋找他們共同的文化特徵，作為本論文的研究宗旨。

在本論文的論述當中，過去所謂的傳統文人或知識份子其實共同建構了所謂的印刷媒體世代。本論文以為：「印刷媒體世代」的誕生，來自於日本殖民統治以降，金屬活字印刷配合商業邏輯運作的印刷媒體組織及其刊物，不僅與前現代的刻版印刷刊物有所區別，更成為了當時台灣人普遍接受並實際參與運作的大眾傳播媒體。活字印刷媒體及其刊物不僅重構了台灣的文化場域，更刺激當時台灣社會集體認知、認同與公共空間的形成，造就印刷媒體世代的誕生。

提出印刷媒體世代這個概念，主要的考量在於：假如歷史的前提是人，那麼作為關於人的知識的歷史，便不只是僅僅企圖瞭解過去的時間，而更應該包括了人在過往歷史事實中所具有的功能與價值<sup>1</sup>。另外，本論文在時間層面的考量也並非只是政治上的朝代更迭，也與哈羅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的媒體分期論有關<sup>2</sup>。因為假如媒體的更迭轉換可以作為我們思考人類文明階段的主要依據，那麼台灣社會在日本統治時期、現代活字印刷技術引入以後，是否也改變了原本主要以刻版印刷刊物為主的文化場域？另外，那些同樣經歷甚至積極參與運作這個由刻版到活字印刷的台灣人士是否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殊相、亦或共相？又為何會在後來研究者的討論中被區分為所謂的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以及在那些論述中被一再地強化、鞏固，成為討論日治時期文化菁英社群的基本概念？

<sup>1</sup> 布洛克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台北：遠流，2004)，頁 32。

<sup>2</sup> 哈羅德·伊尼斯著，何道寬譯，《傳播的偏向》(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上述提問都是本論文企圖處理的課題，而更因為時代的變遷往往與世代的形成有所關連，所以如果我們相信印刷媒體變遷對於人類文明與文化的時代發展有著相當的影響力，那麼嘗試將媒體史研究從技術史層面(生產、發行、消費)予以抽離<sup>3</sup>，進而與偏向人類個體與群體的「世代」概念結合，一定程度上便有助於在既有研究成果的視角之外，另闢蹊徑地再次觀看日本統治時期下的台灣社會發展，也更有助於重新驗證社會學理論中關於行動(agency)與結構(structure)的兩個概念。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台灣社會旋即在當時行政長官公署與國民黨諸多派系的刺激下，配合當時許多積極參與的台籍人士一同建構出特別活絡的出版現象<sup>4</sup>。這一波自終戰起便蓬勃發展的出版現象，意味了在日本統治期間的台灣社會當中，應該已經具備一定數量懂得如何經營、參與印刷媒體組織運作的專業人士。不過，由於後來 228 事件及國民黨政府迫遷來台後採取的一連串管制措施，造成台灣人在戰後逐漸退出印刷媒體產業的相關運作，從而也讓日治時期台灣人參與印刷媒體的經驗成為一段特殊的歷史，進而讓這批具備參與印刷媒體產業經驗的台灣人形成了相當程度的世代特徵。

早在明鄭、清領時期以來，台灣便有印刷媒體刊物的生產與流通，同時在清領末期也亦有傳教士發行以現代印刷技術刊行的報刊<sup>5</sup>。然而在受到社會型態、地理環境與交通條件等的限制下，台灣地區沒辦法形成一個共同的社會，也無法產生明顯的世代特徵。換言之，即便日本統治以前台灣民眾便存在著閱讀印刷媒體刊物的生活習慣，但是不論在書籍的印刷方式、內容與流通路徑等方面，日治時期的台灣印刷媒體產業發展都與清帝國時期有著極大的不同。殖民地現代化與傳統教育體制的雙軌並行、日系印刷資本與漢文報刊的出版、以日文書寫或翻譯的現代啟蒙讀物等等，都對台灣社會、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形成產生不小的影響。因此，當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與之前明顯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徵，那麼具備日本殖民經驗的台灣人士在文化層面上是否也可能因而產生與過去不同的「世代」區隔？就成為了本論文所企圖證成的焦點。

藉由提出印刷媒體世代這個概念，本論文一定程度上也是企圖回應以往所謂將日治時期台灣文化菁英區分為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的界定方式。所謂的文化菁英，往往意指在社會上具備文化資本的特定人士。事實上，文化菁英一詞經常與

<sup>3</sup> 弗雷德里克·巴爾比耶、卡特琳娜·貝爾托·拉維尼爾著，施婉麗、徐豔、俞佳樂譯，《從狄德羅到因特網：法國傳媒史》(上海：世紀出版，2009)，頁 4。

<sup>4</sup> 徐秀慧，《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台北：國立編譯館主編，2007)，頁 108。

<sup>5</sup> 1888 年，台灣於劉銘傳時期曾發行過《邸抄》，可謂為台灣最早的中文報紙。然而倘若就研究者所言，其刊期、型態、內容、印刷方式、傳送對象、分送對象等各方面皆與今日所稱之報紙有差距的話，則本論文所討論的印刷媒體源流，還是必須上推至由巴克禮所發行的《台灣府城教會報》。莊永明，〈台灣第一架新式印刷機〉，《聯合報》1983.10.25，第 8 版。另外也可以參考陳慕真，《台語白話字書寫中 e 文明觀——以《台灣府城教會報》(1885-1942)為中心》(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

知識份子、傳統文人、社會領導階層混用，一定程度上來自於封建社會經濟資本、政治資本與文化資本緊密扣連的社會特徵。

陳世榮在研究中引用 Joseph Esherick 與 Mary Rankin 對於地方菁英的定義，認為「地方菁英」必須是在身份、社會地位、財富不同於一般人，且個人或家族能在地方社會中利用各種策略建構支配能力、發揮影響力者<sup>6</sup>。對於政治學研究來說，地方菁英指的是中央政權與地方庶民之間的中介，卻未能詳細區分他們所掌握的資本類型。但是，一旦我們回顧四百年來漢人移民開拓史的歷程，卻會發現清領時期的地方菁英，那些台灣頭人、鄉紳們往往是在取得經濟資本之後，更進一步爭取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在各方面都處在有利的位置上。

於是，地方菁英究竟是在何時、什麼條件下開始分化，進而成為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菁英？便也是本論文試圖觸碰的課題之一。以往的台灣文學研究經常強調知識份子的左右翼知識光譜，或者是傳統文人的世代差異，似乎忽略了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究竟何以被如此區分？以及，在強調他們就認識論上的差異之際，是否可能也會因此而忽略了他們同時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同時性特徵？

本論文以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世代理論，重新檢視前行研究在涉及世代議題上的操作模式，並且意識到：社會大眾一向大多將「世代」視為因同時期出生、生物年齡相同或相近、具有類似社會特徵，或共同經歷、參與某種歷史經驗的人群<sup>7</sup>。然而，就曼海姆的觀點，世代其實並非那種因為血緣、部落等關係而形成的具體團體的社會連帶。相反地，而是他們剛好在社會中處在相同的「世代位置」(附錄：[圖一] 曼海姆的世代概念與理論示意圖)；這個世代位置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與時代動蕩有所關連，而這些身處在相同世代位置的世代成員，則一方面組成了不同的世代單位<sup>8</sup>，同時也在他們彼此的互動關係當中，造就了一個「實存世代」(a generation as an actuality; an actual generation)的存在與影響。

是故，透過世代位置、實存世代與世代單位的論述推演，可能可以推測過去那些被視為是不同知識社群的台灣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其實都是在共享相同文化場域與殖民地社會的氛圍下，屬於同一世代位置中的不同世代單位。至少我們從這些台灣人逐漸地由本來的接受、間接參與印刷媒體刊物，到後來主動積極的成立屬於他們自己的印刷媒體刊物、發展具備主體意識的公共輿論、創造公共空間的歷史過程，就可以發現這個集體現象不僅契合曼海姆所說的：「世代」不該強調生物學上的相近特徵，更應該是同一社會的經驗共通性的這個條件。另外，也同樣吻合世代概念強調的是他們藉由意向、行為逐漸地由一個「自在世代」(generation in-itself)變成「自為世代」(generation for-itself)的說法。

<sup>6</sup> 陳世榮，〈社會菁英：國家與地方社會間的另一股力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4期，(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頁 136。

<sup>7</sup>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頁 15。

<sup>8</sup> 蕭阿勤，《回歸現實》，頁 18-19。

首先，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不在於討論誰應該、或誰不應該被歸類在所謂的「印刷媒體世代」；相反地，本論文所企圖處理的是透過日治時期印刷媒體在台灣的傳播現象，思考其對於台灣人社群所產生的具體影響。本論文的假設是，利用印刷媒體世代這個概念有助於觀察殖民地統治下台灣人接受書籍報刊的實際狀況；以及理解他們如何間接或直接地介入印刷媒體刊物的生產關係，尤有甚者，更進一步地從一個集體的歷史經驗當中，發掘一個可以被辨識出來的世代特徵<sup>9</sup>。

在曼海姆的概念下，那些同樣受到日本殖民統治、接受或參與了印刷媒體運作發行的台灣民眾，應該不只是身處在相同的世代位置，也隸屬於一個實存世代當中。實存世代中其實往往存在著不同的世代單位，但是不同世代單位所各別具備的差異，卻又經常引發後續研究的區別與褒貶。是故，本論文嘗試「異中求同」地將過去在研究中被視為是不同社會群體的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利用世代理論重新檢視當時台灣民眾與印刷媒體刊物之間的授受關係；另外，更配合日治時期台灣閩人陳逢源(1893-1982)的生命經歷作為個案，探索日治時期台灣人在活字印刷媒體傳播影響下所形成的，異於清帝國統治時期的社會現象與時代、世代特徵。

陳逢源當然不是唯一適合本論文論述架構的代表性人物，但是「社會結構所連結的，並不是有名有姓的個人，而是任何一個佔據了由社會關係所指定位置的人。<sup>10</sup>」所以，本論文之所以選擇陳逢源作為研究個案，首先不單單因為他在既往的研究中曾經分別被賦予過知識份子或傳統文人的身份定位；更也在研究中曾經與「世代」理論有所連結。

陳逢源的生命經驗跨越了整個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社會，壯年時期更參與了台灣民族社會運動、歷經治警事件、滿洲事變、日華戰爭、太平洋戰爭、皇民化運動等。透過其書房教育與國語學校的教育經歷，可以體會兩種源自清帝國與日本帝國的教育體制，如何作用在台灣民眾的生活與精神意識；透過陳逢源至今仍保存在傅斯年圖書館中的藏書，以及自年少起便投稿於報刊雜誌、後來擔任《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記者的政經時論，也都有助於理解日治時期台灣人與印刷媒體刊物之間的接受、生產關係，以及探索台灣人究竟是如何從被動接受印刷媒體的自在世代，逐漸轉型為積極行動的自為世代。

總而言之，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在於企圖結合印刷媒體與世代這兩個以往被視為是不同領域的知識範疇；在過去所謂知識份子或傳統文人的身份界定之外，以印刷媒體世代的角度的關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由被動接受到主動介入印刷媒體組織運作、刊物發行的歷史過程，並且從中尋找在反殖民、後殖民論述外的其他歷史意涵與精神價值。

---

<sup>9</sup> 本論文在此尚且無力處理世代成員在數量上的規模大小，一定程度上來自於目前並無日治時期識字人口的統計估算，再加上，日文與漢文習用人口亦有重疊，不易取得正確數量。

<sup>10</sup> 萬毓澤，〈第二版導論〉，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21。

## 第二節、研究課題與前行研究之回顧

### 一、印刷媒體(print media)與媒介(media)

媒體的字源是拉丁文 medium，意指「介於中間，在中間運作」的無機詞彙，後來才在時間的演變中逐漸成為報紙、電影、廣播等大眾傳播的指稱，成為具有「將發送者(sender)的訊息(message)傳送給接受者(receiver)的工具」<sup>11</sup>。活字印刷術雖然較早在中國由畢昇所發明<sup>12</sup>，但是當前出版業所承襲的現代印刷科技，卻來自於西方因為宗教革命與商業發展、民族國家興起等要素影響下逐漸擴大的印刷產業，甚至於主導了往後幾百年間世界知識生產傳播與複製的流程<sup>13</sup>。目前關於印刷媒體的研究往往駐足在新聞或大眾傳播學系，至於本論文所指的印刷媒體，則包括了源自中國的木刻雕版印刷、以及由古騰堡(Gutenberg)在 15 世紀歐洲所發明的活字印刷術二者所生產的印刷刊物。

由於印刷媒體存在著複製資訊、知識，增加空間流通性與延長資訊保存期限等功能，所以也具備著凝聚讀者共識與向心力的效用。因此，如果印刷媒體本身存在著中國與歐洲這兩種不同的型態<sup>14</sup>，則台灣從 19 世紀的清帝國統治時期到日本帝國統治的過程，也就代表了兩種不同印刷媒體型態的轉換、變遷與並存，同時也意味著存在同時具備兩種印刷媒體閱讀、出版經驗的台灣人的存在。

關於台灣印刷媒體的發展歷程，不論是官方出版的歷史論述或民間學人的相關研究都提供了一條相當關鍵的線索，這不僅證實清領時期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書籍流通情況，同時也對台灣島內的刻版印刷也有相當程度的描述<sup>15</sup>。至於有關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發展方面，除了石原幸作早在 1928 年就撰寫《台灣日日新報三十年史》外，戰後關於日治時期台灣報刊發展方面的研究，則往往散見於個人的口述訪談或回憶錄中<sup>16</sup>，或者出現在學院與公家單位的學位論文或出版品<sup>17</sup>。

<sup>11</sup> 吉見俊哉，蘇碩斌譯，《媒介文化論：給媒介學習者的 15 課》(台北：群學，2009)，頁 5。

<sup>12</sup> 如果按照奎娜爾的說法，則中國在活字印刷術上與西方的不同處在於：首先，中國也曾經使用金屬活字作為印刷的工具。不過，有別於西方以澆鑄的方式鑄字，中國於十八世紀用來印刷《古今圖書集成》的銅質活字，是以直接鑿字於銅的方式作成。再者是，活字印刷必須使用大量的金屬、人工與存放活字的空間，進而讓刊刻的成本過於龐大；另外，中國慣用的墨汁也並不能直接轉換成印刷用的油墨；最後，同時也是本論文以為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在於，中國文字的書寫特質與文人雅士的閱讀習慣，未必可以接受一定程度上犧牲書法風格的金屬活字。可參考：費夫曼，馬爾坦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48-58。

<sup>13</sup> 可參考：約翰·曼著，樂為良譯，《古騰堡革命》(台北：商周出版，2004)。

<sup>14</sup> 錢存訓，〈印刷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功能〉，《中國書籍、紙墨及印刷史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2)。

<sup>15</sup> 如劉寧顏總纂，邱勝安等編纂，《重修台灣省通志》(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楊永智，《明清時期台南出版史》(台北：學生書局，2007)。楊永智，〈琅環有奇應得見：清代閩台地區漢詩傳播考述〉，《異時空下的同文詩寫：台灣古典詩與東亞各國的交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二)》，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台灣文學系合辦，2008 年 11 月 29-30 日。

<sup>16</sup>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台北：三民，1988)。

<sup>17</sup> 如：賴秀峰，《日據時代台灣雜誌事業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李明水，《台灣雜誌事業發展史 重修台灣省通志》(南投：台灣省政府，1986)。

包括洪桂己《台灣報業史的研究》<sup>18</sup>、王天濱《台灣新聞傳播史》<sup>19</sup>、《台灣報業史》<sup>20</sup>等不僅有助於本論文掌握台灣報刊通盤的發展脈絡，更有助於將報業與其它傳播媒體的實際發展作出橫向的比較。此外，李承機的博士論文《台灣近代メディア研究序説》則主要針對遭受殖民地支配統治下的台灣近代媒體的展開進行研究，同時亦對清領時期的台灣媒體發展進行概略性的爬梳<sup>21</sup>，亦為本論文撰寫過程的主要參考。

正因為日治時期台灣業已進入到所謂的印刷媒體時代，所以本論文試圖討論的印刷媒體世代才具備著討論的現實基礎。換言之，印刷媒體方面的前行研究讓本文得以瞭解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社會的出版現象，有助於在更進一步探索印刷媒體組織運作與刊物內容外，理解印刷媒體刊物與台灣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當中對於台灣人生命經驗的集體影響。

## 二、時代(Age)

本論文既然嘗試提出「印刷媒體世代」一詞，對於「世代」的討論及其相關定義便也是本論文在論述推演時所必須闡述的第一要點。誠如「歷史的世代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他們是被創造的。<sup>22</sup>」，所以「歷史的世代」固然是本論文嘗試討論的對象，但有關於「世代的歷史」與「時代」「世代」之間的差異、世代概念在本質與運用上的不同涵義、世代一詞在台灣社會中被使用的現況、被認識的歷程等等，都成為了本文首要處理的部分。

正因為歷史往往是人在時間推移下所持續活動的痕跡的記錄，而世代又與人、時間這兩項要素有著一定程度的關連。於是在討論世代之前，本文便也一併地將時代放入討論的對象當中。一般來說時代並非單純地指涉某一段物理時間，更多的時候是結合了政治、社會等其他要素進行定義、運用。台灣史的研究與討論當中，時代本身不單單被拿來區分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各個階段。受到觀點與立場的影響，時代本身在分期的斷線、定名以及是否存在著分期的必要性等等，都曾經在過往的討論中被提出來檢視。

目前台灣社會對於台灣歷史發展所慣用的分期方式，主要不脫以政治統治階段決定分期的主軸。因此，雖然「荷蘭—明鄭—清帝國—日本帝國—國民政府」的說法是當前台灣社會的彼此「共識」，但是不論在名詞的使用、時間斷限、以及歷史究竟是否存在著分期的必要性等等，都在坊間與學院中受到相當多的討論

<sup>18</sup> 洪桂己，《台灣報業史的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57)。

<sup>19</sup> 王天濱，《台灣新聞傳播史》(台北：亞太圖書，2002)。

<sup>20</sup> 王天濱，《台灣報業史》(台北：亞太圖書，2003)。

<sup>21</sup>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論文，2004)。

<sup>22</sup> “Historical generations are not born; they are made.” Rebert Wohl, *The Generation of 191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sup>23</sup>。首先，由於受到政治觀點的影響，時代命名在戰後的台灣史研究中出現明顯更替的現象。陳建宏利用台灣各大學歷史所的台灣史碩士論文名稱，針對歷史時代的名詞使用與當時環境背景進行了相當詳細的考察。研究成果顯示：台灣在1952-1982年的三十年間，不僅只有27篇關於台灣史研究的碩士論文，並且幾乎都以政權作為歷史分期的描述語、用「日據」來指涉日本統治時期下的台灣<sup>24</sup>；待到1983-1992年時，政權作為歷史分期描述語的方式雖然仍為學位論文名稱的主流，但是在歷史時期的描述上已產生較為細緻的質變(例如：清初、清季)；也開始出現諸如「日治」、「光復」等與上階段不同的用語。待至1993-2002年的階段，台灣學研究的數量不僅呈現出等比級數的成長趨勢，同時在歷史分期的名詞使用上也開始出現多元化的現象。首先，明確以政權作為歷史分期的論文已低於50%(第二個階段為55%)；再者是，名詞的使用上「日治」使用率逐年地向上攀升，與「戰後」一同取得近年來台灣歷史分期使用上的主導位置<sup>25</sup>。

上述種種現象顯示台灣史研究在政治方面已經逐漸採取了較為中性的標準；另一方面，非政治因素的分期方式也促使了台灣史研究的多元化與豐富化<sup>26</sup>。本論文之所以開始關注台灣印刷媒體發展以及世代問題，除了企圖排除過去以「政權更替」作為台灣歷史分期的既定現象外，也與哈羅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媒體分期論」的歷史認識論有著一定的關係<sup>27</sup>。

媒體分期論指的是伊尼斯利用媒體作為文明分期依據的概念。簡單來說：是將西方歷史區分成「文字」與「印刷」兩大階段。進一步的細緻區隔，則可以分作為：1.埃及文明，莎草紙與聖書文字；2.希臘—羅馬文明，拼音文字；3.中世紀時期，羊草紙和抄本；4.中國紙筆時期；5.印刷術初期；6.啟蒙時期，報紙的誕生；7.機器印刷時期，印刷術、鑄字機、鉛版、機制紙等；8.電影時期；9.廣播時期等9大階段<sup>28</sup>。因此，倘若本論文企圖強調印刷媒體發展變遷對於台灣人群體的共同影響，則或許在借用伊尼斯對人類文明發展的界定與論斷下，可以將

<sup>23</sup> 更重要的是，時代只是研究進行時所界定的時空環境，研究主體終究還是在其他的主體與領域之上。過去對於歷史時代的爭議往往在於時代年份上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另一方面，則是以政權為主要的分期方式也往往會受到「史觀」與「史識」的影響；尤有甚者，更是所謂歷史發展的連續或斷裂的複雜爭議。以「日治時期」為例，「日治」與「日據」的差別便來自於是否延用了國民黨政府的修辭與立場；又好比說，日治的起點究竟要以日軍佔領台北城，還是以進入台南、完全取得對台灣的控制為標準；再者是，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是否真的與清帝國統治或後來的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截然不同？都是歷史時期本身值得被深究的問題。

<sup>24</sup> 陳建宏，〈如何界定台灣的歷史分期：以台灣地區各大學歷史所的台灣史碩士論文為探討中心——1952-2002〉。收錄於《史匯 VII》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2003，頁209-221。該期刊當期尚有相關論文數篇，可茲參考。

<sup>25</sup> 陳建宏，〈如何界定台灣的歷史分期：以台灣地區各大學歷史所的台灣史碩士論文為探討中心——1952-2002〉。收錄於《史匯 VII》，頁213。

<sup>26</sup> 陳建宏，〈如何界定台灣的歷史分期：以台灣地區各大學歷史所的台灣史碩士論文為探討中心——1952-2002〉。收錄於《史匯 VII》，頁213。

<sup>27</sup> 即便本論文在命名上仍使用了以政權為主的名詞，但是主要還是考慮到：如果要在最快速的情況下讓讀者認知到本論文所聚焦的時空位置，「日治時期」仍然是使用上最為方便的詞彙。

<sup>28</sup> 哈羅德·伊尼斯，何道寬譯，《帝國與傳播》(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VII-VIII。

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發展定位成由 5、印刷術初期向 7、機器印刷時期移動的歷史進程。尤有甚者，倘若在配合伊尼斯「傳播偏向論」<sup>29</sup>的概念，伴隨著印刷科技發展的原先具有時間性特質的媒體產物(如報紙)，也在運輸科技、帝國擴張等社會條件影響下，在空間方面形成了跨越與流動的歷史現象。

總而言之，本論文所關注的焦點無非是企圖在政治面向外，藉由印刷媒體而形成的、具有特定時代特徵的台灣社會文化變遷現象當中進行延伸，進而探討這個時代特徵對於當時台灣民眾形成的集體影響，進而思考上述種種的歷史現象，是否便是印刷媒體世代之所以成形的直接證據？

### 三、世代(Generation)

世代在近年來台灣學研究中成為一個經常可見的議題，相當程度上也是誘發本論文之所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事實上，例如：保釣世代、學運世代、野百合時代等等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範例<sup>30</sup>。大體來看，世代在過去的討論當中至少存在著：1.具有血緣或親屬關係的世代；2.具有共同歷史事件經驗的世代；3.擁有共同成長環境、背景所形成的這幾種傾向。其中，又尤其以文化人類學強調血緣或親屬關係的世代概念，經常在台灣史研究的論文中產生影響。

血緣或親屬關係的世代概念對於家族史研究的幫助無庸置疑，也有利於理解研究對象的親屬關係及其世代更迭等種種現象，或者是理清研究對象的發展軌跡概況。但是，如此強調血緣或生物年齡的世代概念未必適合當前日漸都市化的現代社會。或者說，一旦研究對象的規模大小超越家庭或氏族的大小規模，則不管用什麼條件進行設定、區分出不同的世代階層，都難免會有介於當中、無法清楚歸類的遺珠之憾。另外，利用共同經歷的歷史事件作為世代判定的標準，諸如野百合世代或美麗島世代等也是坊間常見的說法。但是，藉由單一歷史事件所界定出來的世代成員，彼此之間可能存在著不同的成長背景、學歷或社會經驗；另外，他們各自在此歷史事件以後的行動、選擇與認同等層面的情況也可能不盡相同，甚至彼此衝突、矛盾。一定程度上，也就過分膨脹了短時間內單一突發事件的影響效能。

跟據周婉窈的整理，西方對於世代的討論可以說是自 19 世紀末的狄爾泰(Wilhelm Dilthey)開始。而年鑒學派史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則認為：「這種

---

<sup>29</sup> 「傳播偏向論」為伊尼斯所提出的，將媒體區分成：(一)、有利於空間上延伸的媒介，以及(二)、有利於時間上延伸的媒介的看法。他認為，傳播與傳播媒介事實上都存在著偏向，要嘛是口頭傳播或書面傳播的偏向，不然便是時間或空間的偏向。當然伊尼斯的論述往往有其龐大而難以周全的結構上缺失，是故本論文在概念的使用上，也僅僅將之視為是啟發而已。哈羅德·伊尼斯，何道寬譯，《帝國與傳播》，頁 VII-VIII。

<sup>30</sup> 在何榮幸的定義當中，所謂的「學運世代」份子存在著如下的四個層次：(一)各校學運領導者與核心幹部；(二)各校學運社團活躍份子；(三)野百合學運時在中正紀念堂靜坐的學生以及野百合學運前後參與過學生運動的學生；(四)當時全國大專院校中，被學運改革氛圍所影響的年輕人。何榮幸，《學運世代》(台北：時報，2001 年)，頁 12。

來自同一年代的共同烙印正是造成一個世代(generation)的東西。<sup>31</sup>」他也發現到，世代的形成往往與成長期的經驗有關，以及世代的周期、邊界與規模也並非完全地等同、劃一。上述顯示：世代的形成往往歸因於同時期的時代氛圍，是由處在共同社會情境的同一批人作為組成世代的核心成員。但是，人類社群的擴大與延伸，破壞了上述這個理想的狀態；人類作為生物、血緣所形成的生命周期因為數量上的膨脹而趨於模糊、一個清楚而層次分明的社會不復再見。於是當不同年齡層的群眾皆可能共享於相同的社會變遷與文化之際，也就預示了：世代並不只是生物學上的世代，歷史世代與生物世代上也沒有必然的對應關係。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時代與世代之間的連結關係業已形成，本論文所傾向的還是所謂藉由共同成長環境、背景所形成的世代概念。

本論文認為企圖將業已「現代化」、「規模化」、「都市化」的人類社群，透過物理時間平均分割成各個世代往往是徒勞無功的；如何擺脫歸納法的研究盲點，從演繹法的方式從時代的整體脈絡中觀察一個特定歷史世代的形成；並且考量到同一世代當中不同階層、族群、性別或其他差異者之所以與不同世代之間存在「不同時代的同時性」，便為本論文在使用世代概念進行討論時所特別考慮的重點<sup>32</sup>。

於是，本論文採取的是曼海姆(Karl Mannheim)藉世代位置、實存世代與世代單位結構而成的世代理論為依據。主要的理由在於：雖然以生命周期作為依據的生物世代概念在人類學或社會學的研究當中頗為常見，不過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往往僅限於家族或者部落的規模，同時這些研究對象彼此之間也往往存在著實際的血緣關係。然而，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社會已逐漸形成了以台灣島為界限的生活空間，再加上商業資本與都市形成的影響，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社會發展的規模已無法用生命周期作為不同階段的判斷準則。

曼海姆的意見主要表達在〈世代的問題〉(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這篇文章，透過 Paul Kecskemeti 的英文翻譯與蕭阿勤在中文著作中的詮釋，有助於我們理解世代作為一個西方學術界持續討論的議題，其被認識的過程及其本身與時代、生物年齡之間的複雜關係。蕭阿勤曾經在其著作對曼海姆論述中的核心意旨作過一番引述，他認為：曼海姆的意見主要在於批判「實證主義的」(postivist)與「浪漫的一歷史的」(romantichistorical)這兩種各自偏向量化與質化的觀點，認為它們未曾找出影響世代之所以形成的社會過程，進而將世代問題視作為只是找出世代週期現象；或者無視知識潮流與世代現象之間的社會與歷史因素<sup>33</sup>。

首先，我們可以說：探討與年齡有關的人群如何成為社會變遷的能動者時，世代概念在分析的有效性，不在於指出他們在生物學上的年齡或一致

<sup>31</sup> 布洛克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頁 171。

<sup>32</sup>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頁(5)-(8)。

<sup>33</sup> 蕭阿勤，《回歸現實》，頁 17。



或相近，而在於說明他們如何因為處於同一社會的特殊歷史過程中，經歷了類似的社會變遷力量，因此在生活經驗與反應上有某種的共同性，而這也使他們異於其他的世代。……換句話說，一群人在生物學上的年齡相近，至多只是他們共同社會行動的必要條件，而非充份條件。特定的世代要引發重大社會變遷，不會只是因為生存於同一時空，而必須是他們發展一種具有共同意識的連帶關係，足以激發他們參與共同的命運。<sup>34</sup>

其次，Mannheim 指出，世代因素成為人們共同社會行動的顯著基礎，經常是在社會變遷快速或社會政治動盪時期。<sup>35</sup>

透過蕭阿勤的介紹，有助於我們瞭解世代之所以形成，與世代環境與共同意識的形成，有著相當程度的關連。此外，蕭阿勤相當程度也解釋了曼海姆世代理論當中有關世代位置、實存世代與世代單位的內涵。在曼海姆的概念當中，世代並非一個具體的團體，相反的，世代的形成來自於他們彼此存在類似的社會位置，只是它另外涵蓋了一個歷史的/社會的過程中相關的「年齡團體」。因此，世代位置往往與該時期的歷史文化有所關連，或者說，「要共享一個相同的世代位置，人們必須生長於同一歷史的與文化的地區<sup>36</sup>」。

不過，世代位置本身也並非就是所謂的世代。事實上，世代位置決定的只是世代意識形成的基礎環境，而且也唯有真正參與社會與時代的個體，才有可能與其他個體共同組織成「實存世代」(a generation as an actuality; an actual generation)。世代位置與實存世代的的不同地方在於：必須是處在類似位置的同時代人參與了共同的命運、「並且參與了在某方面和這個命運開展密不可分的觀念與概念的時候，一個實存世代於焉形成。<sup>37</sup>」。同時，也因為積極參與社會的世代成員往往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作出不同的選擇，因此，實存世代當中又可以區分出不同的群體或個體，便是所謂的「世代單位(generation unit)」。

然而，不管是對於世代位置、實存世代或世代單位的種種討論，其實都關係著單一世代的形成過程，而未直接觸及到世代交替、即本論文所試圖辨析的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之間的轉換關係。或者說，一旦本文所企圖闡明的是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所形成的社會現象與歷史脈絡，其與傳統文人或知識份子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何？知識份子是否由傳統文人轉變而成？所謂的知識份子社群是否與傳統文人有著高度的重疊？便必須再一次地回到曼海姆的論述中來找尋答案。

<sup>34</sup> 蕭阿勤，《回歸現實》，頁 21。

<sup>35</sup> 蕭阿勤，《回歸現實》，頁 22。

<sup>36</sup> 蕭阿勤，《回歸現實》，頁 18。本論文在引用曼海姆的概念與語彙時，援用蕭阿勤的翻譯處甚多，以下並未詳細一一標明，但致以由衷的感謝。

<sup>37</sup> 蕭阿勤，《回歸現實》，頁 19。

首先，曼海姆認為世代的形成並不需要一個可以被辨識的、明確的社會團體 (social group)，這個社會團體的形成來自於一個自然發展而來的意識連結，而並非是一個如共同體一般地明確的組織。過去對於生物學現象的重視，一方面膨脹了生命週期循環在世代概念中的具體作用，也忽略了政治、經濟等社會變遷與歷史要素的具體影響。曼海姆認為，對於世代的討論是不能忽略物質與精神上的演化現象的，而存在於世代與世代之間的與其是彼此的隔閡與斷裂；毋寧更應該注意其在歷史發展中的積累(accumulate)與繼承<sup>38</sup>。

事實上，行為的模仿與過去經驗的延續是傳統精神之所以可以改變、適應新情境的主要原因。即便個人記憶可以是全然私人與自主的，但在知識的範疇上卻無可避免地來自於我們所身處的真實社會。人類生命的循環交替固然是世代論述中不可避免被提及的面向，但更為重要的，還是在於這個社會團體之間能不能存在一個類似的位置(similarity of location)、共享類似的意識。不同於以往將新舊世代置放在彼此對抗的關係當中，曼海姆認為處在不同世代位置的新舊世代，其實可能是彼此重疊的。諸如傳統的生活型態、感受與態度等等，都可能是傳達自舊的世代<sup>39</sup>。

如果成長期經驗對於人類意識型態的形成有著一定程度的重要性，則不可忽略的地方在於：新世代往往在舊世代仍掌握社會有力位置的時刻下，形塑了他們個人的主體意識，來自於前世代所提供的教育環境與指導等，都不可避免地對新世代產生影響，讓新舊世代始終保持在一個相互作用的關係當中。所以當世代成為一個持續地系列，則中介世代(intermediary generation)便在新舊世代當中形成一個折衝斡旋的、既不屬於它們、又同時涵有它們特色的特別角色<sup>40</sup>。

回到世代位置、實存世代或世代單位來看，世代位置的前提主要是建立在所謂相同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之下，又同時包括了寬鬆與嚴格的不同標準<sup>41</sup>。世代交替事實上也必須是世代位置的更替與轉換，而這個現象不僅僅來自於社會型態的流動變遷，同時也對知識份子的知識系統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但是，如果社會演進無法對世代形成改變，則其往往只能對新個體產生影響而沒有辦法改變以往的舊的世代；同樣地，如果世代的轉折出現斷層，則它們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必然會產生磨擦<sup>42</sup>。

另一方面，存在於世代位置下的世代單位一方面並非是一個明顯可以區分的團體；但不可否認的是，團體在凝聚共同意識上的功能，事實上有助於一個新的集體意識、新的世代的產生。如果這個新的世代本身的傾向較為強烈，很有可能

<sup>38</sup> Mannheim Karl,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Paul Kecskemeti.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p288-293.

<sup>39</sup> Mannheim Karl,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p296-299

<sup>40</sup> Mannheim Karl,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p301.

<sup>41</sup> 寬鬆的定義是只要組在相同的歷史共同體中；而嚴格的標準則必須要經歷過一樣的社會、歷史轉變，有共同的集體意識。

<sup>42</sup> Mannheim Karl,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302-303.

也會吸引生物年齡上較早或較晚的群體來主動地加入這個世代。所以，世代當中本來就不會只有特定年齡的組成份子，或者說，任何世代當中也往往存在著彼此不同、甚至對抗的世代單位。再加上，這些世代單位的形成本身並不見得都是有意識的，世代單位在生物年齡分布上的模糊與曖昧，也更加地讓世代單位無法由單一個年齡團體獨力形成，讓世代的變遷處在一個緩慢、持續的狀態<sup>43</sup>。

介紹過曼海姆的世代概念之後，本論文以為蕭阿勤在其著作中所提到的：處在特殊世代位置的個體如何從自在世代轉變為自為世代的相關論述，不僅可以用來區分所謂的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同時也有助於本論文來闡明何以提出所謂印刷媒體世代的目的是與功能。

屬於特殊世代位置的個人遭逢重大創傷事件而經歷覺醒過程，才使他們由消極的自在世代(*generation in-itself*)，轉變為積極的自為世代(*generation for-itself*)。……再者，一個自覺而積極的實存世代，或者所謂的「歷史世代」(*historical generation*)、「策略世代」(*strategic generation*)，並非消極接受既有文化，而是在客觀有利的環境下，能創造出足以帶來重大社會變遷的強烈社會意識或政治變遷理念。<sup>44</sup>

自在世代與自為世代不僅有助於我們分辨不同的世代單位；更可以與行動(*agency*)、結構(*structure*)的互相配合，進行所謂的歷史評價。事實上，在社會學的討論當中，行動(*agency*)與結構(*structure*)是兩個經常被提到又彼此糾葛的概念<sup>45</sup>。過去馬克思主義者往往過分地強調社會結構的重要性，從而將行動者化約為結構的承載者(*bearer*)或附帶現象(*epiphenomenon*)<sup>46</sup>。可是，這種將環境與結構影響要素無限上綱的態度，不但與那些強調個人因意向而行動、進而改變歷史現況的英雄史觀產生衝突，同時也容易過分地去衡量個人在行動時所採取的利益考量。因此，柯林尼可斯認為：個人作為具有能動性的行動者事實上與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未必相違。環境未必全然地限制行動者的能動性，而行動背後所蘊藏的動能，其實也有可能來自於他們在社會結構、即環境中所位處的位置<sup>47</sup>。換言之，結構作為一個影響個體、世代的主要因素，本身當然限制了個體所能採取

<sup>43</sup> Mannheim Karl,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306-309.

<sup>44</sup> 蕭阿勤，《回歸現實》，頁 28-29。

<sup>45</sup> *agency* 一般又被譯為「能動性」，然而本論文採用萬毓澤的解釋：即，當 *structure* 與 *agency* 共同出現時，因為考量到翻譯的對稱感而分別譯為「結構」與「行動」。萬毓澤〈譯者導言：試論《創造歷史》的幾個關鍵主體〉，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57。

<sup>46</sup> 萬毓澤〈譯者導言：試論《創造歷史》的幾個關鍵主體〉，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57。

<sup>47</sup> 柯林尼可斯的原文翻譯如下：「我的論點是，人類是具有能動性的行為者，是首創精神(*initiative*)的來源，而人類所擁有的許多重要力量，都源自於他們在社會結構(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生產關係)當中所處的位置。」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1、15。

的行動與策略，但也不可否認，結構未嘗不是行動(甚至是反抗)之所以產生的源頭。

本論文之所以刻意突顯出印刷媒體的重要性，在於原先存在於清帝國統治時期下台灣社會的傳統文人群體，其本身及其繼承人必須到了日本統治時期才在印刷媒體的生產與輸入影響下，逐漸形成其之所以得以被歸屬在相同世代的世代特徵；另一方面，過去被視為是知識份子的台灣人群體，也同樣在印刷媒體本身所具備的傳遞知識、溝通訊息等功能上獲益匪淺，進而得以凝聚群體當中的共同認同與認知。

印刷媒體刊物本身源發於殖民，又終究脫離殖民、甚至反殖民的發展現象，不單單可以配合於以往文化抗日運動等的詮釋框架，同時在社會文化史、知識社會史的觀察端點，也可以更寬廣的思考：作為日本帝國統治下的殖民地台灣，究竟是如何地從殖民地社會結構中掙脫、自立，在結構當中透過行動來找尋屬於自己的聲音與主體意識。是故，相異於上述研究所慣常使用的分類或歸納方式，本論文所採取的是將世代與時代予以配合，強調「世代」本身之所以得以成形的環境與條件。另外，本論文在界定所謂的世代位置之際，也進而從不同世代成員間彼此互動的關係，拼湊實存世代的具體面貌。其中，更挪用了蕭阿勤的看法，強調世代本身的主觀認同，以及其從自在世代轉變為自為世代的歷史價值與意涵<sup>48</sup>。

#### 四、傳統文人(the traditional literati)與知識份子(the intellectuals)

一個學科在擴展規模與進行建制的過程中，針對既往研究成果進行學術史的檢視，往往是這個學科在未來是否能夠持續保持進步的根本動力。在這個段落當中，本論文將利用台灣文學研究中經常被使用的兩個詞彙：「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從它們各自指涉的內涵差異，以及逐漸在學術討論中形成的歷史脈絡，檢視本論文提出的「印刷媒體世代」一詞在未來學術討論中所可能具備的貢獻。

知識份子(the intellectuals)與傳統文人(the traditional literati)在台灣文學研究中曾經被成功地建構成兩個彼此不同的社會群體。首先，二者的區隔或許會以生物年齡上的差異來進行區隔，尤其又經常以乙未割台的歷史事件作為具體的分界點；再者是，由於摻入了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影響，台灣民眾所受到的教育、以及隨教育所訓練而成的語文使用習慣、書寫創作文類，也是被用來作為區分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的一種條件；另外，現代文明器物的使用經驗與觀念的接受與否、面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態度、自我的身份認知與認同等等，也都是過去曾經被用來界定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的標準。例如在傳統文人的部分，施懿琳的定位便強調其為「以漢文化為本位、以儒家思想核心的傳統讀書人。<sup>49</sup>」黃美娥在意的，則是其必須為畢生文學創作的主要表現為傳統文學的文人，以及其對於自身屬於

<sup>48</sup> 即「處於特殊生命階段的少數人之獨特主張與行動，探討世代意識如何成為社會政治的積極行動之能動來源」。蕭阿勤，《回歸現實》，頁 345。

<sup>49</sup>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高雄：春暉，2000)，頁 271。

新、舊文人的身份認知<sup>50</sup>。另外，柳書琴則以為唯有經過 1895 年台灣割讓的重大歷史變局，以及 1920 年代新舊文學論戰引發的文化領導權失落的雙重衝擊經驗的，才有資格被稱作是舊文人<sup>51</sup>。

另一方面，究竟什麼是所謂的「知識份子」？或者說，這些當時具備如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真正世俗的知識份子<sup>52</sup>」(the true secular intellectual)特色的台灣菁英們，與當時台灣社會的其他民眾究竟又有什麼樣的不同？

本文所謂的新興一代知識份子係指誕生於甲午戰爭前後，成長於日據台灣社會，在台灣本土接受新式教育或至東京等日本大都會留學的青年，或稱為「乙未戰後新生代」。他們無論在出身或觀念上，都有別於先前與往後的兩個世代。……這一代的知識份子以東京為基地，在台灣有志士紳的贊助下，以機關刊物為工具，與台灣本島的知識青年匯合而成為一股巨大的力量，展開波瀾壯闊的殖民地政治運動。<sup>53</sup>

新式教育、留學經驗與殖民地成長背景一直以來都是所謂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被辨識的主要特徵，同時也是他們之所以被視為與前行代台灣菁英有所不同的主要理由。可是，誠如柳書琴所提問的：「年代劃分、文體判準、作家表態都具有重要參考性，卻無法單獨作為傳統文人/新文學者的分類基準。<sup>54</sup>」另一方面，一個更必須被考慮的問題，其實是將這些台灣菁英們區分為所謂的知識份子或傳統文人的理由究竟為何？以及這個界定對於瞭解、分析與詮釋當時台灣社會發展的功能究竟為何？

柳書琴認為：所謂的傳統文人事實上是一個他們自我在與他者在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一種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結果<sup>55</sup>。在她的論述當中，傳統文人被視為是一個「特定的」文化世代，進而具備了某種可以與其他台灣民眾進行區隔的文化特性。這個看法無疑讓此項議題開始與世代概念產生勾連，更重要的地方在於，似乎也表示整個日本統治時期下的台灣社會存在著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化世代。

<sup>50</sup>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台北：麥田，2004)，頁 14。

<sup>51</sup> 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台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收錄於《台灣史研究》第 14 卷第 2 期，頁 50-51。

<sup>52</sup> 所謂「真正世俗的知識份子」大致指的是一種入世而不被權力結構收編的精神，關於薩依德的意見，可以參考薩依德在《知識份子論》中的〈序言〉。薩依德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1997)。

<sup>53</sup>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晚報，1989)。頁 13。

<sup>54</sup> 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台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收錄於《台灣史研究》第 14 卷第 2 期，頁 49。

<sup>55</sup> 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台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收錄於《台灣史研究》第 14 卷第 2 期，頁 50。

所以，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無非來自於下列的幾個疑問：首先，過去所謂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的界定在研究上的功能究竟為何？再者是，這些被定義成所謂傳統文人、知識份子與文化世代、知識世代等的台灣民眾，他們之間是否真的如此涇渭分明？或者說，那個過去被用以建構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彼此差異、對立的判定標準，有沒有可能其實只是無力剖析當時台灣社會彼此重層、交疊、混雜實際情況的階段性成果？

在解決這些疑問之前，本論文將回頭檢視以往台灣文學研究中將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視為彼此對立、對抗的論述脈絡，進而處理他們在台灣歷史發展中彼此交混、重疊的社會現象，最後說明世代理論在此項議題中究竟存在著那些具有效度的切入點？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在以往台灣學研究中的對立，葉石濤無疑是這個觀點的首要創始人。他在《台灣文學史綱》中對於 1924 年所發生的新舊文學論戰有著以下兩段描述：

在這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台灣新民報」始終是台灣民眾真實心聲的代言人。同時亦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根據地和大本營。它提供園地給台灣作家耕耘，發表作品，在新文學運動中迭起的各種富有時代、社會意義的論爭中，提供筆戰的陣地；那便是提倡白話文語體文的使用、新舊文學論爭、台灣話文建設論爭、鄉土文學論爭等。<sup>56</sup>

一九二四年連雅堂發行了以漢詩為主的古文體刊物「台灣詩薈」，共二十二期。這個漢詩詩刊曾經在新舊文學論爭時，發揮了相當的效能，它站在擁護舊文學的立場上，對新文學有所抨擊，但時代社會的轉變已否定舊文學作為民眾抒發意見的工具的價值，舊文學在眾多詩社裏苟延殘喘地保存下來。<sup>57</sup>

首先可以發現：葉石濤當時已經注意到台灣論述與印刷媒體緊密結合的社會現象；再者是，舊文學在當時的論述中不僅僅被貶抑為因為時代轉變而欠缺工具價值的落伍文體；同時還因為作品內容往往脫離庶民的現實生活，鮮少正面地與日本殖民統治的政治現實情況對抗而受到貶抑<sup>58</sup>。另一方面，那些以《台灣民報》作為根據地的台灣知識份子們，在不管是葉石濤、彭瑞金的論述當中，都具備了現代、啟蒙與抵殖民的正面形象。

<sup>56</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1987），頁 30。

<sup>57</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頁 30。

<sup>58</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頁 15。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的論調高唱入雲，台灣又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因而逐漸採用新形式的抗日民族運動。許多在東京留學的台灣舊士紳階層的子弟，聯絡大陸來日的留學生或朝鮮的革命青年共同組織結社，傾向於台灣的民族自決運動。他們的這種思想動態在台灣也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凝結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規模宏大的政治性運動，接著一九二一年民族主義文化啟蒙運動的大本營台灣文化協會宣告成立，跟朝鮮的三一運動互相呼應，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據點。<sup>59</sup>

這種論述無疑將知識份子與傳統漢文人放入一種簡化的對立結構當中：傳統文人被貼上了親日、落伍的標籤；知識份子則被冠以抗日、進步的稱謂。即使這種說法近年來已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挑戰<sup>60</sup>，但是本論文認為：這種無庸置疑在歷史事實認知上充滿特定偏向的意見，唯有在詳細分析其根本的內涵、邏輯與形成的時空環境，才能在「歷史意識的合理性<sup>61</sup>」下，真正理解到它對學術發展史的啟示與貢獻、侷限。葉石濤撰寫《台灣文學史綱》之際，正好是台灣解嚴前後的那一段時光。近年來有關解嚴與台灣文學發展之間的關係已有數篇論文進行討論。但是，不管是社會與文學的發展先於政治方面的解放<sup>62</sup>，或者是因為解嚴而促發了台灣文學「複數記憶」萌發與擴張<sup>63</sup>，都不能否認葉石濤的文學史觀仍然一定程度上受到戒嚴時期官方論述的影響與限制。

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也曾受到五四文學革命的刺激。日據下的台灣新文學作家大多數也和大陸作家一樣，用白話文寫作，保持了濃厚的民族風格。……台灣作家共同揹負了台灣民眾苦難的十字架，跟台灣民眾打成一片，為抗日抵抗的歷史留下嚴肅的證言。<sup>64</sup>

<sup>59</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頁 21。類似的意見，在彭瑞金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如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1998），頁 1。

<sup>60</sup> 例如，黃美娥的著作便在強調漢文人對於現代文明的接受；而陳昭瑛的著作中也經常可以看到傳統文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身影。可參考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與陳昭瑛，《台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台北：正中書局，2000）。

<sup>61</sup> 所謂「歷史意識的合理性」，在於歷史本身並非一些道德性的評價，它不在於企圖去建立什麼歷史目的或者是歷史哲學，而是要求我們嘗試瞭解前人之處境，一方面是對象在歷史情境下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則是他跟過去的「連續性」。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以參考葉新雲，〈歷史意識的合理性〉，《思想》第 3 期，台北：聯經，2006，頁 59-73。

<sup>62</sup> 唐諾，〈文學在乎解嚴嗎？〉，《思想》第 8 期，台北：聯經，2008，頁 109-116。

<sup>63</sup> 陳芳明，〈複數記憶的浮現〉，《思想》第 8 期，台北：聯經，2008，頁 131-140。

<sup>64</sup> 葉石濤，〈序〉收錄於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頁 1。

除了使用「日據時期」一詞的痕跡，更重要的是葉石濤在行文中一再強調：台灣新文學作家與中國方面在民族精神或文學運動上的繼承關係。換言之，即便研究者認為這本《台灣文學史綱》存在著作者對於左翼文學史觀與非官方論述的色彩；卻不能否認內容當中其實還是延續了諸多戒嚴時期的官方論述<sup>65</sup>。

葉石濤的意見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是戰後國民黨官方論述偏向反日本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思想的一種脫胎；但是必須指出的一點是，反日本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思想原本未必非與漢古典文學產生衝突，近年來亦有研究指出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漢文人在抵殖民陣線與文明啟蒙上的努力與貢獻。於是，究竟「現代 VS. 傳統」的這個論述何以形成，或者說，「現代 VS. 傳統」的這個論述在什麼前提下得以成立？又在什麼情況下窒礙難行？便成為在推翻這個對立結構之前所必須進行的整理。

回到前面幾段引言，可以發現葉石濤已經注意到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中的「世代」落差。事實上，台灣傳統士紳及其留學內地東京等地的子弟們在社會階級上的複製與再生產現象，早已經是日治時期台灣研究上的基本共識<sup>66</sup>。然而，正因為葉石濤過分地強調了文化抗日陣線、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台灣文化協會的形成；或者說，正因為葉石濤將當時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定位在中國五四運動的刺激、將 1920 年代視為是台灣新文學的起點，所以無法讓台灣新文學的發展與台灣古典文學產生連結，進而使得古典文學與新文學在新舊論戰的討論下被擴大成為彼此獨立、對抗的兩個陣營。另一方面，葉石濤對於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新一代知識份子的正面論述，背後所蘊藏的邏輯不僅僅是政治的、民族主義的、反殖民與現代啟蒙的。這種以內地台灣留學生作為焦點的研究關懷，一定程度上也是「空間的」、是強調由內地日本向外地台灣「傳播」的一種論述傾向。

自葉石濤開始，關於台灣新文學發展的相關論述往往結合文化抗日史觀與台灣民族社會運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所謂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彼此對立、對抗的研究偏向<sup>67</sup>。然而這種論述無法完全概括所謂傳統文人或知識份子的所有個案，或者說，使用抗日、文化啟蒙經驗與不同文字、文類作為判斷的依據，往往忽略了條件與條件之間彼此交疊或衝突等等的各種情況。因此，近年來研究者所提出的詮釋與論述，相當程度上便是對於所謂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彼此「對立」的認知，作出更進一步的討論與批判。

對於所謂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彼此對立的反思，最為積極且成果豐碩的無疑

<sup>65</sup>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 可以參考陳芳明，〈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觀之建構〉，收錄於陳芳明，《後殖民台灣》（台北：麥田，2002），頁 47-68。

<sup>66</sup>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以參考吳文星，〈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流動〉，《台灣文獻》51 卷第 6 期，2000。吳文星，〈日據初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肆應與變動〉，《（師大）歷史學報》第 15 期，1987。

<sup>67</sup> 關於這方面，陳芳明是具有代表性的學者之一，其於 1990 年代出版的諸多著作當中，日治時期的台灣知識份子、左翼運動與台灣新文學發展共同組成其研究關懷的主要核心。可參考：陳芳明，《殖民地台灣》。陳芳明，《左翼台灣》（台北：麥田，1998）。



是台灣漢文學研究的學者群。台灣傳統漢文人是否真的如部分文學史家所批評一般的親日、保守，並且在新舊文學論戰以後被逐出文壇的主流位置之外？事實上，從施懿琳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古典漢詩社事實上未必如葉石濤、彭瑞金所說，在新舊文學論戰之後便沉寂、在台灣社會中消失。

日本統治初期的台灣傳統詩社不僅與書房、私塾共同成為傳承台灣傳統文化的文化組織；甚至在書房逐年遭到取締之後，由詩社逐漸擔起了維繫傳統文化的重責大任<sup>68</sup>。同時，即便總督府對於台灣傳統詩社與漢詩人多有拉攏、招安的舉措<sup>69</sup>，但是在官紳唱和的現象之外，也同樣存在著各式不同的傳統文人典型<sup>70</sup>。更何況，傳統漢文人不僅單純地延續台灣既有的傳統文化，對於新知識份子影響甚大的現代文明啟蒙知識，也在他們身上同樣造成影響。黃美娥在《重層現代性鏡像》中利用台灣傳統詩社的發展與傳統文人對於文學典律的反省，以及魏清德、李逸濤等人的文學作品，已證明台灣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相比對於西方文明的吸收與體驗並不惶多讓<sup>71</sup>；同時其也利用現代性移植的視角，重新檢視新舊文人在文學典律的爭奪，以及背後涉及到的有關文明價值的認知與認同落差。

當我們發現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已逐漸地從將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視為是各自獨立的群體、並試圖強調彼此之間的差異；再到慢慢發現他們彼此之間在現代文明啟蒙的接受與再生產、抗日民族社會運動的組織與行動、文學創作上的革新與改良等方面的相似之際，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是否終究只能成為彼此平行、各自發展的兩條平行線？或者說，有沒有可能提出一個新的理論框架來將他們放入同一座平台上來進行討論？柳書琴提到的「文化世代」，便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思考端點：

「文化世代」並非年齡世代，而是由於教育系統、社會文化教養、道德價值氛圍、媒體/出版/閱讀形態、政治經濟環境，乃至主體文化認同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行成的「知識世代」。<sup>72</sup>

<sup>68</sup>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頁 188。以及，關於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漢詩社的發展可以參考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收錄於黃美娥，《古典台灣》（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 183-228。雖然詩社與傳統文化的延續、傳承關係仍有待深究，同時詩社應酬化或娛樂化的現象，也是過去遭受到批判的原因。然而，如果簡單的就「漢字的使用」的這個標準，則還是可以暫且先用「維繫傳統文化」來加以形容。

<sup>69</sup> 楊永彬，〈日本領台初期日台官紳唱和〉，若林正文、吳密察編，《台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台北：播種者，2000），頁 105-181。

<sup>70</sup> 在施懿琳的著作中，大致將台灣的傳統文人分成三類：（一）徹底反日，拒絕妥協者；（二）表面與日政府虛應，而骨子裡卻有堅定抗日意識者；（三）親日色彩極濃，但作品實不乏抒發滄桑之痛者。可參考：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頁 191-204。

<sup>71</sup> 第三章〈實踐與轉化——日治時代台灣傳統詩社的現代性體驗〉，收錄於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頁 143-182。

<sup>72</sup> 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台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收錄於《台灣史研究》第 14 卷第 2 期，頁 50。

過去關於台灣傳統文人與文學的論述往往強調其「時間的」、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繼承」現象。但是，所謂的傳統文人是否真的在所謂的新/舊與漢文化/非漢文化意識上具備著他們自我認同以及被他者標誌的要點？從歷史事實上我們也可以發現：所謂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之間仍然存在著一定程度模糊或重疊的曖昧空間？事實上，過去被歸類為傳統文人或知識份子的群體當中不僅都存在著親日與抗日的台灣人士；另外，即使是所謂的傳統文人也往往具備了接受現代文明器物或知識的親身經驗，而知識份子往往則出身自其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家庭背景；更別說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的教育環境存在著雙軌、多軌並存的特殊情況，都讓台灣菁英的閱讀與書寫習慣在日文與漢文、舊文學或新文學中遊走。

因此，本論文主要想提問的是：假若文化世代真的如上所述的存在著諸多要件，那麼當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共同處在相同的文化環境之際，傳統文人是否真的可能因此而形成一個特定而專屬的文化世代？還是說，那些包括教育系統、社會文化教養、道德價值氛圍、媒體/出版/閱讀形態、政治經濟環境與主體文化認同等種種條件，其實都同樣影響了過去被視作是知識份子或傳統文人的台灣人，在當時都同樣地對他們產生集體性的影響？

就在重新觀察 1920 年代所謂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的公共參與之際，本論文意外地發現他們彼此不分社群、階級、教育背景、政治立場或居住地區等都與當時伴隨日本殖民統治來到台灣的現代印刷媒體有著緊密的關連。也就是說，所謂知識份子或傳統文人事實上都應該隸屬於相同的文化場域，與當時台灣社會印刷媒體的生產傳播過程息息相關、隸屬於相同的「文化世代」。更重要的是，這個世代本身培育出來的、不同典型的世代成員，不管在歷史發展中的種種互動關係、在文類與文字的選擇、政治國族上的認同等等，其實都沒有跳脫這個世代之所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即所謂印刷媒體的範疇與影響。換言之，本論文並非回頭質問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必然是對立的嗎？或者說，本論文也並非再次地回頭確認那個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彼此混雜、難辨的歷史事實。本論文所企圖處理的是：這個之所以讓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並存、共生的文化環境究竟是如何的形成？以及在那樣的世代位置之下，這些其實「同多於異」的世代成員們又是如何地在當時與後來被界定為異多於同的、不同的知識社群？以及，這一個形成於日本統治時期的「印刷媒體世代」本身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文化特徵，進而與清帝國統治時期的台灣文人有所差異，同時又在日本統治時期形成那些具體的影響？

## 五、結構(structure)與行動(agency)

本論文利用社會學研究中對結構(structure)與行動(agency)的相關論述，細緻化以往台灣學研究中所習慣的採取殖民 VS.反殖民觀點。事實上，台灣總督府在台灣採取的種種統治措施，確實形成了台灣民眾採取各種行動與之對應的社會現象。然而，一旦僅僅採取所謂殖民 VS.反殖民的觀看角度，便得面對究竟要採取

動機論或者是結果論來進行歷史評價的疑慮；以及有關反殖民運動本身知識來源、方法取材等偏重於內涵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倘若反殖民運動本身並沒有成功，則其作為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與統治結構相互作用的諸多行動之一，如何與其他的行動作出區隔，不致於在比較下落入單純的褒貶評判，就成為了本論文以「結構—行動」這組概念進行歷史詮釋時所企圖達成的目標。

在社會學的討論當中，結構與行動一直是學者們所好奇、爭論的焦點議題。這可以上推至馬克思與韋伯(即：結構性解釋與意向性解釋)的根本差異，近年來則已經被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在《創造歷史》中予以統整。對於柯林尼可斯而言，行動本身所具備的力量一部份是來自於其個人所擁有，另一部份則往往受到結構所決定，即取決於行動者在主要的社會結構中所佔據的位置。這也就是說，結構不再單單只是限制行動，同時也是提供行動力量的可能來源<sup>73</sup>。

社會結構是將個人、物質資源、超個體的實體(supra-individual entities)(某種社會制度)以及其他社會結構聯繫起來的一套關係(relation)，而(彼此的聯繫程度不一定是很高的)個人從這樣的關係之中獲得了特定種類的力量。<sup>74</sup>

在柯林尼可斯的想法中，社會結構並不是如馬克思所提到的模式一般，因為其相對穩定的生產力發展而促成了一連串的社會革命。相反地，他認為並存的權力的交叉點(nodes of power)往往因為內部矛盾與互動而產生變化，偶爾會創造出機會讓進步的生產關係得以確立，進而轉化了原先內部互動的脈絡<sup>75</sup>。是故，借用自萊特(E. O. Wright)的「結構能力」這個概念，也就成為了柯林尼可斯用來解決結構與行動彼此對立的解決方案。

所謂的結構能力，指的是「行動者憑藉自己在生產關係中的位置所擁有的力量<sup>76</sup>」。換言之，這樣的看法結合了人類的意向與能力，在「想要」與「能夠」當中取得一定程度的調合。柯林尼可斯認為，「行動必須透過意向來解釋，也就是必須賦予行動者信念與慾望，而這些信念與慾望使行動者以某種方式行動<sup>77</sup>」。如果我們將之套用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便也必須考慮到：倘若日本統治時期殖民體制下台灣的社會結構如此穩固，則究竟是什麼提供台灣民眾得以採取文化抗日運動的力量與空間？而不僅僅只是民族主義下的偉大動機與意圖。

<sup>73</sup> 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15。

<sup>74</sup> 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67

<sup>75</sup> 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37

<sup>76</sup> 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64

<sup>77</sup> 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57

另外，透過結構能力的觀念也有助於幫助我們跳脫正統行動者概念的不足。事實上，行動者與其欲求的關係不應該單單只是：(1)A 希望 P；(2)A 相信 q，亦即從事 x，會讓 p 發生；(3)因此 A 從事 x。換言之，當 A 試圖去從事 x，但本來的目標 P 則不一定會實現<sup>78</sup>。因此，以這個角度回顧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民眾所進行的文化抗日運動，便可以發現無論其所企求的究竟是獨立、回歸或者是自治，其實都具備著訴求未必實現、受制於結構所影響的現實情況。

柯林尼可斯認為：不管是個體與結構都應該出現在社會事件的解釋前提，而不應該被簡單化約<sup>79</sup>。結構之所以不再成為阻礙行動的要素而實際地涉入了行動的生產，在於結構包括了資源與規則，讓人能夠行使特定形式的權力，迫使別人服從於自己的需要。但是，行動本身也涉及了「轉化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的行使，即其一定程度上也具備著改變事件本來走向的能力<sup>80</sup>。因此，行動者的權力有一部分往往取決於他們在生產關係中的位置；而其在實現目標上的能力(或衍生出來的其他能力)，則相當程度上也受到他們在社會關係中所身處的位置來決定<sup>81</sup>。

上述有助於我們瞭解：過去所謂的文化抗日運動應該與殖民地統治結構之間存在著相互依附的緊密關係，未必可以單純地就立場與訴求來予以分割。事實上，雖然「若要將某個行動界定為行動，而不是界定為純粹的物理運動，我們就必須認為該行動是出於某些理由(reasons)而被執行，而我們可以將信念與慾望賦予行動者，來詳細說明這些理由的內容。<sup>82</sup>」但是，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社會來說，台灣民眾面對殖民體制所採取的行動不應該單純地視作為完全的對立、決裂，而應該也具備著援引殖民統治結構資源的這個面向。因此，反抗殖民體制固然是歷史評價的重要條件，但尤其重要的應該是行為與「利益」之間的關連，即不單單只是了解到「欲求」，還包括了如何地去「實現」<sup>83</sup>。

柯林尼可斯認為，利益並不是欲求本身，而是在一定的環境下，可能以哪些方式來實現這些欲求。以及，這些實現的能力往往取決於行動者在生產關係中所得來的力量。所以，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刊物的傳播與發展也就成為本論文主要採取的觀察途徑，並且試圖藉此理解：文化抗日為什麼產生？又憑什麼採取文化抗日運動中的各種手段？

另外，行動者的欲望與力量之間的互動便往往是動態的，同時個體的行動者在相同的利益考量之下，也可能形成各種集體狀態(collectivities)來追求利益<sup>84</sup>。因此，透過柯林尼可斯對於結構、行動、結構能力與利益的相關描述，有助於本

<sup>78</sup> 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134

<sup>79</sup> 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209

<sup>80</sup> 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211

<sup>81</sup> 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217

<sup>82</sup> 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229

<sup>83</sup> 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280

<sup>84</sup> 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289。

論文去理解：日本統治時期殖民統治結構與文化抗日運動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在文化抗日運動之外的其他行動，也得以在跳脫民族主義、反殖民論述的框架之外，重新地得到再次討論與關注的空間。

## 六、陳逢源(1893-1982)

本論文之所以將世代議題與陳逢源進行連接，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施懿琳於 2000 年發表的論文所影響<sup>85</sup>。該文沿用原本由林莊生所提出來的「二世文人」一詞，認為如陳逢源等出生於日本領台以後、卻在少年受過漢文教育，是與林獻堂、洪棄生、傅錫祺等有所差異的台灣漢文人。

林莊生與施懿琳的差異在於：林莊生將「一世」與「二世」文人的區隔標準建立在乙未割台這樁政治事件；但是在施懿琳的論文當中二世文人本身跨越新舊文學領域的生命經驗，以及他們在革新與守舊中的巧妙平衡，才是論文當中真正用來區分一世與二世文人的判別標準<sup>86</sup>。不過，即便一世、二世文人在閱讀時容易產生與世代有所類似的印象，但是施懿琳在論文中並沒有明確地對世代這個概念進行分析。或者說，一世與二世文人在使用時並沒有經過詳細的定義，只是沿用了一般大眾透過時間斷限或者歷史事件作為區分世代的標準而已<sup>87</sup>。

是故，本文認為還是必須將關於「世代」本身的討論延後至周婉窈於 2003 年出版的學術專著，她自承在研究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歷史時才開始注意到「世代」這個議題，並且嘗試性地將那些過去主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新興知識份子稱為「乙未戰後新生代」。她認為：「世代」形成的基本條件包括了：1. 世代的形成與界定往往來自於「人格形成期(formative years)」、2. 「共同的歷史經驗」、以及 3. 「他們之間的共通性往往凌駕其他的歧異」<sup>88</sup>。這個定義源發於西方學術圈對於世代的討論成果，而世代理論的相關討論與運用自施懿琳與周婉窈以降，成為了近年來台灣研究(特別是漢古典文學)的新興議題，包括柳書琴與林麗美等人皆曾經發表過與世代有關的研究成果<sup>89</sup>。

<sup>85</sup> 施懿琳，〈試析日治時期南都詩人陳逢源及其詩——兼談「二世文人」的類型與作品特色〉，「2000 年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美國加州聖塔芭芭拉大學主辦，2000，(原件不注頁碼)。

<sup>86</sup> 施懿琳，〈試析日治時期南都詩人陳逢源及其詩——兼談「二世文人」的類型與作品特色〉。

<sup>87</sup> 即便(一)受過漢文教育與(二)乙未割台後才出生的這兩個條件，可以被認為是區分「一世」與「二世」的標準。但是，該論文中所討論的對象陳逢源，其出生的年份事實上是 1893 年，為台灣仍屬於清國政府統治的時間當中，明顯地與林莊生的說法有違。不過，本論文提出陳逢源的出生年份，並非肯定出生於何時的這個條件真的可以作為「區分」世代、社群等等的標準，相反地，將某一歷史事件的時間斷限作為區隔標準的這個錯誤認知、刻板印象，才是本文接下來將進行論辯、挑戰的對象。

<sup>88</sup>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台北：允晨，2003)，頁(1)、(6)。

<sup>89</sup> 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台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收錄於《台灣史研究》第 14 卷第 2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7 年 6 月。林麗美〈乙未改隸世代文人的知識視野與社會實踐——以連橫為例的探討〉，收錄於《異時空下的同文詩寫：台灣古典詩與東亞各國的交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二)》，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台灣文學系合辦，2008 年 11 月 29-30 日。

陳逢源，自四十歲遷居台北後時號「南都」，筆名有「芳園」等等，除了取李白詩據「會桃李之芳園」的意思外，「芳園」與「逢源」亦為近似音。其年幼時曾就讀私塾，後來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任職於日商三井會社。根據陳逢源個人的說法，他因為不滿當時台灣人與在台日人的差別待遇<sup>90</sup>，進而在辭去職務以後，加入台灣民族社會運動<sup>91</sup>。陳逢源不僅參與了撤廢六三法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同時也自 1922 年六月起開始在《台灣》發表文章，進入了後來成為台灣文化協會系統的筆仗陣營。縱觀陳逢源的生命歷程，整個日治時期(1895-1945)恰好是他前半生的精華時段，尤其他又擔任《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的記者，在報章中發表的諸多文章，更是台灣人公共輿論形成的成因之一。因此，陳逢源雖然並非被突顯為台灣民族運動中的英雄人物，但是關於生平或文章等的前行研究，卻已經有諸多的討論<sup>92</sup>。

至於相關文獻方面，除了一般簡介其個人生平的傳記以外<sup>93</sup>，在 1991 年由林本源基金會所出版的《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中的一篇訪問中，內容包括陳逢源個人的生平簡歷，以及其對特定議題的表述與回顧，另外諸如未出版的訪談口述稿等，都是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學界對陳逢源的注意，則必須等到 2000 年施懿琳發表〈試析日治時期南都詩人陳逢源及其詩——兼談「二世文人」的類型與作品特色〉一文，才正式地將陳逢源個人推至學術研究的舞台。施懿琳以林莊生在《懷樹又懷人》<sup>94</sup>中提出來的說法為依據，將陳逢源歸類在出生日本統治後的台灣，接受過漢文教育的「二世文人」，並進一步討論其個人的詩文特色。論文中指出：「二世文人往往可以兼跨新舊文學兩個領域，在於「他們一方面可以保有漢文化的特色，卻又不致流於保守僵化；他們有新文化的批判特色與革新精神，卻又不致完全被統治者的強勢文化所主導，而失去自己的文化根苗。」<sup>95</sup>

至此以降，有關陳逢源的研究不僅著重在漢詩方面的創作成果，同時更也與其在台灣人當中的世代歸屬產生扣連。2002 年，李貞瑤的學位論文<sup>96</sup>與謝國興的陳逢源傳記<sup>97</sup>相繼寫成，為陳逢源的個案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李貞瑤主要繼承指導老師施懿琳開創的研究議題，就陳逢源的漢詩創作理念、文學活動與漢詩特色作出詳細的介紹。謝國興則是在陳逢源後人的委託之下，利用大量的私人相片、訪談記錄與史料，夾敘夾議的沿著陳逢源的生平作出詳實的記錄，雖然囿於傳記的性質，部份爭議與議題尚有深入挖掘討論的空間，但仍不失為全面瞭解傳

<sup>90</sup> 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台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11)，頁 132。

<sup>91</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台北：允晨，2002)，頁 82。

<sup>92</sup> 整理過往對陳逢源個人身份的描述，可以發現大多將其形容成：(1)台灣現代啟蒙的新知識份子；(2)民族社會運動的直接參與者；(3)商業鉅子；以及(4)傳統詩人等幾種面向。

<sup>93</sup> 如張炎憲、李筱峯、莊永明編，《台灣近代名人誌》(台北：自立晚報，1987)。

<sup>94</sup>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台北：自立晚報，1992)，頁 238。

<sup>95</sup> 施懿琳，〈試析日治時期南都詩人陳逢源及其詩——兼談「二世文人」的類型與作品特色〉。

<sup>96</sup> 李貞瑤，《陳逢源之漢詩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sup>97</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台北：允晨，2002)。

主生平經歷的有效工具。另外，陳逢源的漢詩作品雖然在戰後曾經結集為《煙山溪雨樓詩存》問世，但是他在戰前撰寫的社論或評述，卻直到 2006 年才由海峽學術出版社委請黃頌顯結集成《陳逢源選集》<sup>98</sup>。黃頌顯在書中另外撰寫了〈日據時期陳逢源的政經思想〉<sup>99</sup>，更讓本書在保存史料並予以普及化的效果外，更幫助讀者瞭解陳逢源戰前的論述思路。

2008 年陳翠蓮於《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書中首次嘗試分析陳逢源於 1920 年代發表論述的知識基礎<sup>100</sup>。透過分析陳逢源的閱讀材料，陳翠蓮在關於現代文明的傳播與繼承、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合作競爭關係、台灣人在現代文明上的接受與轉化等方面，都為本論文的書寫架構開創許多的思考路徑，也提供不少的論述基礎。

## 七、台灣印刷媒體世代(the Taiwanese Print Media Generation)

首先必須說明的是，本論文並非將印刷媒體世代等同於過去所謂的知識份子或者是傳統文人；同時也並非是將印刷媒體世代視作為傳統文人的轉型、或者是與知識份子有著相同內涵的另一個名稱。事實上，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之間過去的爭論提醒本論文重新探究世代概念的豐富意涵；進而發現諸知識份子或傳統文人等過去被視作為不同的社會群體，他們終究可以是一個特定世代之所以形成的基礎來源，而無法自我完成一個、或自其群體中細分出不同的世代。

在世代的概念之外，透過「結構—行動」的觀點則有助於本論文避免去將親日、抗日的標籤附著在特定的社群之上來予以褒貶。同時，透過對於行動的瞭解與認識，也有助於本論文避免陷入相對主義的迷失，而將不同的行動投以完全相同的歷史評價。本論文所透過的途徑是，利用台灣民眾對於印刷媒體此一媒介的共同參與過程，重新地去詮釋台灣民眾如何地從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構當中，取得行動、乃至於反抗的動能。而正因為在這個發展的過程當中具備著一定程度的集體特徵，所以透過世代概念便有助於理清所謂「集體」的指涉與內涵，與以往的前行研究進行對話。

因此，在台灣印刷媒體世代(the Taiwanese Print Media Generation)的發展過程當中，實際上也體現了由結構衍生行動、從自在世代往自為世代移動的這個論述。正如同，結構能力是行動者憑藉自己在生產關係中的位置所擁有的力量，台灣民眾在早期透過投稿、參與日人報刊媒體組織等間接的方式之後，到了接近 1920 年代之際開始不分籍貫、區域、教育背景、使用文字與文類、文化認同傾向等條件等等都明顯地開始試圖去掌握印刷媒體，以建立並散布屬於他們自己的輿論與訴求——不管那些意見究竟屬於政治、社會、文學或文化——由一個本來

<sup>98</sup> 黃頌顯編，《陳逢源選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

<sup>99</sup> 該文原題為〈日據時期陳逢源的政經思想(1913 年—1931 年)——抨擊台灣總督府的施政為中心〉，發表於《華崗社科學報》，第十八期，2004 年 6 月。

<sup>100</sup> 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台北：遠流，2008)，頁 106。

的自在世代轉變為自為世代。

本論文以為：這樣子的歷史變遷，實際上不應該僅僅只視其為來自於海外日本內地大正民主風潮的影響所及，應該也與台灣本地的社會結構變遷有著一定程度的關係。殖民地統治下的台灣社會結構提供了台灣民眾直接或間接參與現代印刷媒體的實際經驗，包括過去稱呼的傳統文人或者知識份子，他們都同樣經歷了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也同樣受到了來自海上運輸網絡與台灣島內縱貫鐵路交通網絡逐漸成形的具體影響；並且也在殖民地教育的興設與前往日本留學的風氣日漸普及等因素影響下，開始處在相同的文化場域與世代位置。但是，這個受到殖民統治所影響的社會結構本身還是存在著讓台灣民眾取得結構能力的縫隙，漢學教育與報紙漢文欄、漢文記者的依存，國語學校等殖民地教育機構所傳達的現代知識，以及包括《台灣教育會雜誌》等等的投書管道，都讓台灣民眾逐漸地學習到現代知識，以及如何去參與、介入現代印刷媒體刊物的運作與經營。

在本論文所要討論的範疇當中，這些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途徑去接受、參與並創造印刷媒體組織、印行刊物的台灣民眾，事實上應該已經符合曼海姆論述當中實存世代的構成條件，也成為了這個印刷媒體世代當中的世代單位。到了 1920 年代左右，這些世代單位開始透過對於印刷技術——即生產關係的掌握，不分文類、文字、知識傾向地都同樣地投身於印刷媒體的發行傳播當中。因此，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形成與台灣人在印刷媒體生產關係中所佔據的位置有著相當程度的關連。1896 年日系資本伴隨殖民統治來到台灣，台灣傳統漢文人隨即透過擔任漢文欄記者、投稿，以及參與詩社聯吟、出版合集等方式參與活字印刷媒體刊物，伴隨日本統治以降，台灣人更因為殖民地現代化教育、社會教育、書局、書籍流通等因素，擴大了他們對於印媒體刊物的接受與認識，也增加了他們對於世界的理解與想像。

自 1919 年《台灣文藝叢誌》創刊以降，台灣人從此逐漸地從成立屬於自己的印刷媒體組織、掌握印刷技術與設備，直至產生屬於台灣人自己的論述與輿論。這股熱潮持續延燒至 1943 年才因為戰爭的關係中止，但隨即又在戰後 1945-1947 年燃燒，至 228 事件後才終止。這前後自 1919 至 1943 年約 24 年期間，一定程度上提供台灣人歷史罕見地、得以掌握印刷媒體刊物的時代，從而也促發了世代位置的產生。況且，戰前印刷媒體可謂台灣社會最有效力之宣傳工具，也是台灣人唯一得以掌握、與日人相互競爭之宣傳工具，更有其代表性色彩。

印刷媒體世代更明確地指涉其必須為日本統治時期處在現代印刷媒體傳播影響下的台灣民眾；尤其更強調其後來對於印刷媒體刊物的積極參與，甚至於額外延伸出一股不同於過去的、抵殖民力量。印刷媒體世代與過去所謂傳統文人的差異在於：清帝國統治時期的台灣文人即便存在著區域性的社團組織，但在受到交通環境與印刷媒體刊物缺乏等因素的影響下，並不存在公共空間以及共同的集體意識。換言之，傳統文人本身只能被視作為是指涉相同文化背景的個體泛稱，



未必具備了是所謂世代的組成要件。因此，本論文所謂的台灣印刷媒體世代主要是指：在 1895 年以降，受到現代印刷媒體生產、傳播流通，以及殖民地現代教育及殘存的書房教育、海外留學經驗等因素影響之下，具備閱讀、書寫單一或多種文字的基本能力，處在相同文化世代當中的台灣人士(自在世代)；同時，在考量自在世代與自為世代的差別之下，也更為強調始自 1919 年以降，逐漸透過發行報刊雜誌介入輿論，取得發言權的部分台灣民眾(自為世代)。

透過印刷媒體世代的觀點一定程度上雖然避免了重覆以往使用民族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立場對於台灣民眾進行政治方面的歷史評判，但是就在觀察 1920 年代台灣文化抗日運動的實際情況以後，還是可以發現在「同人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三者合而為一，進而組成所謂台灣文化抗日運動陣線之際，其實也是印刷媒體世代(自為)世代成員具備最大動能的時候。另外，在導入「利益」的觀點之下，本論文也認為在試圖瞭解日本統治時期諸多論爭的形成與變遷時，藉由印刷媒體世代彼此分立、結盟與對抗等各種現象來進行討論，有助於將過去所強調的文化抗日論述更進一步地予以複雜化、多面化。

總而言之，過去的研究往往過分地強調政治立場上的區隔，進而忽略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民眾本身在政治運動方面的空間限制，以及伴隨著時間環境變化而形成的各種轉向、妥協。因此，本論文所著眼的便是從文化來予以著眼，就文化本身的媒介，即印刷媒體的角度思考當時台灣民眾普遍存在的文化環境，以及其共同的感受與實踐來著眼，提出所謂台灣印刷媒體世代作為未來觀察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文化場域運作變遷時的另一個角度。

### 第三節、研究範疇與方法

#### 一、研究範疇

本論文的研究範疇大致包括了：歷史社會學、知識社會史與媒體傳播史等不同領域，同時也由於論文本身所涉及到的概念，研究個案的相關著作等緣故，與世代、殖民地台灣的政治經濟論述有所連結。

所謂的歷史社會學，指的是過去 20、30 年來學界嘗試結合已然被分離的歷史學與社會學的學術傾向。過去由於兩大學科對待「社會學理論」與「歷史敘事」的態度有所不同，因此近年來也有學者再一次地提出所謂「勸合不勸分」的提議。

對社會學家而言，歷史學家似乎以還原先人的活動為理想，排斥因果結構式的思考，乃至概念的使用。……反過來，社會科學家在從事歷史研究時

卻往往被歷史學家責備為不夠細膩，乃至於削足適履的使用史料。<sup>101</sup>

柯志明的這番話，正好揭露了社會學與歷史學之間的衝突與矛盾。歷史社會學並不是將史料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工具予以處理即可；同樣地，歷史學家對於史料的焦慮其實也和社會學家對於適用理論的追求一樣深切。因此，一旦史料的範圍永遠無法被確立邊界，那麼研究者所能夠採取的態度，終究還是在找尋史料的過程當中確定準備解決的問題，並且在原本採用的理論當中，進行適當的修訂、添補，或者根本性的重新創造一套理論。

研究中反覆地從往返於理論與史料當中，並且持續修正本來就是一條持續的過程<sup>102</sup>，本論文雖然無力在理論的層次上提出創見，至少在史料的整理與利用社會學對於「世代」概念的既有成果，嘗試整理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與印刷媒體的互動關係。同時，也因為涉及到印刷媒體在台灣的傳播發展概況，進而也與印刷媒體本身所承載的資訊、知識產生連結，碰觸到知識社會史的相關領域。

本論文的書寫概念是將台灣的媒體傳播史與知識社會史視為互為表裡、一體兩面的同一個範疇。印刷技術讓不同時間、空間的人可以藉由同樣的典籍，進而研究相同的對象，有助於知識標準化、或者讓人得以觀察對象在時空推移下產生的具體變化。知識社會史討論的議題便是試圖將我們習以為常的「常識」抽離至其原先存在的體系<sup>103</sup>。其中，本論文在包括美國、德國與法國這幾個不同的研究體系當中，又特別著重於德國卡爾·曼海姆將個人想法的社會背景與時代、國家/民族、社會階級、世代進行連結的概念<sup>104</sup>。

清領時期籠罩台灣社會的是以刻板印刷為主的漢字知識圈；待到日治時期以降，以現代化印刷技術為主、企業化經營為導向的印刷媒體產業，開始對台灣社會與知識階層產生不小的衝擊。因此，本論文從印刷媒體在台灣的發展情況出發，進而延伸至所謂「現代的知識<sup>105</sup>」究竟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開始被引入台灣？與清帝國時期又存在著什麼樣的不同？

本論文從國家的層次出發，認為教育體系與讀書裝置對於知識的傳播與被認識過程有著不可被取代的關鍵作用；另一方面，商業發展與都市的形成同樣也影響到印刷媒體的發展，決定了知識流通的方向與路徑；再者是，從個人的角度看

---

<sup>101</sup> 柯志明，〈序言〉，收錄於柯志明，《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頁 iv。

<sup>102</sup> 柯志明〈序言〉，收錄於《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vii。

<sup>103</sup> 彼得·柏克著，賈士衡譯，《知識社會史》（台北：麥田，2003），頁 27。

<sup>104</sup> 彼得·柏克著，賈士衡譯，《知識社會史》，頁 31。

<sup>105</sup> 這裡使用「現代的知識」一詞，在於並不詳細區分現代化或現代性二者之間的區別。又，「知識」一詞的使用，與「資訊」有所差異。延用彼得·柏格的說法，即「資訊」指的是較「生的」、特定的和實際的，與「知識」所代表的深思「熟慮的」、處理過的或系統化的。參考彼得·柏克，賈士衡譯，《知識社會史》，頁 42。

來，知識的傳播不僅對個人的生命產生影響，更重要的是，個人在受到知識的影響之後，同樣可能回過頭去轉化、製造或再生產知識，從接受的那端轉變成具有創造動能的對象。

所以，本論文所涉及到的研究範疇便不僅包括了知識份子、印刷科技或者出版產業，它同時也會與學術機構、都市、交通運輸、讀書裝置與教育體系等諸多的面向產生關連。在「結構」的層面上，本論文討論印刷媒體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以及台灣民眾與印刷媒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另外在「行動」的層面上，則選擇利用陳逢源作為討論的台灣人個案，思考印刷媒體對於個人精神史範疇，即包括了認知、認識與認同等層面所造成的影響<sup>106</sup>。

##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既然討論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誕生，並且以日治時期台灣人陳逢源為個案，討論的面向便不單單只是印刷媒體世代本身，也與前行研究的以往成果相互補充對話；另外，像是理論與個案之間彼此適切與否等等，也都是本論文的論述焦點。

由於印刷媒體世代作為本文在論述時的抽象概念，時間與空間方面則設定在日本統治時期下的台灣社會，以及因為印刷媒體流通而涉及到的東亞場域。所以不管是社會學理論或者是當時的社會背景等歷史知識等等，都是本論文試圖去吸收、運用的研究基礎。世代理論方面，本論文將利用對前行研究的爬梳、比較，進而與現行既有的研究成果進行對話；歷史情境方面，則是利用當時的報刊、書籍、前行研究成果以及個案藏書目錄等材料，建構當時印刷媒體傳播及其與台灣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個案研究方面，則將就陳逢源個人於日本統治時期所書寫的文化啟蒙、政治、經濟論述出發，尤其著重於其生命經歷與上述論述架構的彼此對照，以求在前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下作更進一步的詮釋與延伸。

是故，本論文的書寫順序將按以下的層次開展：首先，本論文將就時代與世代的關係進行說明，並且在時代定義的更迭與世代運用的紛雜當中，界定時代與世代之間的關連性。再者是，透過整理以往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間並置、對立與交混等等的情況，延伸討論所謂印刷媒體世代的形成，並且就曼海姆的世代理論解釋何謂自在世代、自為世代以後，對所謂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作出明確的定義。

理論之外，本論文則將簡單論及清帝國時期台灣社會的教育與出版情況，並且說明何以文教化與雕版印刷日漸普及之下，台灣社會還是無法形成所謂印刷媒體世代的主要原因。接著在配合世代位置、實存世代與世代成員的理論架構下，

---

<sup>106</sup> 事實上，由於世代研究往往著眼在學生運動或戰爭期的相關討論，所以關於世代的討論往往與個體或群體的精神史研究有所關連。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參考 Rebert Wohl, *The Generation of 1914*, 1979: 5.

本論文將解釋日本殖民體制究竟如何改造、同時又因襲台灣傳統的社會結構，進而讓台灣人民逐漸地由文化啟蒙轉變為反抗意識的發展過程，並闡述當時世代單位林立所指涉的歷史現象、意涵與價值。

關於本論文的個案討論對象陳逢源，前行研究以往大多偏向針對其特定類型的文本進行分析，而未能綜合不同文類的作品進行詮釋與論述。另一方面，生平傳記又往往受限於篇幅，有關傳主的著作分析大多敘多於論、淺嘗輒止。是故，本論文企圖在結合世代理論與歷史論述的情況下，針對陳逢源的生平、教育背景與不同類型的文本進行綜合性的分析。啟蒙論述方面主要關注其個人的讀書興味與著作間的關連；政治論述上則強調其與許乃昌、蔣渭水的論戰；經濟論述則配合其記者的職業身份，就殖民地經濟自治論、戰時期的經濟論等議題來進行討論。

#### 第四節、論文章節提要

本論文所採取的論述脈絡，乃是從理論到論述進而以個案歸結。第一章主要就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研究範疇等進行說明。第二章則解釋本論文何以提出印刷媒體世代的主要原因；藉由比較時代與世代、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之後，再進一步以卡爾·曼海姆的世代理論為主軸，闡明本論文所主要使用的理論架構。第三章則將上述理論放入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社會的實際發展情況，並且藉由世代位置、實存世代與世代單位，說明清帝國統治時期與日治時期 1920 年代以前台灣印刷媒體的發展情況，另外也論及到 1920 年代以降，印刷媒體世代的發展概況及其彼此的互動關係，即從知識社會史的角度重新思考 1920 年代的台灣社會、文化抗日運動。第四章則以本論文所討論的個案——陳逢源為主要核心，從其家世背景、生命歷程及著作內容等等，配合第三章的論述為其歷史身份作出重新的詮釋與定義。第五章則就本論文的最終成果，以及未來可以發展修正的部分進行總結。

###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將就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研究範疇等進行說明。

### 第二章 清帝國統治時期台灣社會發展與教育、出版情況

第二章本論文將自台灣作為漢人移民社會的歷史情境出發，討論民變與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形成，以及社會領導階層如何地從土豪轉變為士紳，從而與台灣文教化的發展過程產生連結。

即便 1860 年代以降台灣在士紳階層與清帝國的協力下逐漸地文教化，但是受限於交通限制與刻板印刷媒體刊物內容與形式上的特徵，台灣人既無力形成一個「一島性」的社會，也無法透過出版量少、製作費時的刻版印刷刊物形成同時性與現實性的特徵，無法形成「世代」。但是，清帝國時期所形成的漢文化根基

與穩定的社會秩序，一定程度上還是為後來的發展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基礎。

### 第三章 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誕生

第三章本論文先簡單說明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教育與出版情況，再利用卡爾·曼海姆的世代觀念，就所謂世代位置、實存世代與世代單位等三項要素來定義何謂台灣印刷媒體世代。本論文以為：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之所以形成。在於日本帝國在施行統合政策的過程當中，一方面企圖改變台灣社會，一方面又必須接受台灣社會原來既有的階級結構，進而在雙軌的教育機制與文化場域中形成了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位置。當西方現代文明的啟蒙觀念等藉由殖民地教育與印刷品流通等方式傳播來台之際，就讀於總督府國語學校、醫學校等大多屬於台灣士紳、地主後代的台灣籍學生，也就成為了購買、閱讀相關印刷媒體的主要成員。

因為印刷媒體管制與傳播的影響，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位置也體現了文化交疊區域所具備的多元性特徵，同時也具備了管制與反抗這兩種不同的特質。至於實存世代的形成，主要則來自於傳統儒學教育在殖民教育體系發展過程中逐漸地被現代教育合併取代；再加上圖書館等讀書裝置的普及設立，都一再地壯大台灣印刷媒體世代成員的規模。甚至於連僅僅受過漢書房教育的台灣士紳也可以透過書局、社會教育、讀書裝置等吸收現代文明的啟蒙知識，籠罩在同樣的文化氛圍當中。因此，假如從教育與印刷媒體的角度予以觀察，則不管是過去被稱為是傳統文人或知識份子的台灣民眾，其實都可以被放入所謂「印刷媒體世代」的概念框架當中。

至少在 1920 年代左右，過去所謂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不分島內外都開始積極主動參與印刷媒體組織的成立與印刷媒體的印行與傳播。同時在企圖凝聚其他台灣民眾的目的之下，逐漸地從本來的自在世代轉變為後來的自為世代。不過，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實存世代固然具備了現代文明、啟蒙開化的基本認知，但是意識啟蒙與反抗意識之間的關係本來就不是一條必然的鏈結。本文想呈現的是：印刷媒體世代中的各個世代單位當時往往處在彼此分立、結盟或者對抗的關係。研究者必須接受的歷史事實是：由於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社會接受文化啟蒙的層面不停地壯大，所以不論是政治、文化或者是語文等等的喜好與信仰，也都實際地影響了世代單位之間的互動關係，也進而成為後繼研究者的褒貶依據。

因此，提出印刷媒體世代這個概念的目的並不在於界定究竟誰可以被歸類在所謂的印刷媒體世代。相反地，印刷媒體世代這個觀念所著重的焦點在於：1. 世代單位當中成員各自接受或參與印刷媒體的生命經驗；2. 世代單位內，成員與成員之間的利用印刷媒體所形成的人際網絡；3. 世代單位與世代單位之間彼此分立、結盟或者對抗的歷史過程；4. 印刷媒體世代當中實存世代，即台灣民眾與印刷媒體生態之間互動影響的具體生活樣貌；5. 印刷媒體世代與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論述有效性並不僅僅停留在文字，至少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以及戰後初期台灣報紙、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出版發行的情況<sup>107</sup>，就可以得知在台灣歷史中真的存在著一群像本論文所描述一般，積極介入參與印刷媒體刊物運作的台灣人，試圖透過印刷媒體書寫他們的歷史、改變他們的台灣。而他們所完成的一切，其實也正是本論文所觀看與關注著的那個世界。

#### 第四章 個案研究：以陳逢源(1893-1982)為代表

本論文在第四章將以個案陳逢源的日治時期經歷為主軸，從其作為地主之後，歷經書房教育與殖民地現代教育的學習背景，以及其對漢詩、經濟學等知識領域的喜好，思考殖民地印刷媒體傳播與語文重疊之間的相互關係。自第二節起，本論文將以文本研究的方式，從陳逢源自 1920 年代自 1930 年代的著作出發，分別討論其啟蒙論述、記者身份與政治論戰。在本章節的一連串討論當中，本論文將藉此證明上述對於所謂印刷媒體世代的諸多論述所言不虛，透過陳逢源的家世與漢學背景，可以瞭解晚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到了日治時期的殘留現象。

另一方面，陳逢源受教於總督府國語學校，後來又加入文化抗日陣營的經歷，體現的則是文化啟蒙與反抗意識之間的連帶關係。陳逢源從投稿《采詩集》、《台灣》到後來擔任《台灣民報》記者的經歷，其發表在報刊媒體上的各類著作，反映的是印刷媒體世代成員有異於清領時期台灣士紳在道德教育中的專長，日益現實化與專業化的傾向。最後，陳逢源與許乃昌、蔣渭水的政治議題論戰，以及陳逢源在經濟方面展現出來的論述專長，都顯示出當時台灣印刷媒體世代成員彼此分立、對抗的種種跡象。

#### 第五章 結論

本章總結全文，首先論述本論文的研究成果，以及其對當前日治時期台灣學研究所可能存在的具體貢獻。再者是，論述本論文在撰寫過程中所可能存在的缺失與盲點，並說明本研究在未來繼續發展時的可能性，或者是必然面對到的質疑與挑戰。

---

<sup>107</sup> 劉寧顏編，《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六，(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頁 44。



## 第二章 清帝國統治時期台灣社會發展與教育、出版情況

### 第一節、從地方豪族到「士紳」(gentry)

#### 一、移民社會與民變

本論文的討論焦點雖然放在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形成脈絡，但是在考慮到歷史連續性，以及試圖與清帝國統治下台灣何以未能形成印刷媒體世代的原因進行比較，故先就 19 世紀末期清帝國文教系統擴張與台灣如何形成「士紳」(gentry)階層的發展歷程出發，再與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發展概況進行比較，以瞭解士紳階層在印刷媒體世代形成過程中的貢獻與侷限。

雖然近年來以漢人為中心的「開發」史觀已經受到了一定的批判與反省<sup>108</sup>，不過如果從印刷媒體輸入台灣的面向來看，16 世紀開始的大航海時代與明鄭時期以降漢人持續渡海來台的移民過程，終究還是台灣與印刷媒體產生連結的主要原因。荷蘭人為了傳教上的需求，曾經在統治時對西部平原的平埔族進行荷蘭式的宗教教育，統治者不僅曾經從荷蘭進口相關書籍，內容還包括以新港文書或其他文字所撰寫的教理問答等等<sup>109</sup>。迨至明鄭時期，即便在陳永華的建議之下於承天府興建了孔廟，並且在廟旁設立明倫堂，以及在各社里設置學校，制定科考制度等等。不過明鄭時期的文化傳播，充其量只停留在社會教化事業，而印刷或出版事業只有初步的發展<sup>110</sup>。

當時流通於台灣的印刷媒體主要是以源自於中國的木刻雕版印刷為主，與後來日治時期的現代活字印刷有著截然不同的經營型態與文化功能。事實上，活字印刷術雖然較早在中國便由畢昇所發明，但在技術上的限制與使用上的未見普及下<sup>111</sup>，直到 20 世紀才重新在中國社會中被運用。相較之下，活字印刷在歐洲

<sup>108</sup> 比如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與許極燉《台灣近代發展史》等書都可以視為是此類的代表性著作，然而，諸如此類以「漢人中心史觀」出發的批評，一定程度上並無法推翻二書在台灣學研究中的學術價值，或者說，輕率地以此類言語進行攻訐，本身已缺乏了對於歷史環境的理解與同情。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美國：蓬島文化，1980)；許極燉，《台灣近代發展史》(台北：前衛，1996)。

<sup>109</sup> 相關的研究可以參考包樂史著，林偉盛譯，〈懲罰與悔恨：早期福爾摩沙的政教關係〉，《台灣文獻》49 卷第 4 期，台北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 266-286。與興瑟著，翁佳音譯，〈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台灣的教育事工〉，《台灣文獻》51 卷第 4 期，台北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頁 33-57。

<sup>110</sup> 根據楊永智的研究，明鄭時期已有刻工隨軍來台，並有成品遺世。楊永智，《明清時期台南出版史》，頁 13-43。

<sup>111</sup> 如果按照奎娜爾的說法，則中國在活字印刷術上與西方的不同處在於：首先，中國也曾經使用金屬活字作為印刷的工具。不過，有別於西方以澆鑄的方式鑄字，中國於十八世紀用來印刷《古今圖書集成》的銅質活字，是以直接鑿字於銅的方式作成。再者是，活字印刷必須使用大量的金屬、人工與存放活字的空間，進而讓刊刻的成本過於龐大；另外，中國慣用的墨汁也並不能直接轉換成印刷用的油墨；最後，同時也是本論文以為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在於，中國文字的書寫特質與文人雅士的閱讀習慣，未必可以接受一定程度上犧牲書法風格的金屬活字。可參考：費夫曼、



自被古騰堡(Gutenberg)發明以後便在宗教與商業要素的催化下而影響了往後 500 年間世界知識生產、傳播與複製的流程，並且進一步地誘發了印刷刊物在形式與內容上的分化。

台灣因為位處於清帝國統治的邊陲，原本就是控制力較不足的地區；再加上人事政策上的設計不良，文武官員彼此推拖牽制等等的原因，進而導致了分類械鬥與民變的頻頻發生<sup>112</sup>。然而，印刷媒體的傳播並不僅僅只需要如印刷器材、工匠以及紙張等生產條件，其實也還包括如文化與知識的普及化、民眾對知識的崇拜與需求等。因此，一旦企圖討論台灣自清帝國統治以降對於(刻版)印刷媒體的需求，則在渡海政策的循環反覆<sup>113</sup>與移墾社會本身浮動不安等因素影響下，其實是相當受到懷疑的。清帝國統治初期，台灣社會屢屢發生民變與械鬥等等的重大事件。根據劉妮玲的研究，「民變」一詞指涉的是：1、就客觀條件上，凡人民直接對現政權採取任何敵對或抗爭之暴力、不法行為，若其行動的最後指向是現政權，則構成民變；2、站在當權者主觀立場而言，如果由於懷疑人民的行為舉動可能危害政權根本生存，所採取的因應措施，也構成民變的狀態<sup>114</sup>。至於民變的起因，則有所謂習性說、習見說、失政說、失業說以及種姓說等等不同的看法<sup>115</sup>。

因為受到清帝國禁止攜眷的禁令、以及經濟情況限制的影響，造成了許多無產無業、無親無故的單身漢丁，也就是台灣社會俗稱的「羅漢腳」，。這些男子隻身在外，往往藉用籍貫、職業、姓氏等名目結為朋黨，每有細故，便呼朋引伴、聚眾滋事，若有差池，則往往由械鬥轉為民變，進而在一定的區域內引起不小的騷動<sup>116</sup>。首先，這些「無某無猴」的遊民不可能具備印刷媒體發展所需要的——擁有識字能力的讀者群；再者是，當時屢屢受到亂事影響下的台灣，即 19 世紀以前的台灣社會也還沒有能力發展出具有相當規模的印刷產業<sup>117</sup>。再加上，台灣械鬥的組成份子雖為遊民，但領導者卻多為具有科名、富戶身份的地方豪族<sup>118</sup>。

---

馬爾坦著 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頁 48-58。

<sup>112</sup> 劉妮玲，《清代台灣民變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1983)，頁 36-94。

<sup>113</sup> 關於清帝國渡海禁令的弛嚴反覆，藉由戴炎輝的整理，大致呈現出如下的狀況：1712 年再申禁令；1719 年再申禁令；1732 年准搬眷入台；1740 年禁止搬眷入台；1744 年搬眷解禁；1748 年復禁搬眷；1760 年准攜眷屬渡台，但隻身無業並無親屬者，仍在禁止之列；1874 年渡航禁令解禁，翌年實施。轉引自黃昭堂著，廖為智譯，《台灣民主國研究》(台北：前衛，2006)，頁 8。

<sup>114</sup> 劉妮玲，《清代台灣民變研究》，頁 9。

<sup>115</sup> 劉妮玲，《清代台灣民變研究》，頁 33-34。

<sup>116</sup> 過去關於台灣分類械鬥的記載，往往將之形容成「鼓動全台」的規模。然而，根據林偉盛的研究，台灣民變大多有其區域性與按照地理區域發展的性質。除此之外，從械鬥「地方化」的歷史現象可以幫助讀者瞭解當時並不存在著一個「完整」的台灣，而這樣的歷史事實，在後來也的確影響了清帝國與地方豪族之間的妥協與合作關係。可參考：林偉盛，《羅漢腳：清代台灣社會與分類械鬥》(台北：自立報系，1993)。

<sup>117</sup> 當然這方面的相關史料還相當地匱乏，但從楊永智於《明清時期台南出版史》中所列舉的幾個事例來看，台南印坊松雲軒及其出版品的鼎盛時期於 19 世紀的 1830-1862 年之間，或許可以暫時充當間接上的證據。楊永智《明清時期台南出版史》，頁 284。

<sup>118</sup> 事實上；正因為不管是為了保護自己或者征服別人，地方士族私蓄家丁與囤積武器的現象在當時的台灣社會其實相當普遍。然而一旦涉及到軍事力量，與地方政府間的衝突與矛盾便也往

從量化統計的分析看來，台灣民變主要以因社會治安問題所衍生出來的為主，不管以數量或規模大小為標準，幾乎都占所有事件的 3 分之 2 以上<sup>119</sup>。另外，從遊民在自 1684 年開始到 1888 年的 204 年台灣民變史中活躍了近 4 分之 3 的時光，到最後 35 年才被地方豪族取代其在民變中的核心位置看來<sup>120</sup>，更可以確定台灣民間對於印刷媒體的需求，必須待至 19 世紀以降台灣社會逐漸文教化以後，才可能愈趨的強烈與迫切。

## 二、社會地位特殊團體：土豪與士紳

根據許達然的研究，18 世紀與 19 世紀的台灣民變促使了台灣社會結構的轉型與重整。民變的產生與過程固然帶來台灣社會一時的混亂，但是民變最後一成不變的失敗結果，反倒促使了部份因帶頭協助清帝國平亂的台灣人士得以享受與一般民眾不同的生活方式、教育、品味、頭銜、聲望與特權，形成「社會地位特殊團體」<sup>121</sup>。這些團體的形成與增強或多或少都與民變有所牽扯，民變的起事者雖然具有反抗意識，但在缺乏社會意識，也不見得想要消除既存體制的情況下，反而往往成為了部分平民利用平亂以取得文武頭銜、成為軍功團體進入上層社會的墊腳石<sup>122</sup>。

台灣民變的頻率在 1865 年以前雖然比 18 世紀還要高上一倍，但 1865 年以後卻比 18 世紀還低的現象<sup>123</sup>，當然可以被視為是地方豪族各自選擇與清帝國對抗或合作的最終結果——只是反抗的恰巧都被消滅，而留存下來的則都選擇了妥協。於是從此台灣的地方豪族開始有了新的身份，他們透過軍功或藉由取得文化象徵資本進入「社會地位特殊團體」，成為我們後來更習慣稱為士紳的一群人<sup>124</sup>。

張仲禮指出：士紳所代表的是透過取得功名、學品、學銜與官職的一群人而組成的特殊集團。功名、學品、學銜指的是該對象的受教育背景；而官職則大多只授予通過考試證明的人<sup>125</sup>。不過，由於取得士紳的途徑存在著「正途」與「異途」等不同的方式<sup>126</sup>，台灣新興士紳階級往往也經歷了與清帝國合作、背叛、動

---

往在所難免。參考林偉盛，〈第八章 分類械鬥的參與成員〉，《羅漢腳：清代台灣社會與分類械鬥》。

<sup>119</sup> 劉妮玲，《清代台灣民變研究》，頁 252-254。

<sup>120</sup> 劉妮玲，《清代台灣民變研究》，頁 290。

<sup>121</sup> 事實上，許達然所使用的「社會地位特殊團體」一詞，從形成的過程與涵蓋的對象來看，大抵即為過去慣用的「士紳」。許達然〈十九及十九世紀台灣民變與社會結構〉，《台灣文獻》51 卷第 2 期，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頁 61。

<sup>122</sup> 許達然提醒的是，「對要擠進或穩住社會特殊階層的他們，協助平亂不是無意義的經濟賭注，而是有報酬的權力投資。」可參考：許達然，〈十九及十九世紀台灣民變與社會結構〉，《台灣文獻》51 卷第 2 期，頁 116。

<sup>123</sup> 許達然，〈十九及十九世紀台灣民變與社會結構〉，《台灣文獻》51 卷第 2 期，頁 120。

<sup>124</sup> 關於「士紳」一詞的內涵與討論，張仲禮可謂為代表性的學者，然而其著作在中國翻譯的版本當中，卻是使用「紳士」，而非台灣學界慣用的「士紳」。在此簡單說明如上。

<sup>125</sup> 張仲禮著，李榮昌、費成康、王寅通譯，《中國紳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3。

<sup>126</sup> 正途指的是透過科舉考試成為士紳的人，異途所指的則是透過捐納而取得士紳身份的人。張仲禮著 李榮昌、費成康、王寅通譯，《中國紳士研究》，頁 3。

亂與平亂等過程，而始終保持其與台灣的連結與社會上的特殊地位<sup>127</sup>。

台灣的士紳階層一開始大多仰賴抵制民變、捐納的方式，形成他們與清帝國之間的效忠關係，後來則藉由參與科舉、通婚、經商等種種途徑，強化、維持、複製他們所佔據著的領導階級位置。於是 19 世紀台灣社會的文化發展不可避免地終究與社會權力的穩固有所關連，而士紳階級的出現則相當程度地擴大了清帝國企圖在台灣推行的「文教系統」。如同台灣地區在清帝國統治時期下所建立的 62 間書院當中，至少有 16 間便是由士紳所設立的<sup>128</sup>，並且在硬體設施的建設外，士紳階層與文教系統也將他/它們所服從的清帝國社會體系與規範模式，傳達給那些——尤其更多是在「皇家遙控，而官紳共治」結構下被犧牲的台灣民眾理解與認同。

於是，清領時期台灣印刷產業的發展與台灣人對印刷媒體刊物的接受，終究還是必須等到清帝國末期台灣民變史的主要核心份子：地方豪族在歷經衝突與矛盾，最後與官方達成妥協、逐漸形成士紳之後，才可能得到發展的社會環境與時空條件。以下，本論文便先行針對清帝國統治末期台灣社會「文教系統」的擴張進行討論，說明何以「印刷媒體世代」必須待至日本統治時期才能夠真正誕生的主要原因。

## 第二節、清帝國統治末期台灣社會文教系統的擴張

### 一、近代化與文教化

所謂清帝國統治末期台灣社會文教系統的擴張，指的是 19 世紀以降清帝國在台灣所進行的政治近代化改革、以及因此而逐漸鞏固的中國傳統教育體制。這套來自於中國的教育與考試制度早在 19 世紀以前就已經被引入台灣<sup>129</sup>，但是直到 19 世紀的 60 年代，即 1860 年左右才是它真正開始發揮效力的時點。

根據李國祁的研究，台灣在光緒期間(1875-1894)總共成立了 11 所書院，占整個清帝國統治時期書院總數的 29.73%；另外，越接近 19 世紀後期(1851-1894)，台灣人考中進士舉人的數量也超出以往各時期許多(舉人 106 人，占 23%；進士 21 人，占 72.41%)。此一台灣文教化的具體成果<sup>130</sup>，顯示出清帝國統治末期的政治近代化改革與台灣文教系統的擴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sup>127</sup> 郭伶芬，〈清代台灣知識份子的經濟活動〉，《靜宜人文學報》第 2 期，台中：靜宜女子大學文學院，1990 年 10 月，頁 119-141。

<sup>128</sup> 王啟宗，《台灣的書院》(台中：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87)，頁 12-17。

<sup>129</sup> 康熙 23 年台灣縣府成立，同年即有台灣縣儒學的成立。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台北：故鄉出版社，1986)，頁 15。

<sup>130</sup> 李國祁認為，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台灣武舉人人數於咸豐、光緒年間掛零的現象，也為台灣文教化的另一項證據。李國祁，〈清代台灣社會的轉型〉，《中華學報》5 卷第 2 期，(台北：中華學報社，1978)，頁 149-150。

要而言之，由於科舉制度的推行，以及先賢對文教事務的極力提倡，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台灣的士紳階級業已完全成長，取代過去豪強之士的領導地位，成為社會中的權力份子。此種社會權力結構的改變，不僅意味著台灣社會的轉型，實亦表示出：從此台灣已發展成與內地完全相同的社會，其內地化的發展已得到極高的成功。<sup>131</sup>

如果科舉制度與教育體系是中國文治社會的實踐形式，則儒學便無非是其主要的精神內涵<sup>132</sup>。清帝國統治時期的學術思想雖然主要以朱子學為主流，不過由於受到了民間信仰與台灣移民社會的影響，同時也滲入了例如文昌帝君等原來並非屬於儒家思想的宗教成份<sup>133</sup>。因此，台灣文教系統的擴張不僅必須從宗教與教育兩方面來同時著眼<sup>134</sup>，同時包括儒學、書院、義學、社學等地方各級教育機構的成立，也都與台灣士紳的積極參與有所關連<sup>135</sup>。

比如清末台灣政治近代化的過程，主要來自於沈葆楨、劉銘傳等人的施政措施所影響。沈葆楨的開山撫番主要是積極的鼓勵內地居民來台，並著重於開發台灣東部區域，為一具備明顯武裝殖民色彩的開發策略。另外，沈葆楨改革原先頗令人詬病的吏治，並重新調整了台灣行政區域的劃分，將台灣北部調整成為另一個政治中心；丁日昌則於開山撫番外，更重視於番民的教養同化，並且也較積極地利用台灣士紳作為政策施行的管理者；不過，就在丁日昌因為人事傾軋而離開台灣後，繼任的吳贊誠與岑毓英等皆因為任期不長而影響了在台灣施政成果。

不過，關於台灣現代化的建設推動，還是有賴劉銘傳抵台就任以後，才得到較為全面的發展。中法戰爭之際，因為重點放在全島的防務，所以劉銘傳鼓吹台灣士紳組成民兵協防全島；並且在中法議和以後，不管是開山撫番、清查地賦等施政措施，多必須利用台灣社會的士紳階層作為執行上的有力助手<sup>136</sup>。

在用人方面，劉銘傳的番政與彼其他的事務相同，都是重用士紳，實行官紳合治的。非僅在征勦開路方面，他將地方土勇與官兵配合使用，林朝棟

<sup>131</sup> 李國祁，〈清代台灣社會的轉型〉，頁 155。

<sup>132</sup> 李世偉，《日據時代台灣儒教結社活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頁 9。

<sup>133</sup> 陳昭瑛〈台灣的文昌帝君信仰與儒家道統意識〉，收錄於陳昭瑛，《台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頁 10。

<sup>134</sup> 李世偉在討論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的儒教結社，就會區分成「學藝性」跟「宗教性」兩個種類。

<sup>135</sup> 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地位特殊團體在文教方面的積極參與，事實上也反過頭去加強鞏固了他們原先在社會上便占據的有利位置。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頁 569。

<sup>136</sup> 然而，由於受到與劉璈政爭的影響，劉銘傳大多與北部的台灣士紳較有往來，尤其是板橋林家。李國祁，〈清季台灣的政治近代化〉，《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 8 卷第 12 期，頁 5-11。

負責中路征勦，立功厥偉，即正常撫墾事務，他亦仿照丁日昌辦法，重用士紳，以林維源任撫墾局總辦，各地撫墾局亦容公正士紳為參議局務……故銘傳所興辦的撫墾局不僅是官紳合辦的機構，也是軍務政務合一的。他的番政與墾務仍是具有沈丁時代的特色，具有軍屯或武裝移墾的性質。<sup>137</sup>

由此可知，台灣社會的文教化並非意指台灣社會地位特殊團體的去武裝化，相反地，台灣士紳/鄉紳仍然具備著相當程度的武裝，只是被清帝國政府予以合法化，成為幫助清帝國進行征服、鎮壓的統治工具而已<sup>138</sup>。所以，台灣文教化的社會基礎並非建立在清帝國統治勢力與一般民眾之間形成了「官民一氣，上下翕然」的連帶關係。相反地，其實是台灣士紳與清帝國政府結合成為一種「官紳共治」的統治秩序。黃富三指出：

傳統的專制王朝，政治、經濟大權集於帝王一人之手。然而，一人之力實無法掌管大中國的大小事務，因此勢須將執行權分散於其下之官僚、士大夫。而官僚、士大夫亦須強力皇權為後盾，以形成支配萬民之特權階級。簡言之，皇朝的維護需要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組織與地方分權的士紳階級充分配合，方能圓滿合作。<sup>139</sup>

這個權力結構表面上平等分責，事實上強調的卻是「皇權→官權→紳權→民權」之間的上下位階關係。這種情況同樣反映在清帝國統治末期的台灣宗教與教育機構等各方面，尤其在書院與科舉的層面，更看得到士紳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 二、書院發展與台灣社會

台灣在納入清帝國版圖後的教育制度幾乎與內地各省相同<sup>140</sup>。清帝國於中央設有國子監，隸屬禮部，為國家最高的教育及教育行政機構。地方上則在府、州、縣各設府學、州學、縣學等，統稱為儒學，又可稱為學宮、文廟、聖廟，即今日的孔廟；起初各地區首長多擔任縣之教諭或府之教授，不過由於儒學後來「課而

<sup>137</sup> 李國祁，〈清季台灣的政治近代化〉，《中華文化復興月刊》，頁 12。

<sup>138</sup> 關於清末開山撫番的諸多政策，李國祁所認為的評價，即：「這種武裝移墾形態無論如何是與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絕不相同，蓋其最終的目的在壓迫使番民內地化，使之成為中華文化的一份子，絕無滅其種族，強佔其領土的用心。」等語，今日看來，令人匪夷所思。李國祁，〈清季台灣的政治近代化〉，《中華文化復興月刊》，頁 12。

<sup>139</sup> 黃富三，《霧峯林家的中樞》（台北：自立晚報，1992），頁 19。相關研究可參考：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台北：谷風出版社翻印，1987）。

<sup>140</sup> 不過由於台灣在建省以前離福建省過於遙遠的緣故，故另設一員學政，由道員兼理，負責全台文教方面的相關事務。李國祁，〈清代台灣社會的轉型〉，《中華學報》5 卷第 2 期，頁 148。

不教」，所以各地區對於文教方面的需求，便由各地成立的書院來予以彌補<sup>141</sup>。

從書院史表，可看出書院創辦，純官建者十一所，純民建者十所，官民合建者六所，其餘未考。至於維持費則幾乎都是官民共同籌劃，有官撥公款、官置學田、官捐資金學田、民捐資金學田等，甚至有衙門訟案判決罰金歸書院者(明志書院)。<sup>142</sup>

依據上述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台灣書院的創辦與維持大多與地方人士的支持有著相當的關連。台灣書院雖然是有別於一般學校(官學)的教育系統，並且在儒學乏力、義學書房層級太低、社學廢絕的情況下而成為台灣學術教育的中心。但是其在發展的過程中卻因為受到政府的監督、指導之下，而漸漸地偏向以科舉作為目的<sup>143</sup>。

台灣書院的發展跟隨土地開發而逐漸從南向北移動<sup>144</sup>，乾隆以前大多由官憲所建，乾隆後則多由地方官紳所建。以明志書院為例，則明志書院便是由寓居該地的汀州府永定縣例貢生胡焯猷於乾隆 28 年(1763 年)捐獻、屬於地方士紳興設的私學。而它本來的經費來源主要是胡焯猷於書院興建當時一併捐充的學田 80 餘甲，以及乾隆 34 年(1769 年)由監生郭崇嘏所捐之學田近 190 餘甲。不過，書院的經費來源後來愈顯不足，於是才有個人一次性的捐款，或者是將互控案件的判決罰金歸為書院所用的種種情況<sup>145</sup>。

越接近清帝國統治末期才建立的台灣書院，不僅開始出現單純由民間所創建的現象(如屏東雪峰書院、臺北樹人書院、苗栗英才書院等等)；同時從民間書院必須自籌經營費用的情況看來，更可以確認台灣士紳所代表的重要位置。台灣文教化的結果從家族個案中可以得知：包括施琮芳、施士浩父子一同考中進士；林廷璋、林遜賢與林國芳、林維讓叔侄同榜皆為舉人；鄭用錫諸兄弟等也都有科舉功名的情況，不僅可以以此來理解何以台灣社會至同治、光緒年間便已發展出已獵取功名為重的社會價值，更可以用來確認台灣士紳本身對於科舉功名的強調與重視。

上述顯示：不管是與清帝國地方官員在政治上的合作關係，或者是台灣文教機構的成立與經營、科舉制度的施行成果，台灣士紳事實上都扮演了相當關鍵的主要角色。尤其從台灣士子科舉中第後並不熱衷前往中國內地任職，大多返回鄉

<sup>141</sup> 可參考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頁 14-15。詹雅能，《明志書院沿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2002)，頁 17。

<sup>142</sup> 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頁 39。〈書院史表〉則收錄於該書頁 72-83。

<sup>143</sup> 王啟宗，《台灣的書院》(臺中：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87)。頁 4。

<sup>144</sup> 王啟宗，《台灣的書院》，頁 18。

<sup>145</sup> 詹雅能，《明志書院沿革志》，頁 34-38。

里從事地方上的建設活動看來<sup>146</sup>，清帝國統治末期台灣地方書院與私塾的林立，也可謂為此種趨勢下所產生的成果。

總而言之，中國文治社會的主要特徵在於結合科舉制度、教育體系與儒教文化，台灣社會在 1860 年代以降在近代化浪潮的推波助瀾之下，加速了對於科舉制度與書院教育的接受程度，也更強化了土豪階級的身份轉換。以下，本論文將進行論證：由於台灣「內地化」發展與新學/西學在 19 世紀末期台灣社會中的缺席、印刷媒體本身在時間要素上的匱乏等因素影響下，造成台灣社會雖然自清帝國統治末期便進入了印刷媒體時代的時空環境，卻未能產生與之相對應的印刷媒體世代。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終究還是得至日本統治時期以降才登上歷史的舞台，無疑與清帝國統治末期台灣教育體制本身的意識型態，以及當時台灣印刷媒體的出版型式、印刷品的內涵等都有著相當程度的關連。

### 第三節、傳統儒學教育與公共空間的缺乏

#### 一、儒學典籍與道德教育

關於清帝國統治末期台灣文教系統的擴張成果，過去大多以台灣科舉及第的人數與書院發展的趨勢作為台灣接受「儒學」、「儒教」的直接證據。不過，如果從印刷媒體的角度來著眼，則台灣文教化的過程事實上也牽涉到台灣本地書坊印刷品生產以及中國印刷品輸入的種種現象，更與台灣文教化本身的精神內涵：儒學，以及參與者：士紳階層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

這些過去被李國祁視為是台灣社會逐漸「內地化<sup>147</sup>」的論述依據，無疑間接地反映出當台灣士紳吸收並建置所謂漢文化教育體系之際，新學與西學在 19 世紀末期台灣社會的非主流情況。造成十九世紀台灣社會變遷的原因，主要來自於台灣社會重心因經濟繁榮發展而逐漸向北移動，以及移墾者逐漸地由平原向山區遷移。然而，台灣地區雖然自 1860 年以降開港通商，卻因為並非是西方勢力的主要活動地區，以及地方政府與台灣士紳的合力倡導下，不僅和同時期的浙江、福建等地區有著一定程度的落差<sup>148</sup>，甚至其實是意外地保存了中國傳統的文教制度與意識型態。

本論文在底下的討論當中，將藉由當時台灣社會所流傳的儒學典籍，從其內容與印刷出版的方式等來進行說明：何以台灣社會自清帝國統治末期便進入了印刷媒體時代的環境當中，卻未能即時產生印刷媒體世代的主要原因。過去在台灣

<sup>146</sup> 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頁 572-573。

<sup>147</sup> 以往的研究當中，「內地化」論述往往被用來與陳其南的「土著化」論述進行比較。但是，「內地化」與「土著化」的爭辯一者可能根基於彼此在研究取徑方面的學科差異；二來也可能是來自於各自討論對象的群體指涉有所不同，因此而形成了乍看之下彼此衝突、其實互為補充的兩種學術觀點。關於陳其南與李國祁的論述分析，可以參考陳孔立〈清代台灣社會發展的模式問題：評「土著化」和「內地化」的爭論〉，陳其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頁 61-75。

<sup>148</sup> 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頁 536-598。

被稱作為「儒教」、「儒學」的教育或思想內涵，在討論其發展脈絡前有必須先作簡單介紹的必要。在杜維明的論述當中，儒家學說則被認為是人類創造性轉變的集體行為，並且是對於上天的對話式回應；牽涉到包括：自我、群體、自然和上天等與人性相關的 4 個層面<sup>149</sup>。而所謂的「儒學」、「儒教」，則大多用來指稱：發源於孔子、歷經中國歷史發展而逐漸衍生出來的學術體系。而儒家的形成不僅僅與中國社會各方面的發展緊密扣連，同時更是東亞場域在前現代時期所共享的文化要素。

受到當時中國科舉制度的影響下，台灣在清領時期的儒學接受上乃是以朱子學為主流。朱子學不僅因為作為國家認定考試的標準而被學習；更由於台灣的讀書人大多同時具備了士紳、鄉紳、地主、社會地位特別團體等身份，恰好與《大學》中所強調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統治邏輯結構不謀而合<sup>150</sup>。所以朱子學成為了清代儒學的基本性格，而這個特徵持續延續到乙未割台前都並未中斷<sup>151</sup>，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也始終和書房、儒學保持緊密的關係。

書院的興建雖然受到地方士紳的大力支持，但不可忽略的是，在學規方面則反映出當時儒學思想的根本意涵，以及清帝國方面的意識型態。在教學形式方面，雖然與今日功課表的意義不同，但書院的授課亦有進度與考核的標準。書院的學生每天都得按照「功課程簿」修習，每月也得按照科舉的考試內容接受檢驗<sup>152</sup>。另外，從書院的教學內容上來著眼，則書院不僅教授朱子學與應付科舉的八股文而已，書院的重要功能之一，便在於培養士人具備「明倫知禮」的基本認知<sup>153</sup>，大致上都不脫離道德教育的基本精神與範疇<sup>154</sup>。所以，可以確定的是當時台灣社會已存在著相當數量的讀書人口<sup>155</sup>，士紳階層與書院不僅為台灣社會提供持續成長的識字人口，同時台灣與中國的印書坊則提供各種不同種類的書籍作為讀書人口的閱讀資源。

就目前的史料可以得知：當時在臺灣流通的印刷品大致可以區分成：1.官方刊刻；與 2.民間印行兩種。至於印刷品的產地則包括了：1.臺灣本地的刻書坊，如松雲軒、德化堂等；與 2.來自中國東南沿海城市(尤其是福建省的刻書坊，如

<sup>149</sup> 杜維明著，陳靜譯，《儒教》(台北：麥田，2002)，頁 29。

<sup>150</sup> 川路祥代，《殖民地台灣文化統合與台灣傳統儒教社會》(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頁 45。

<sup>151</sup> 陳昭瑛，《台灣儒學》(台北：正中，2000)，頁 1-36。

<sup>152</sup> 月初為「官課」，中旬與下旬是師課，而考試結果則有相關的獎懲。

<sup>153</sup> 即一方面是有人與人之間的行為關係；另一方面則是以禮節作為方法來達成維護倫理的目的。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頁 39。〈書院史表〉則收錄於該書頁 25。

<sup>154</sup> 例如陳昭瑛在利用「海東書院學規」與「儒學詩」等文本進行分析後的結果，便不僅呈現出台灣文人的教學情形、教育制度、讀書方法的真實情況，同時也證明了當時中國傳統文化在台灣的普及現象。陳昭瑛，〈儒學在台灣的移植與發展〉，《台灣儒學》，頁 25-33。

<sup>155</sup> 由於清帝國統治時期缺乏書院學生的統計人數，從日本總督府於 1907 年起的統計數據趨勢，大致可以得知，台灣書房、書院每年的就讀人數應在兩萬人以下。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頁 209。



福州、泉州、同安、彰州、廈門等<sup>156</sup>。至於當時在臺灣流通的印刷品種類，則有：1.藝文類：如《赤崁集》、《北郭園全集》、《繡像荔枝記陳三娘歌》、《海音詩》等包括文人雅士的作品與民間歌謠；2.史地類：如《臺灣外紀》、《平臺紀略》、《東征集》、《裨海紀遊》等；3.方志類：如《臺灣府志》、《諸羅縣志》、《重修鳳山縣志》、《臺灣風土記》等；4.宗教類：如《金鋼經論》、《心經》、《四聖真經》、《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5.雜類：如《化番理諺》、《巡臺退思錄》、《治臺必告錄》、《請纓日語》等<sup>157</sup>。

進入清帝國統治末期的文教化階段以後，臺灣因為穩定的社會結構、鞏固的臺灣士紳階層與日益增多的地方書院等等的條件之下，成為了印刷品輸入臺灣或就地生產與傳播的良好環境。臺灣社會開始普遍以書院作為教育體制的主體，同時也形成了將科舉及第作為讀書人學習終極目標的廣泛風氣。於是這個以朱子學為主、強調倫理道德的教育內涵不僅一定程度地讓臺灣社會進入了中國傳統的禮教圈，同時也在臺灣的受教育群眾中形成共有的生命經驗與知識基礎。

然而，印刷媒體世代為什麼仍然沒有在上述的環境中形成，事實上，便牽涉到傳統儒學教育過度強調道德教育的特色，以及科舉制度對於讀書人的影響。另外，同時也是本論文認為最為重要的一點，在於清帝國統治末期臺灣印刷媒體本身所缺乏的「同時性」與「現實性」這兩點特質，影響了臺灣讀書人之間的公共交往，也限制了實存世代的誕生。

佐藤慎一認為：1860-1890 年間同時在中國與日本所各自進行的洋務運動，不同的地方在於日本所存在著的是「文明開化」的口號，而中國所擁有的則是「附會」的邏輯<sup>158</sup>。然而在上述有關「內地化」的討論當中，已經說明了當中國正進行著洋務運動的同時，台灣才剛剛進入到以中國式文教系統為主的社會型態，換言之，當時台灣社會所擁有與傾向不但並非是「文明開化」或者是「附會」的邏輯，而是在清帝國統治中已逐漸顯現出疲態的科舉制度與儒學知識。

科舉制度對於台灣讀書人的影響層面，包括了固定的詩文寫作能力與關於儒教經書的知識。另外，民間不能在未經官府許可以前刊刻書籍<sup>159</sup>，不僅讓台灣印刷品在內容上並不存在與官方意識型態對立、對抗的立場<sup>160</sup>，同時也讓接受傳統

<sup>156</sup> 楊永智，《明清時期台南出版史》（臺北：學生書局，2007）。頁 316-318。

<sup>157</sup> 印刷品類型的(一)、(二)、(三)、(五)乃整理自《重修臺灣省通志》；(四)則取材自對於楊永智著作《明清時期台南出版史》中所觀察到的出版現象。

<sup>158</sup> 佐藤慎一著，劉岳兵譯，《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與文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10。

<sup>159</sup> 如順治九年「臥碑」中便明令，第 8 條：「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組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陳朝龍，《新竹縣採訪冊》，頁 167-169。轉引自楊永彬，〈日本領台初期日台官紳唱和〉，若林正文、吳密察編，《台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頁 109。

<sup>160</sup> 宗教類的善書在廣泛的界定下可以被歸類在「儒教」當中；藝文類則大多為民間歌謠或詩文作品，也大多不牽涉到時事、更別說是論政。至於所謂的「儒學詩」，則更不存在著反抗或批判儒家思想與清帝國統治的思想與內容。

漢書房教育的台灣民眾，難以取得官方立場外的圖書資源。加上台灣的讀書人雖然受到了儒家經典的薰陶，但在科舉及第後卻鮮少赴中國出任官職，而是大多返回鄉里擔任地方上的頭人要角。所以，台灣讀書人在印刷品內容的限制與社會實踐上的缺乏等因素下，便明顯地未能與當時的清帝國文人同樣地去面對國家所面臨的窘境、欠缺了所謂「文明開化」的智識眼光。

書院教育固然為台灣社會製造出一批擁有基本閱讀能力的群眾，並且在當時的台灣社會當中，這些識字的群眾也都已經是較具印刷媒體消費能力與消費習慣的社會階層。但是，印刷媒體世代之所以無法在清帝國統治時期形成，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當時的印刷媒體本身並不具備諸如「同時性」時間特質；以及那些士紳階層及其子弟們在台灣社會仍然缺乏有效而持續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sup>161</sup>之下，無法形成訴求於民間大眾共同支持的、關於現實的概念與認知。

## 二、「同時性」與「現實性」的缺乏

印刷媒體世代之為什麼未能在清帝國統治時期浮現，或許來自於傳統儒學教育過度強調道德教育的特色，以及科舉制度對於讀書人的影響。另外，同時也是本論文認為最為重要的一點，在於清帝國統治末期台灣印刷媒體本身缺乏「同時性」與「現實性」這兩項特質，不僅影響了台灣文化菁英之間的公共交往，進而也限制了實存世代的誕生。媒體研究當中，速度與數量往往是觀察出版物流通時的兩個重要的切入點。換言之，「同時性」與「現實性」之所以成為兩項彼此互為因果的關鍵要素，在於這關係到一定區域內的讀者能否透過接受印刷媒體以形成所謂的「共同的集體意識」<sup>162</sup>，而這其實也是實存世代之所以得以形成的根本基礎。

清領時期台灣縱貫鐵路尚未通車，南北交通的縱貫往來費時耗日，再加上印刷產業的落後，導致缺乏定期發行的期刊與報紙。當時台灣社會只存在著書籍這種類型的印刷品，而那些具有「同時性」與「現實性」特徵的近現代媒體刊物諸如雜誌、報紙等，則大多必須透過自外國、外地輸入至台灣。當時台灣文人不管是閱讀方志、歌謠或者是其他人的詩文創作都較不具備對應外在現實時空的特別意義。換言之，當時台灣人的閱讀行為往往只著重在自我與書籍的精神交流，而不需要考慮與其他個體就知識或意識型態交換意見的必要性。刻版印刷技術印行的書籍在刊刻速度與數量上的限制，進一步地影響了台灣讀書人在同一時間內接

<sup>161</sup> 「公共空間」(public space)與「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不同，在於前者指的是在社會與國家之間人們實現社會交往與文化互動的場所；而後者則是哈伯馬斯所提出的、具有鮮明批判功能、代表社會公共輿論的概念。許紀霖等著，《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公共交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5。

<sup>162</sup> 永嶺重敏在序言中指出，「讀書國民」主要為識字率與文字書寫能力的普及，以及具備讀書習慣的國民的形成要素，形成的要素則主要不脫因為鐵路運輸與新聞出版業的企業化發展所形成的媒體流通網。然而，一旦將這些概念放入台灣的時空當中，則清帝國統治時期的台灣是否屬於缺乏閱讀人口的社會？事實上，永嶺雖然刻意標出了時間與數量這兩項要素，但重點應該更放在時間性質的層面，而未必是數量上的爭議。因為應該被思考的是，清帝國時期與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閱讀人口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不同，而非數量上的差異。永嶺重敏，《讀書國民的誕生：明治30年代の活字メディアと讀書文化》(東京都：日本エディタ，2004)，頁i-viii。

受相同知識的可能性<sup>163</sup>，尤有甚者，台灣文人在清帝國政府嚴禁士人結社與批評時政的種種限制之下，也無法開拓出一塊足以供眾人討論、交換意見的公共空間。

在中國的歷史當中，國家與社會、公與私的概念並不是自明的，界限也十分地模糊，因此士紳們一方面以儒家學說作為自己的公共認同，但又同時成為了國家在地方統治上的中介<sup>164</sup>。如同台灣的士紳階級在 1960 年代台灣逐漸文教化以後，事實上有更多的時候服膺的是帝國的制度與秩序，而非一般老百姓的思維與認知。因此，台灣文教化發展影響所及的台灣人士雖然大多來自於具備士紳身份的家族背景，也一同經歷了劉銘傳等帝國官吏所推行的新政，閱讀著相近地緣、印刷方式、內容的印刷媒體刊物。但是，這些主要共享了朱子學意識型態與刻版印刷媒體的台灣民眾之所以無法形成「印刷媒體世代」的原因，終究還是在於他們在地理交通不足的限制之下，無法形成得以串連彼此的公共空間，更無力創造獨立於官方之外的意識型態與論述<sup>165</sup>。

清帝國統治末期台灣之所以開始文教化卻未能產生印刷媒體世代的主要原因在於：1. 讀書人口之間的交流過於仰賴人與人的親身接觸，而非使用印刷媒體作意見的交換<sup>166</sup>；2. 當時讀書人口所擁有的知識範疇在比例上太偏向於道德層面的哲學智慧，而非現實生活上的具體知識<sup>167</sup>；3. 讀書人口在圖書取得來源方面受到官方與印刷媒體生產、流通上的限制，不易取得、發展非官方意識型態的知識與認知；4. 讀書人口與印刷媒體之間的關係過於偏向接受面上的閱讀層面，而非具有創造性的創作與出版<sup>168</sup>；5. 讀書人口的創作文類本身並不訴求讀者、消費者的意見回饋，而是單純地停留在意識型態與知識的傳播面向<sup>169</sup>。

<sup>163</sup> 楊永智，《明清時期台南出版史》，頁 273、294。

<sup>164</sup> 許紀霖等著，《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公共交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6。

<sup>165</sup> 不過，當時台灣社會亦有部分以新港文書所撰寫的宗教書籍，或者是少量來自西方的各式著作，例如清帝國統治末期台灣紳商李春生便曾經閱讀過《天演論》，而且有相關的書籍出版。然而，由於當時台灣社會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數有限，又私人取得島外報刊、書籍的情況實屬特例，故不列入本論文的討論範圍當中。筆者想強調的是，清領時期台灣人接受現代知識的情形，事實上是相當「因人而異」的，與日本統治時期的廣泛普及現象有著相當大的區別。可參考：黃俊傑主編，《李春生的思想與時代》（台北：正中書局，1995）。

<sup>166</sup> 例如，清帝國統治末期的台灣地方官員多與地方文人頗有來往，例如唐景崧便組有「斐亭吟社」、「牡丹詩社」等，與台灣士紳唱和。楊永彬，〈日本領台初期日台官紳唱和〉，若林正丈、吳密察編，《台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頁 105-106。

<sup>167</sup> 這方面可以參考楊永智於其著作中針對明清台南地區出版的詳細書目。楊永智，《明清時期台南出版史》。

<sup>168</sup> 清帝國時期一方面受到政府禁止，以及財力上的限制，大多數文人作品多以稿本、抄本的方式流傳，進而亡佚。除少數人因家產或得到他人幫助，才能夠付印出版。黃美娥，《古典台灣》，頁 45。

<sup>169</sup> 這點同樣可以從楊永智著作中明清時期台南地區出版的詳細書目中發現，當時的台灣出版品本身往往缺乏對話、回應的現象。而從諸如李春生、洪棄生等人的時論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一方面其於日治以前的作品往往必須寄至海外發表；另一方面，則是這些文章往往呈現出各言爾志、而非眾聲喧嘩的發表現象。這種情況當然來自於當時台灣社會缺乏交通條件與現代報刊的限制，追根究底，則都可歸咎在當時的台灣社會並非是一個完整的「共同體」。可參考，林淑慧，〈清末台灣政經思想—以文人論述為主軸〉，莊萬壽編，《第四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

上述種種情況限制了「同時性」與「現實性」的形成，無法讓當時的台灣人處在一個共同的社會意識當中。透過上述內容可以得知：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雖然是印刷媒體刊物得以散佈的原因之一；卻終究不是印刷媒體世代得以形成的主要條件。台灣社會必須直至日本統治時期以降才形成了一島化的規模，而透過印刷媒體傳播而形成的世代也必須自伊時浮現。

#### 第四節、小結

回顧以往對於歐洲與中國印刷媒體的既有評價，可以得知所謂「印刷術乃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相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維護中國民族文化統一的一種基礎工具。<sup>170</sup>」的這種說法並非無的放矢。但是，清帝國統治時期的印刷出版產業仍然維持在傳統手工業與維護道德義涵的教育功能，進而也與西方印刷媒體的工業化生產與商業經營等模式格格不入，更無法形成類近於西方的——各民族賴印刷術的發明、普及而引發了理智思潮，誘發民族語言、文學與國族主義思潮的最終結果。

本論文透過清帝國時期台灣士紳階級的形成，得知台灣社會在由拓荒社會轉型至文教社會的過程當中，產生出一批透過軍功或藉由科舉來取得社會、文化資本的特殊階級。這些特殊階級雖然與清帝國一同促成了台灣社會的文教化，但也同時受到交通不便、地方阻隔等限制，而無法在台灣社會形成一個實存的世代。不過，雖然一個具備現實性與同時性的印刷媒體必須待至日本統治時期才來到臺灣，但清帝國統治時期的文教化過程，確實為後來臺灣印刷媒體世代的形成提供了一個相當穩定、健全的社會基礎。

---

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2005），頁 91-107。

<sup>170</sup> 錢存訓，〈印刷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功能〉，收錄於《中國書籍、紙墨及印刷史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2）。頁 239。

### 第三章 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誕生

#### 第一節、帝國統合與傳統依存下的「世代位置」

##### 一、帝國的統合：現代印刷媒體的引進

由於印刷技術與政治、教育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連帶關係，所以也有學者認為：「印刷術乃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相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維護中國民族文化統一的一種基礎工具。<sup>171</sup>」但是，清帝國統治下的台灣在印刷媒體產業的技術上仍然停留在刻版印刷，內容也維持在維護道德義涵的教育功能，與西方印刷媒體產業工業化生產與資本主義化的經營模式大相逕庭，所以在當時無法形成類近於西方——各民族賴印刷術的發明、普及而引發了理智思潮，誘發民族語言、文學與國族主義思潮——的最終結果。

這段始自清朝統治末期的文教化過程，事實上也提供台灣印刷媒體世代之所以成形的基礎。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清帝國統治的情況繼續延續下去的話，藉由書院教育的逐漸普及與科舉考試所帶來的階級流動現象，即便可能性很低，但或許可以摧毀橫互在台灣士紳與一般平民階級之間的落差<sup>172</sup>。然而，1895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的這個歷史事件，意外地讓原本台灣社會正在進行的「文教化」過程，被摻入了「日本」這個有力的變因，使得台灣社會這個以傳統漢文化為主體、原本應該逐漸走向中國化的社會，開始受到了殖民現代性要素的影響。換言之，在清帝國與日本殖民統治的雙層統治結構下，台灣人在傳統與現代的兩個端點之間搖擺移動，更在日本殖民現代化統治下具備了既壓抑、又啟蒙的雙重特質，逐漸發展出不同於日本、中國的特殊樣貌。

過去關於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產業的發展論述，大致存在可以被分類成「壓抑論」與「發展論」兩種不同的意見。壓抑論是指認為台灣人印刷媒體發展受到日本殖民政府阻礙的相關論述<sup>173</sup>；發展論則企圖整理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的發展概況，並企圖對於當時的發展歷程作出分期與定位<sup>174</sup>。然而，壓抑論必須說明的地方在於，它所指的究竟是台灣印刷媒體在發展的過程中受到壓抑？還是台灣印刷媒體的發展空間受到了壓抑？同時，發展論也必須說明：如果台灣

<sup>171</sup> 錢存訓，〈印刷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功能〉，《中國書籍、紙墨及印刷史論文集》，頁 239。

<sup>172</sup> 當然，有關「歷史的可能性」原本並不應該被放入研究的範疇當中，不過關於台灣社會結構中的階級差異是否可能因為科舉而瓦解，雖然在歷史發展的事實中「來不及」找到證據，但至少從社會學理論或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社會階層流動現象來進行觀察，也不禁令人抱持著相當程度的懷疑。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1992）。

<sup>173</sup> 這樣的說法不僅始自於台灣人戰後的回憶與追述，也同時是部分台灣與中國學者的共同看法。黃春丞，〈日據時期之中文書局(上)〉，《台北文物》卷 3 第 2 期(台北：台北市文獻會，1954)。黃春丞，〈日據時期之中文書局(下)〉，收錄於《台北文物》卷 3 第 3 期(台北：台北市文獻會，1954)。辛廣佛，《台灣出版史》(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 3。王天濱，《台灣新聞傳播史》(台北：亞太圖書，2002)。頁 77。

<sup>174</sup>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頁 17-20。

印刷媒體的發展必須待至 1920 年代左右才開始蓬勃發展的話，又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它們必須等到日本殖民統治中期以降才開始展露在台灣歷史的舞台？

台灣在清帝國統治時期除了《府城教會公報》以外並沒有發展出現代印刷媒體刊物及相關組織，所以壓抑論強調的應該是諸如〈台灣新聞紙條例〉與〈台灣新聞紙令〉等在台灣發展印刷媒體刊物過程中的影響。事實上，現代印刷媒體發展所需要的包括龐大商業資本與印刷設備、熟稔印刷術的專業人才以及具備現代知識的記者、編輯，都是在日治時期以降才伴隨著殖民統治來到台灣，進而也誘發了台灣印刷產業的興起與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誕生。

前行研究指出，殖民地台灣近代媒體史發展的大致分期包括了：1.台灣人作為從屬與參與者的草創期(1896-1919)；2.由台灣人所成立的媒體開始出現的展開期(1920-1931)；3.媒體相互混合的擴大期(1932-1938)；4.戰爭統治期(1939-1945)等總共四期的歷史發展階段<sup>175</sup>。透過上面的分期，可以得知台灣自 1896 年起便因為日本殖民統治的到來，而從清帝國統治的刻版印刷時期躍升至發起於歐陸、具備現代性功能與特徵的活字印刷時期。另一方面，透過勞動力與生產工具的觀點，可以發現台灣人在作為從屬參與者的草創期(1896-1919)中只是扮演日系資本印刷媒體產業中的勞動力，而無法掌握生產工具(即印刷技術)。這個限制導致日治初期台灣人只能從屬於日系資本的印刷媒體刊物，而無法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印刷媒體，也無力形成屬於台灣人自己的公共空間、有力的社會輿論。

除了《府城教會公報》以外，台灣原先並未存在現代印刷媒體刊物以及組織，所以自《台灣新報》(1896 年)、《台灣日報》(1897 年)與《台灣日日新報》(1898 年合併《台灣新報》與《台灣日報》)相繼成立開始，便已經正式地將台灣帶入所謂現代印刷媒體的時代情境。況且，日本資本在台灣其他地區也有諸如台北的《台灣日報》(1897 年)、台南《台南新報》(1899 年)，以及台中《台灣新聞》(1901 年)等報刊媒體<sup>176</sup>，大大豐富了台灣印刷媒體的經營圖像<sup>177</sup>。

不過，日本殖民統治雖然為台灣帶來了現代的印刷媒體，但是卻不能忽略，那隨之而來的新聞媒體管制同樣地也對台灣社會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日本領台初期，關於新聞媒體的管制原本援引日本的「新聞紙條例」。1900 年則在台灣頒行了包括「台灣新聞紙條例」、「新聞紙發行保證金規則」、「台灣出版規則」等三項法令，同時又於 1917 年頒行「台灣新聞紙令」，作為日本統治時期新聞媒體管制的主要依據<sup>178</sup>。研究者指出，這些相關的法律條文內容，主要有著下列的幾個面向：1.報紙與雜誌不分；2.採行許可制；3.採保證金制；4.保證金可退還；5.採檢查制；6.發行人身份限制規定；7.明文禁止刊登事項；8.警察直接干涉新聞自

<sup>175</sup>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頁 17-20。

<sup>176</sup> 劉寧顏編，《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六，頁 33。

<sup>177</sup> 王天濱，《台灣新聞傳播史》，頁 86-89。

<sup>178</sup> 王天濱，《台灣新聞傳播史》，頁 78-81。

由等<sup>179</sup>，在在都限制了台灣人去發展屬於自己的印刷媒體刊物，而只能在日系媒體刊物中作為配角與附庸。

《台灣日日新報》在上述的開放與限制拉扯下，自 1903 年起開始在漢文欄上冠上報題，並且自 1905 年起正式發行《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由於其吸收集合了過去清帝國統治時期中所培養的台灣士紳學者，一方面《台灣日日新報》是當時島內唯一設有漢文欄的報紙，又可以迅速報導諸如日俄戰爭、中國革命等國際消息；同時它又更以低價的經營模式(每份四角五分；日文版定價為六角)來打開市場，得到了台灣識字階層的普遍青睞，也成為了當時台灣人吸收現代知識的主要來源<sup>180</sup>。

另外，如果運用國家統合理論的觀看視角，則反映出台灣人作為印刷媒體的從屬與參與者的第一階段，其實也是台灣社會被置入日本帝國的統合過程。

- 一、交通網、土地制度、租稅、貨幣—度量衡的統一、市場的「經濟統合」；
- 二、憲法、國民議會、政府—地方自治體、裁判所、警察—刑務所、軍隊的「國家統合」；
- 三、戶籍—家族、學校—教會、博物館、新聞的「國民統合」；
- 四、國旗、國歌、國語、文字、藝術的「文化統合」。<sup>181</sup>

在西川長夫的統合理論當中，國家統合被反映在政治、經濟、教育與文化等各個方面。不過如果按照駒込武的看法，則所謂的文化統合事實上也應該包括了學校與媒體等<sup>182</sup>。上述不同統合策略所形成的連帶效果，實際上便是在「空間」與「時間」上將日本與台灣之間形成一定程度的連帶關係、一個殖民地統治的社會結構。例如從空間的角度來看，台灣自 1908 年起在電報、郵政與公路、鐵道交通網的建構下逐漸完成台灣「一島化」的工程<sup>183</sup>，同時在台灣與日本之間的海運航路運輸往來下，完成了台灣作為內地日本附庸的「外地」角色<sup>184</sup>。另一方面，如

<sup>179</sup> 王天濱，《台灣新聞傳播史》，頁 83-85。關於這個部份尚可參考：河原功，〈《台灣出版警察報》解說〉，台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台灣出版警察報》復刻本第 1 卷，東京：不二出版，2001，頁 5-24。

<sup>180</sup> 王天濱，《台灣新聞傳播史》，頁 90-91。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頁 66-70。

<sup>181</sup> 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2002)，頁 3。

<sup>182</sup> 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2002)，頁 3。

<sup>183</sup> 關於日本統治以降的對台建設，可以參考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1984:442),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另外，有關台灣鐵路發展則可參考高成鳳，《殖民地鐵道と民衆生活》(東京都：法政大學出版局，1999)。

<sup>184</sup> 除了人口移動的運輸外，更為主要的是在糖、米、茶、樟腦等物產的運輸上逐漸趨逐了英美資本，而由日本企業所掌握。詳細情況，可參考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

果從時間的角度來著眼，則台灣也在午炮、電報與鐘錶的輸入、普及等條件的影響下，進入了大日本帝國的統治體系<sup>185</sup>。

透過「內地—外地」的整合，殖民地台灣不論在空間與時間都逐漸地一體化，成為附著於日本帝國的一塊完整的島嶼。但是，日治初期的台灣存在著帝國統合企圖與傳統社會依存的曖昧情境。如同《台灣日日新報》必須發行漢文版一般，日本總督府固然可以透過提供資金以介入報社的實際運作<sup>186</sup>，但是殖民地新興報刊媒體市場尚待茁壯，除了少數有政府資金支持的刊物外，大多短暫發行幾期就迅速停刊<sup>187</sup>。在 1911 年以前由日本人成立的雜誌大致上就包括了五類、三十餘種<sup>188</sup>，配合上述報刊的發行，一定程度上便轉換台灣過去以刻版印刷刊物為主的圖書市場，也增加了道德、哲學外的其他知識內涵。更重要的是，當現代印刷媒體報刊在殖民地台灣廣泛發行之際，從而也讓過去在清帝國統治時期中並不存在的「同時性」特徵開始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社會成形。

即便日治初期台灣人參與印刷媒體刊物的能動力有限，不過在殖民地現代化教育與接受、參與(任職或者投稿)印刷媒體刊物的實際經驗影響下，終究還是讓台灣民眾逐漸開始部分掌握印刷媒體的生產工具，從原本的自為世代往自在世代前進。至少，藉由《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的出現，已經可以確定那個清帝國時期便形成的士紳階層與其文化傳統，包括漢詩文與漢民族意識等等，並非是在討論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形成時所可以忽略、默視的重要因素。是故，本論文底下便嘗試從台灣傳統地主制與漢文的變遷轉型，討論其對台灣印刷媒體世代所具備的主要影響。

## 二、傳統的依存：地主制與漢文的變遷

當時除了少數參與台灣日日新報社的台灣人士如李逸濤、魏清德等人外，大多是以讀者、業餘投稿者等身份來參與介入 1919 年以前的印刷媒體刊物。同時也因為媒體管制的影響，無法針對殖民地統治的現實情況進行批判。是故，雖然日本統治促使現代印刷媒體的引進台灣，同時也創造第一批參與現代印刷媒體的漢文欄作者。但是，總督府媒體管制政策與台灣出版業剛萌芽的幼稚階段，讓台灣人在形成「同時性」認知時卻無法直接反映在台灣現實情況(即「現實性」)上的不足，更無力創造一個專屬於台灣人自己的公共空間。

這種既發展又受到壓抑的現象，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台灣傳統地主制與漢文在殖民統治情境下的依存現象。台灣民眾利用間接介入、參與日系資本印刷媒體刊物的機會，學習並運用現代印刷媒體發行的相關條件，或者利用內地、外

---

台灣》(台北：台灣史料中心，2004)，頁 49-54。

<sup>185</sup>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1999)。

<sup>186</sup> 石原幸作，《台灣日日三十年史》(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8)，頁 5、9。

<sup>187</sup> 劉寧顏編，《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六，頁 124-127。

<sup>188</sup> 劉寧顏編，《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六，頁 124-126。



地作為不同法領域的現況取得發展空間，結果便是 1919 年以降《台灣文藝叢誌》與《台灣青年》等分別在台中與東京付梓，開創了後續台灣人印刷媒體刊物蓬勃發展，並且社會運動、文化抗日意識型態結合的磅礴年代。

不過，殖民地都市一方面具備了殖民現代性的特徵，同時也與台灣原有的鄉村共同存在於當時的台灣社會，這種既統合又依存的社會現象一方面呈現出「內地(都市)—外地(都市)—外地(鄉村)」的空間特徵，同時也另外形成了「進步—落後」的社會現實與時間感受<sup>189</sup>。正因為在交通運輸的影響之下，台灣逐漸成為了相對於日本內地的外地。但是，台灣地區伴隨日本帝國統治所形成的：1.因為日本殖民統治下而形成的都市；2.在原來的都市上重新組合而成的這兩種都市形態<sup>190</sup>，還是促使了台灣這個殖民地社會結構不僅僅包括了內地與外地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時還存在著都市與鄉村既對立又並存的特殊現象。

況且，這種都市與鄉村並存的社會現象，所反映的是台灣社會始自清帝國統治以降便逐漸形成的漢文化傳統、以及支撐這個文化傳統的社會領導階層，也就是所謂建立在傳統地主制的士紳階層與台灣社會階級關係並沒有因為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而消失。從吳文星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台灣的士紳階層不但迅速地接受由日本總督府所興辦的現代化教育，同時也仍然保持著對於傳統書房教育的支持。而在統治者的這一個側面，則在統治策略上的折衷考量下，產生了對「漢文」的策略性運用。

在教育方面，儘管初期教育制度頗不完備，然而在行政上極力爭取各地社會領導階層的支持。早期在國語傳習所時代，即利用地方有力人士協助募集學生。一方面順應台灣社會的實際需要，對傳統的書房採取溫和的漸禁制度，准許士紳在法規的監督管理之下，繼續開辦書房。另一方面，利用社會領導階層之力成立公學校，並在公學校設漢文科，延聘地方上受尊敬的書房教師及學者擔任教席；同時，極力向社會中、上階層鼓吹新教育的好處，呼籲其停止支持書房，將子弟送到公學校就讀。<sup>191</sup>

與其說日本統治初期的統治策略是強制性地將現代化帶入台灣，實際上則是在考量到現實的情況之下，折衷地與殖民地傳統既有現狀取得妥協，再逐漸地將之導引殖民地政府所訴求的理想情況。所以，雖然自 1904 年起公學校的學生人

<sup>189</sup> 當然這裡的「空間」與「時間」特徵主要指涉的對象是具有移動習慣的台灣人士，他們由於來往內地或外地都市、鄉村等不同的地區，形成了所謂「進步—落後—更落後」或「更進步—進步—落後」的不同觀感。

<sup>190</sup> 前者如高雄、基隆；後者如台北、台南。橋谷弘，《帝國と植民地都市》(日本：吉川弘文館，2004)，頁 11-13。

<sup>191</sup> 吳文星，〈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流動〉，頁 167。

數已正式地超過書房學生人數、並且自此逐年地日漸增加<sup>192</sup>；但是，直到書房教育完全結束以前，一個因為台灣傳統教育依存所形成的雙軌/多軌的殖民地教育體系，還是對台灣的受教育群眾形成了相當的影響(漢文的被拾回)<sup>193</sup>。好比說，台灣聞人吳三連年幼時就曾經因為家貧，而就讀於基督教家庭的讀書班，後來，才又就學於私塾與公學校<sup>194</sup>。

由於台灣傳統士紳及其背後所具備的地主階層，一直以來便是日本殖民統治所必須尋求合作、妥協的對象，所以在教育方面，原先為了「國語」而被日本帝國已然拋卻了的漢文便在殖民地台灣的統治需求下被重新「拾回」<sup>195</sup>，扮演了統治手段中應酬與拉攏的親善功能<sup>196</sup>。不過，更重要的一點還是在於，不管是台灣傳統地主、或者是他們所使用的漢文，其實都在日本統治下而產生相當明顯地變遷(殖民地漢文的浮現)，進而提供了台灣印刷媒體世代一個形成的基礎條件。

吳文星指出，總督府雖然延續了清帝國末期台灣士紳的社會特權與地位，但是在將之納入殖民基層行政與治安的體系之際，還是逐漸地將原本專指正、異途功名出身的台灣士紳，擴大成為包括富豪與總督府協力者的群體<sup>197</sup>。但是，即便台灣士紳自 1900 年代中期以降紛紛讓子弟接受新式的現代教育，甚至送其至日本留學，但是這一批早期的台灣留學生往往或多或少都有書房教育的求學經驗，同時從各種名人錄的統計中也可以發現，台灣新、舊社會領導階層的取代過程十分緩慢<sup>198</sup>，在殖民政治體制中的地位與角色也沒有太大的差別<sup>199</sup>。

雖然 1920 年代台灣新舊社會領導階層呈現出對日本殖民統治的不同態度，大抵上，他們的出身背景與家世環境等都還是具備著重疊與延續的社會現象；即使台灣新舊社會領導階層的教育背景有所差異，但不可被忽略的一點在於：他們彼此其實都同樣地對於漢文、以及當時台灣社會所普遍瀰漫的文化氛圍有著共同的瞭解與認識。以漢文為例，過去大多將漢詩文的創作視為總督府拉攏台灣漢文人的舉措與手段，透過陳培豐的研究可以發現，日本統治初期古典漢文的挪用與復活，不僅幫助日本統治當局得到了一個與台灣文人進行交流的溝通工具。尤有甚者，這個由古典漢文、通俗漢文、和式漢文、和製漢語共構而成的殖民地漢文，在分工合作的情況下成為了不分台灣人、日本人的中介，更透過諸如《台灣教育

<sup>192</sup> 吳文星，〈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流動〉，頁 167。

<sup>193</sup> 如果單單就殖民統治所帶來的現代化教育而言，雙軌教育所指的是台灣人所就讀的公學校與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然而，如果就台灣社會本身所存在的教育機關來看，則包括台灣傳統的書房，以及少數原來由傳教士所經營的教會學校，都一定程度地提供了台灣民眾不同的教育途徑。派翠西亞·鶴見(E.P 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頁 28-37。

<sup>194</sup>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台北：自立報系，1991)，頁 22-27。

<sup>195</sup> 陳培豐，〈從漢詩文的盛衰來看台灣與日本帝國的關係〉，《異時空下的同文書寫研討會論文集》，台南成功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台灣文學系主辦，2008 年 11 月 29-30 日，頁 10-11。

<sup>196</sup> 楊永彬，〈日本領台初期日台官紳詩文唱和〉，《台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

<sup>197</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371-373。

<sup>198</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153。

<sup>199</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158。

會雜誌》(以下簡稱：《台教會》)等官方刊物，向台灣傳達現代文化、文明等啟蒙訊息。

因此，以政治立場看來，《台教會》雜誌漢文欄的投稿者不但有許多日本人，也有魏清德、謝汝銓、劉克明、林熊徵、顏雲年等比較具協力色彩的台灣人，甚至包括了林呈祿、楊肇嘉、蔡培火、醒民、王敏川、黃旺成等一些爾後加入反體制運動的台灣人。……以台灣的語文改革主張角度來觀察，這些投稿者有古典漢文派的李漢如、謝汝銓、黃贊均；中國白話文派的醒民、林呈祿、楊肇嘉、王敏川、黃旺成；台灣白話文派的劉克明、鄭坤五、張淑子、黃純青；台灣羅馬字派的蔡培火以及日文派的江肖梅等。

200

這個現象反映，當時台灣社會因為環境相對穩定下而逐漸形成了一批同時具備漢文私塾與殖民地現代教育經驗的社會菁英。這些台灣民眾在各項議題於 1920 年代開始發酵之前，就已經逐漸地透過投稿於官方雜誌或報刊的方式，發展各自對於台灣當前境況的「現實性」認知；並且透過殖民地漢文自古典漢文的脫胎，進而讓台灣的新、舊社會領導階層得以找到一個日文之外的溝通工具。

上述種種現象，進而影響了以往論述當中對於所謂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的判斷標準。一方面，知識份子往往出身自傳統文人的家世背景；加上他們在語文的使用上也未必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差別，一定程度上，都顯示出他們被籠罩在相同的文化場域當中；台灣人在逐漸取得印刷設備、出版空間，成立自己的印刷媒體刊物之後，也遠較過去透過日系印刷媒體要更具備著「現實性」的要素。

台灣人印刷媒體開始出現的展開期當中，正好是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等相互合作、協力組成文化抗日運動陣營的鼎盛時期。是故，《台灣民報》及其系列刊物不僅具備著比其他台灣人刊物更為強大的批判動能，同時在結合不同媒體(如電影、演講)的層面上也頗有建樹。然而，世代的形成與世代成員內部的階級差異終究導致了文化抗日運動後來的分崩離析，甚至於文藝大眾化的訴求與後來政治運動妥協、解消也變成反比。於是，就在本文論及台灣當時印刷出版的概況與台灣地主制與漢文的依存變遷後，以下將就日本統治時期印刷媒體輸入台灣的情況，討論「文化交疊區域」在形成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具體影響。

### 三、「文化交疊區域」(the Cross-cultural Field)：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位置」

上述討論企圖闡明：1920 年代以前，台灣即已進入了一個以現代印刷媒體

<sup>200</sup> 陳培豐，〈日治時期台灣漢文脈的飄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台灣史研究》15 卷 4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8 年 12 月，頁 54-55。

為主體的「印刷媒體時代」。在現代印刷媒體的影響下，台灣讀書人口開始養成與清帝國統治時期大相逕庭的讀書習慣，透過印刷媒體的出版與傳播，台灣人讀者得以透過閱讀而開始具備「同時性」與「(雖然相對微薄)現實性」認知。台灣人讀者，即本論文企圖提出的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成員們開始利用印刷媒體進行初步而簡單的意見交換；也開始養成對於特定知識領域的讀書嗜好。於是，本論文以下將說明這個受到不同語文<sup>201</sup>、印刷技術<sup>202</sup>、刊物類型構造而成的印刷媒體生態，究竟是如何形成一個「文化交疊區域」的明顯特徵，進而與過去研究者提出的「讀書過疎地域」概念互補，構成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位置。

讀書過疎地域這個概念是日本學者永嶺重敏在《讀書國民的誕生》一書中所提出來的看法，意指在 1900(明治 40)年左右，在日本已經形成了一個均質的中央活字媒體全國流通網之際，那些仍然缺乏書店、報紙販賣店、圖書館等讀書裝置等的地區<sup>203</sup>。台灣在日本領台初期，不僅縱貫鐵路尚未貫通，同時也缺乏圖書館等相關的讀書裝置；甚至於即使到了 1930、40 年代之際，不論在書局商家的數量<sup>204</sup>與讀者閱讀消費額<sup>205</sup>等方面都仍低於日本內地的各個地域，自然也被視作為是所謂的讀書過疎地域。

然而，本文提出所謂文化交疊區域的目的並不在推翻既有讀書過疎地域的說法。文化交疊區域強調的不僅在於日本殖民統治政策與台灣既有文化傳統的重疊交融，同時也顯示出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在輸入印刷媒體上的多向性與多元化特徵。清帝國統治時期台灣便曾經向福建省各地，如福州、泉州、同安、彰州、廈門等的刻書坊進口書籍；待到日本統治時期，上海則因為英、美官員與傳教士組成同文書會、翻譯西方書籍的影響下，逐漸成為了中國西學的傳播中心，出版大量偏重西方政治制度與現代性面向的書籍，取代福建成為台灣進口書籍的主要來源<sup>206</sup>。不過，或許是因為書籍並非大規模貿易商品的緣故，所以有關書籍進口的詳細數量與種類等等的相關資料等，都罕見於清領時期或日本統治時期的官方貿

<sup>201</sup> 李承機，〈殖民地台灣媒體使用語言的重層構造〉，若林正文，吳密察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頁 201-239。

<sup>202</sup> 就印刷技術來看的話，則台灣自清代以來使用的刻版印刷方式並沒有因此而在台灣絕跡，從史料與前行研究的成果可以得知，不僅包括如《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等由日本人作家所出版的作品集都或曾經以刻板印刷的方式付梓，甚至直到 1921 年時仍有利用過去書籍的雕版進行印刷、販售的情形存在。可參考黃敬堯，〈遊於是乎始——論中村忠誠《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思想歷程〉，發表於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東亞文學脈絡與文化傳承國際研究生學術研討會」2008 年 7 月 2-4 日。以及楊永智，《明清時期台南出版史》，頁 313。

<sup>203</sup> 永嶺重敏，〈讀書國民の誕生：明治 30 年代の活字メディアと讀書文化〉，頁 47。

<sup>204</sup>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三省堂與台灣——戰前台灣日本書籍流通〉，《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台北：全華科技圖書，2004)，頁 231-232。河原功，〈台灣出版會與蘭記書局〉，《記憶裡的幽香》(台北：文訊出版社，2007)，頁 55-72。

<sup>205</sup> 張星健著，張文薰譯，〈書籍與文化〉，原收錄於《台灣文學》第 1 卷第 2 期，1941 年 9 月 1 日。今收錄於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 3 冊(台南：國家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 174-175。

<sup>206</sup> 關於上海在民國初年文化傳播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參考張靜茹，《上海現代性·台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台北：稻鄉，2006)，頁 78-79。

易文書<sup>207</sup>。至於日本統治時期台灣輸入印刷媒體刊物的兩大對象，一是日本方面的大型書店<sup>208</sup>；二是上海的各大書局<sup>209</sup>。而台灣人所經營書局不僅伴隨著 1920 年代台灣人文藝雜誌的出版而成立，同時也與後來的民族社會運動、台灣漢文人的參與有著一定程度的關係。例如台北的文化書局與台中的中央書局便是由蔣渭水、台灣文化協會相關人士所成立；連雅堂與張純甫則各自籌辦雅堂書局、興漢書店等等。吳三連也曾在回憶錄中提到，幼時經常趁學校的外出時間到日本人書店新高堂翻閱新書<sup>210</sup>。

近年來學者利用對於蘭記書局出版與代銷圖書目錄的統計，還是有助於瞭解當時台灣進口上海漢文圖書的基本概況。從 1925 年至 1930 年嘉義蘭記書局《嘉義蘭記圖書部目錄》中可以發現，當時蘭記書局所進口的書籍類型包括了：1.宗教類書籍(共約 255 種)；2.中國詩文集類(共約 108 種)；3.教科書類(共約 136 種)；4.藝術類(共約 130 種)；5.生活實用類(共約 78 種)；6.雜誌類(共約 40 種)；7.醫學用書類(共約 165 種)；8.西方通俗小說(共約 242 種)；9.漢文小說(共約 294 種)，就種類方面與日文書籍相比也是不遑多讓。

當時台灣社會的閱讀概況並不能單單從日本本位或量化的角度進行思考，必須考慮到語文重層構造與東亞地域印刷媒體流通的現實情況。台灣不僅在印刷媒體的來源上具備著「多向性」(中國、日本、台灣)；同時在刊物方面也存在著「多元化」的豐富面貌。因此如果考慮印刷品本身具備的創造「一致性」功能，則文化交疊區域對於當時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影響，便在於它本身具備了創造認同、認知多樣化的可能性。不管是語文習慣、文學品味、國族認同等等，都在文化交疊區域的影響下而具備許多不同的方向。好比說，台灣印刷媒體的世代成員在語文方面便在 1920 年代以降逐漸從原本的二元構造，分裂成包括中國白話字、羅馬字、漢字、台式白話文、日文等不同的語文訴求<sup>211</sup>；至於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民眾在政治認同上的歧異與紛雜，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刷品來源的間接影響。

印刷媒體時代的來臨開展於日治時期由日本人引進的現代印刷報刊，並且再與當時日本、中國等輸入台灣的印刷媒體刊物，共同形成了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

<sup>207</sup> 上述推論參考自林滿紅整理的表格 1.3「開港以前台灣與大陸之貿易品」。以及卓克華對清代台灣行郊銷售商品的分析，當中未見書、冊、典籍，但或有紙類，可能是冥紙、或者是書籍用紙的原料，或者是成品？尚有待查明。收錄於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台北：聯經，1997)，頁 8。卓克華，《清代台灣行郊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 63-80。

<sup>208</sup> 包括了如台灣新高堂、犬塚書店、棚邊書店、池谷書店等，都各自向日本的三省堂、松谷啟明堂、大阪屋號書店、丸善書店等，訂購如教科書、雜誌、運動用品、樂器與文集特價書等等包括了如台灣新高堂、犬塚書店、棚邊書店、池谷書店等，都各自向日本的三省堂、松谷啟明堂、大阪屋號書店、丸善書店等，訂購如教科書、雜誌、運動用品、樂器與文集特價書等等。

<sup>209</sup> 包括上海書局、大一統書局、中正書局等書店，都是台灣人書店採購的對象楊永智，〈蘭香書氣本相融：追溯蘭記書局在台灣出版史(1915-1954)的軌跡〉，《記憶裡的幽香》，頁 101-111。

<sup>210</sup>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台北：自立報系，1991)，頁 30。

<sup>211</sup> 李承機，〈殖民地台灣媒體使用語言的重層構造〉，若林正丈，吳密察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台北：播種者，2004)，頁 201-239。

位置。然而由於印刷媒體的輸入與出版都受到總督府的嚴密控制；加上不論是出版地(日本、大阪、上海)或者是輸入地台灣本身，都屬於相對開發的都市地區，所以所謂文化交疊區域的真實範圍，事實上並未涵蓋整個台灣，而是如上所述的、包括台北、台中、嘉義、台南等存在著書局的都會地區，以及其交通網絡涵蓋所及的地理範圍。

那些具有基本閱讀、消費能力的台灣人，即主要是那些自清帝國時期便存在於台灣社會的士紳、地主階層，以及那些受過漢學私塾教育與殖民地現代化教育的台灣民眾，都如同上述一般地被涵蓋在印刷媒體的世代位置當中。是故，就在帝國統合與台灣傳統社會的延續彼此拉扯下，台灣印刷媒體傳播的情況便也呈現出有異於日本、中國的獨特面貌。台灣民眾透過日治初期的印刷媒體與報刊開始擴張他們的資訊與知識來源，同時也逐漸地形成彼此共同的認知與現實感，進而演變成台灣印刷媒體世代中的自在世代、實存世代。

## 第二節、「實存世代」的啟蒙意識與反抗行動

### 一、從武裝抗日到文化抗日

本論文將從文化抗日運動的發展脈絡討論印刷媒體世代的「實存世代」，理由在於文化抗日運動當中存在著台灣民眾利用印刷媒體積極回應日本殖民統治論述的這個面向，明顯地與統治初期的武力抗爭有著極大的差別。底下本論文將重新透過既有對於文化抗日運動的既有詮釋，進一步理清：所謂印刷媒體世代的實存世代究竟指涉為何？並且藉此論述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越漸穩固卻再一次地形成抗日運動組織的理由與動機何在？

關於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的對日抗爭，一般大多將之區分成：1.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1895-1902)<sup>212</sup>；2.日本統治確立後的文化抗日運動(1913-1937)。然而，如果國家統治的目的在於統合與「教化」，那麼為何在總督府將台灣武裝反抗勢力平定，並且成功地將其所提倡的現代化教育與統治制度施行於台灣以後，卻反而誘發了更多台灣人成為新一批反抗力量的來源？換言之，1913年以降開始在台灣展開的文化抗日行動，對總督府來說是否是一個意料之外的「非預期效應」？

過去研究中，上述兩種不同類型的對日抗爭彼此在論述當中往往缺乏著連帶關係；從歷史著眼，則兩種抗日類型不管就起因、形成背景、組成人士、意識型態與訴求等方面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sup>213</sup>。因此，假如武裝抗日與文化抗日當中存在的是近 11 年的時間縫隙，那麼是否也意味了：關於文化抗日的起源與脈絡，必須從這段時間中的台灣社會中來加以探索，才能夠在補充既有的前行研究成果上面，更全面地體察文化抗日運動的真正起因。

<sup>212</sup> 翁佳音，《台灣人武裝抗日史研究》(台北：稻鄉，2007)。

<sup>213</sup> 這部分可以參考許世楷著，李明峻，賴郁君譯，《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台北：玉山社，2006)。

一般所謂的文化抗日運動，指的大多是自 1913 年以降，由包括同化會、台灣文化協會、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民眾黨、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團體相繼成立、更替、終至解散消亡的政治社會運動。至於文化抗日的起因與動機，則大多將之歸因於武裝抗日的失敗、中國國民革命的鼓勵與世界民族自決潮流的影響。另外，相較於對島內人士的描述與重視，以往的研究往往更偏重於描述發起於東京、由台灣留學生所主導的文化啟蒙社團，及其印刷媒體刊物《台灣青年》、《台灣》等等，進而也讓文化抗日運動充滿著由海外到島內、由新知識份子鼓吹攜帶歸返的刻板印象<sup>214</sup>。

即便是海外的台灣留學生，大多也是在台灣受過國語傳習所、公學校、國語學校等基本教育之後，才進入到日本或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換言之，即使印刷媒體的輸入受到總督府方面的管制，但這些台灣留學生們對於現代啟蒙、文化等等的認識與瞭解，應該不是直到踏出台灣島後才開始有所接觸，而應該與他們原先在台灣所受到的教育訓練、社會環境等都有所牽連。以台灣文化協會為例，相異於同化會多由台灣社會的上流人物組成，台灣文化協會的成員則涵蓋了當時社會各階層台灣民眾（農民、地主、學生、公務員、醫師、律師、資產家）。

透過蔣渭水與林獻堂的合作關係一方面可以看到台灣新、舊領導階層在文化協會成立之際彼此分工合作的具體面貌。另外，透過林柏維整理的文化協會主要幹部與成員列表，也可以看出當時中部人士在文協當中的影響力，以及協會成員在職業、學歷與年齡的分布與比率。文化協會成員在職業方面：總數 52 名的重要成員當中，地主(15 名)、醫師(14 名)便佔了 55.77%，另外文化協會相關事業者(10 名)則佔了 19.23%，總計便超過 75%，可謂為文化協會的組成核心<sup>215</sup>。在學歷方面，海外留學生(15 名)雖然為學歷背景中的最多數，但若考慮到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出身(13 名)與國語學校經歷(5 名)、師範學校經歷(3 名)的話，則不具備海外留學經驗的台灣知識份子在文化協會的組織當中還是較海外留學生在數量上略佔上風。

更何況，上述利用成員職業背景與學歷的分析，其實還是存在著量化統計上的缺陷。好比說，該表中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的林呈祿與東京高師的蔡培火等人，其實本來也都畢業自總督府國語學校。因此，透過這個現象可以得知：除了國際環境因素等既有的考量觀點之外，對於台灣本地教育與文化環境的考察應該也是討論台灣社會從武裝抗日轉型到文化抗日演變過程的一個途徑與方法。加上文化抗日運動於 1920 年代左右的出現，其實也對應了台灣印刷媒體世代實存世代的成形。

本論文想強調的是：印刷媒體在作為反抗意識的工具載體之前，其實也是這個反抗意識之所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從運動的各個層面來看，印刷媒體的重要性

<sup>214</sup>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台原，1998)。

<sup>215</sup>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 74、79。

在於：1. 印刷媒體、2. 社團組織與 3. 非官方的意識型態一同構成當時台灣民族社會運動的主要基石。相較於過去武裝抗日的零星與鬆散，印刷媒體刊物不僅承載了當時台灣民眾的認知與意識，更連結了居住於日本或台灣的台灣人，早在文化抗日運動興起以前，就是台灣人聯繫、延續彼此共同感知與認同的重要工具。

因為反抗意識的前提往往必須是對於現代知識與文化的感受與感知，但是這個可謂為是啟蒙的意識，與殖民地官方教育、社會教育等施行有著不可忽略的緊密關係。印刷媒體一方面作為由殖民者主動傳遞啟蒙知識的統治工具，卻也同時促進殖民地民眾對於現代文明與文化的積極接受，從而演化成為反抗行動的意識型態基礎。這些對於殖民統治情境與現代文明啟蒙的共同感知，這個在世代位置下所形成的世代單位，後來也進而成為了文化抗日運動的主要成員、台灣人資本印刷媒體刊物的相關參與者。

於是，我們一定程度可以將始於 1920 年代左右的文化抗日運動，視為是在殖民地社會結構當中一個由意識啟蒙往反抗意識移動的歷史變遷；同時，這個變化過程也不應該被視作為是一條「由外向內」(東京→台灣)的傳遞路徑，而更應該從台灣島內、即這群後來投身於文化抗日運動的台灣人士，究竟是如何在認知、認同與行動上的形成共識的情況之下具備了實存世代的世代特徵，以及更進一步地因為對立於台灣總督府的殖民統治政策；由本來的自在世代轉變為更具反抗動能的自為世代。

## 二、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互動本來就不僅僅是對立，或者對抗的緊張關係。本論文在此企圖表達的是，殖民者固然可以透過政治統治與社會教育等措施來改造被殖民者的行為與慣習，但是另一方面也同時提供了啟蒙與開化的視野，讓被殖民者由文明或文化的概念之上，進一步衍生出對殖民者的抗拒與不滿。底下本論文將透過國語學校的課程內容與讀書裝置(圖書館等)的成立概況，說明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對於現代文明知識的接收概況。

即便殖民地社會在總督府的嚴格管控之下，無法完全自由、開放的接受源自於西方或由日本轉嫁而來的現代文明啟蒙知識，但是台灣本地的教育與文化環境卻仍然是討論日治時期台灣文化運動時不能被忽略的重要關鍵。換言之，正因為殖民統治即便嘗試限縮卻還是打開了台灣人在現代文明啟蒙知識上的視野，更無法阻止大量圖書資源的輸入進口，於是當這些已具備一定程度啟蒙知識的台灣人在到日本求學，面對到不同法領域、相對自由的內地社會，自然而然也更進一步地擴大、深化其本來在台灣就具備的知識基礎。尤有甚者，更在後來文化抗日運動興起之際成為了主要的積極參與者。

日本現代化教育與前現代儒學教育的最大差異，在於教育本身的道德內容被實學教育逐漸地稀釋、淡化，成為教育內容中的其中之一，不再是唯一、主要的



部分。自 1896 年伊澤修二在芝山巖成立的國語傳習所開始，公學校、師範學校與後來的總督府國語學校等就成為了台灣現代化教育的主要機關。公學校的課程內容強調日語的習得、品德的教養與實用知識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形塑國民性所特別偏重的面向<sup>216</sup>；師範學校則是為了培養公學校的師資，而特別強調國語、修身、簿記、地理等基本科目及其教授方法<sup>217</sup>；總督府國語學校既然與當時的醫學校共同作為當時台灣人的最高學府<sup>218</sup>，則其授課的內容與台灣人學生在離開校園後的出路與扮演的社會角色，當然也是一個良好的觀察途徑。

根據研究者的研究指出，總督府國語學校一方面作為總督府所直轄下的教育機構，又同時作為日治時期台灣師範、實業人才的供應源頭，所以其發展的方針不但受到總督府的政策影響，進而也因此而幾多更迭。1919 年以前，國語學校具備的是包括教授台灣人日語與教員養成的雙重目的，即使 1902 年起師範部日益增多，但培養實業人才的國語部卻一直延續到 1919 年才正式結束<sup>219</sup>。國語學校的課程設計一定程度上擴展了台灣學生對於世界的認識與知識領域的擴張，在修身、國語與漢文、唱歌、體操課程等方面，國語學校承繼延伸了自公學校舊有的課程內容；另外則擴大了台灣學生在史地、數理、實業等的知識視野<sup>220</sup>。從殖民現代化的教育內容中可以得知：當總督府的文化統合日益鞏固與成形之際，卻也同時擴大了台灣讀書人口的數量、以及對於近代啟蒙知識的體認與感受。比如說，日治時期曾經就讀於醫學校的杜聰明便曾經在回憶錄中提到：「醫學校的制度，分豫科一年本科四年制，在豫科一年至一年半期間，是教授國文(日本文)、數學、地理、歷史、物理學、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及體操等普通學課程。」另外，他也提到同學諸如王青山、賴和等人在漢文上都有不錯的造詣，其個人則在醫學校其間自修德文，以鑽研學問<sup>221</sup>。

社會教育方面，包括讀書裝置，即圖書館、讀報社、讀書會等公共設施或同人團體的成立，則是另外一個促進台灣印刷媒體世代形成的主要原因。永嶺重敏的研究指出，所謂「讀書過疎地域」往往存在著如：1.通信制圖書館；2.讀書會；3.巡迴文庫等有助於讀者獲得圖書資源的相關途徑<sup>222</sup>。被永嶺重敏歸類為「讀書過疎地域」的台灣，早期的圖書館事業發展也是由日本人所開設的私立圖書館來揭開序幕，包括 1901 年由官民有志所成立的台灣文庫，以及 1909 年由住在基隆的企業家石坂莊作所成立的私立石坂文庫。

<sup>216</sup> 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頁 15。

<sup>217</sup> 李園會，《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制度》(台北：南天書局，1997)，頁 43。

<sup>218</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的高等教育〉，《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5 期，(1993)，頁 143-144。

<sup>219</sup> 謝明如，《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台北：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2。

<sup>220</sup> 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頁 15。謝明如，《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頁 195-215。

<sup>221</sup> 杜聰明，《回憶錄》(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1982)，頁 39、58、60。

<sup>222</sup> 永嶺重敏，第二章〈「中央帝都の新知識」を地方讀者へ〉，永嶺重敏，《讀書國民の誕生：明治 30 年代の活字メディアと讀書文化》，頁 47-80。

台灣文庫設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改善台灣的風俗習慣，以及增加台灣民間自學的資源。由於台灣文庫是私人所設立的圖書館，所以每次入館的費用是三錢，軍警則有半價的優惠。台灣文庫初設立時約有五千多冊的藏書，使用者大多為日本人。另一方面，如果台灣文庫的成立體現了讀書會與圖書館之間的連帶關係，石坂文庫則不僅僅體現了私人興學的特徵，同時也發揮了巡迴文庫的實際作用。巡迴文庫不僅僅是石坂文庫的重要活動，同時它活動的範圍更不僅僅只限於島內，甚至遠至中國本土的福州、廈門，或日本的沖繩、八重山諸島等地區<sup>223</sup>。

1915 年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在吸收台灣文庫圖書資源以後正式開館，並且在太田為三郎與第 2 任館長並河直廣的努力下，不僅設立了巡迴文庫，以捆包、寄運的方式將圖書送至台灣各地，增加閱讀人口；同時也開始收集中國南方、南洋諸島的史料；更設置兒童閱覽室、實施圖書外借制度等等<sup>224</sup>。從下列幾項資料可以大致看出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巡迴文庫的施行績效，1922 年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有巡迴文庫 46 個、圖書 396 冊、讀者 55585 人、借閱書籍 74325 次；到了 1928 年之際，巡迴文庫已增加至 135 個、共有圖書 8419 冊，至於借閱人數方面，則不僅包括 56094 的日本人，更還有 115221 的台灣人與 5627 名原住民，可以看出巡迴文庫對於台灣人的影響<sup>225</sup>。

除了巡迴文庫外，圖書館的普及設立也是台灣讀書人口增加的另外一項重要因素。在 1923「公立私立圖書館規則」的實施，以及第 4 任館長山中樵的積極推廣下，台灣各地區的圖書館逐漸自原先 1927 年的 35 所，到 1938 年時已有 91 所的發展規模<sup>226</sup>。不論圖書館的館數、藏書量、閱讀者數、閱覽冊數等都與日本內地的情況不分上下<sup>227</sup>，甚至還因為日本人多住在都市的緣故，使得 1940 年到館閱讀的統計人數方面，呈現出台灣人多過於日本人的情況<sup>228</sup>。

藉由上述關於台灣圖書館發展的相關描述，可以發現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形成與總督府的文教政策也有著相當程度的關連性。事實上，台灣人不僅僅自圖書館中獲得知識，同時也模仿了由日本人所開始成立的讀書會組織、活動，擴大台灣識字階層的數量與啟蒙知識的普及。例如伴隨 1921 年台灣文化協會而在台灣各地設立的讀報社，便也同樣具備著官立圖書館的類似功能，只是其較官立圖書館有更多來自中國方面的報紙，以及強調殖民地解放運動或民族自決等思潮<sup>229</sup>。

除此之外，配合台灣本身出版的圖書數量增長情況可以得知，日治時期台灣

<sup>223</sup> 加藤一夫、河田いこひ、東條文規著，《日本植民地の圖書館》（東京：社會評論社，2005），頁 78-81

<sup>224</sup> 林景淵，《日據時期的台灣圖書館事業》（台北：南天，2007），頁 30-33。

<sup>225</sup> 林景淵，《日據時期的台灣圖書館事業》，頁 38。

<sup>226</sup> 林景淵，《日據時期的台灣圖書館事業》，頁 47。

<sup>227</sup> 加藤一夫、河田いこひ、東條文規著，《日本植民地の圖書館》，頁 103。

<sup>228</sup> 林景淵，《日據時期的台灣圖書館事業》，頁 64。根據 1935 年台南市圖書館的情況，台灣人讀者約佔 80% 左右。加藤一夫、河田いこひ、東條文規著，《日本植民地の圖書館》，頁 104。

<sup>229</sup>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 103。

社會逐漸地與印刷媒體形成緊密的關連。大正時期以降，台灣地區創刊的雜誌已有 68 家，昭和時期更發展至 319 家，且不再局限於台北、台南等大都會<sup>230</sup>；同時據台灣省文獻會所藏之《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檔案》所載，書籍方面共有 13,855 冊；而至今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中的東南亞資料則有 3070 種<sup>231</sup>。不過，必須留意的是印刷媒體刊物的蓬勃發展與流通管道的增加並不能單純地視為是台灣印刷媒體世代興起的正面因素。在總督府媒體流通管制的檢驗與審查下，台灣印刷媒體世代所能接受到的刊物其實是已經經過總督府篩選過的部分。

1900 年在台灣頒行的「台灣新聞紙令」與「台灣出版規則」是影響台灣印刷媒體刊行傳播的最主要因素。台灣新聞紙令的前身是 1900 年 1 月制定的台灣新聞紙條例，其規定不僅較日本的「新聞紙法」嚴格許多，同時也採取了許可制、納本義務以及詳細規定了各式禁止刊登的內容。尤其重要的是，台灣島外的新聞媒體與出版社等並不能直接地將刊物寄入島內，而是必須送檢，以取得在台灣散布、銷售的資格<sup>232</sup>。因此，如果就 1. 媒體發展與 2. 媒體管制這兩個層面進行綜合性的觀察，則台灣人自 1913 年起的文化抗日運動或許不應該被視為是日本總督府殖民統治的失能、失效。事實上，包括同化會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台灣人在文化與政治面向上的反抗，本質上都具備了像台灣印刷媒體傳播時的雙重特質：即它一方面是反抗的，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要受到總督府的管制與控制<sup>233</sup>。

以台灣人為例，楊逵在回憶中便自承其在就讀公學校六年級時從日人教師淺昭那邊得到許多文學讀物，後來中學時更把全副精神用在閱讀課外讀物上，諸如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白樺派等都是他涉獵過的作品，另外諸如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雨果等俄國、英、法作家作品，也都是他的文學養份<sup>234</sup>。另外，幼年家貧的曹永和則是總督府圖書館的常客，經常趁著放暑假的時候到圖書館看《少年俱樂部》、《少年雜誌》、安徒生童話等等，更是讀書裝置對於形成印刷媒體世代的一項佐證<sup>235</sup>。

於是，台灣印刷媒體世代在意識啟蒙的面向上固然是無庸置疑的。好比說，以往被歸類在傳統文人的魏清德或知識份子的王敏川，其實都接受過殖民統治的現代教育，身處在相同的文化環境(世代位置)當中；甚至於，他們也都同樣是積

<sup>230</sup> 劉寧顏編《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六，頁 127、141。

<sup>231</sup> 劉寧顏編《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六，頁 318。

<sup>232</sup> 河原功，〈《台灣出版警察報》解說〉，台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台灣出版警察報》復刻本第 1 卷，頁 6-16。

<sup>233</sup> 關於總督府對於台灣印刷媒體的詳細管制情況，必須參考《台灣出版警察報》。不過《台灣出版警察報》目前僅有第六期至三十五期出土，而所謂第一號於 1929 年 8 月出版的說法，則主要來自於河原功於〈《台灣出版警察報》解說・発禁図書新聞リスト〉中的說法，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台灣出版警察報》復刻版第 1 卷。

<sup>234</sup> 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台北：前衛，1988)，頁 149、181。

<sup>235</sup> 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問，吳美慧等記錄，《曹永和院士訪問記錄》(台北：中研院台史所，2010)，頁 24。

極參與印刷媒體刊物運作的自為世代。不過，印刷媒體自為世代的世代成員們在反抗意識的這個層面，則又涉及到個人在不同歷史時點上的機遇與抉擇，未必可以從道德立場或動機論來予以褒貶評斷。

### 三、啟蒙意識的脫胎

上述所企圖闡明的是，當時台灣社會所有具備閱讀能力的台灣人其實都位處在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位置之中；尤有甚者，那些積極參與印刷媒體刊物的台灣人士更是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單位，同時也由他們組成了台灣印刷媒體世代中的實存世代。然而，這些分別隸屬於不同印刷媒體刊物組織所形成的世代單位，卻未必都同樣地具備反抗殖民體制的積極特質，進而也引起了後來研究者的評議，或者是諸如對於知識份子或傳統文人的不同褒貶。

本論文在此並不企圖延續以往論者所經常採用的道德式評判，相反地，透過對於印刷媒體世代實存世代的觀察與討論，有助於本論文從以往親日或反日、知識份子還是傳統文人的分野當中，找到當時台灣民眾參與公共事務與相關議題時的普遍模式。從上一小節的討論中，可以得知殖民地台灣的現代教育與社會教育其實也是啟蒙台灣民眾現代知識的來源；但是，必須瞭解的地方在於：在歷經處於接受印刷媒體傳播的被動方的情況之下，台灣民眾也開始嘗試地去打破這樣子的主從位置，慢慢地以更為主動積極的態度去介入印刷媒體的生產、發行，以及其背後所代表的：文明知識的傳遞與再生產的過程。

回顧日治時期台灣報業的發展情況，可以得知日本現代報刊在輸入台灣的最初時刻，便持續保持著漢文欄的篇幅與對漢文記者的需求，這種情況到《台灣日日新報》成立與《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的出版都未見衰退，同時更提供了諸如李逸濤、謝雪漁、魏清德等台灣文人的揮灑空間。然而，這些漢文欄記者事實上與台灣其他只能利用讀者投書等方式來參與印刷媒體出版的業餘投稿者一般，都欠缺了對台灣現實情境的反應與批判。或者說，即便對當時的台灣社會有所批評，在言論尺度與得以發表刊行與否等方面，卻仍然受到了報社或總督府方面的宰制而不可能暢所欲言。

因此，當時這些參與《台灣日日新報》的台灣人士雖然可以被視作為是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單位，但是一個真正的印刷媒體世代的實存世代，還是必須等到台灣人社團的穩固成形，以及逐漸地去介入、出版印刷媒體刊物之後，才算是真正地誕生於台灣的歷史舞台上。文人結社的習慣與風氣雖然始自沈光文東渡以後便持續地存在於台灣社會當中，但是不管是沈光文的「東吟社」或者是後來唐景崧的「牡丹詩社」等都存在著強烈的官宦氣息，因此也較為偏向同人性質、與一般民間的社會大眾缺乏連結<sup>236</sup>。

---

<sup>236</sup> 相關研究可以參考：陳丹馨，《台灣光復前重要詩社作家作品研究》（台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1）。

日治時期以降，詩社隨著社會逐漸穩固而日益繁衍，進而促使了「詩社林立」、「文學社會化」與「社會文學化」等特殊現象<sup>237</sup>。當然，不能否認的地方在於日本官方及官員的推波助瀾確實是詩社再興的一大要因；然而更應該注意的是，本來分散在台灣各地的台灣詩人開始利用印刷媒體(尤其是報紙)的出版，以「徵詩」的方式刺激台灣島內的創作風氣與相互切磋交流的可能契機，進而也逐漸地讓台灣漢詩壇的組織規模，漸漸地由區域往「一島化」的傾向邁進<sup>238</sup>。台灣漢詩壇一島化的發展過程主要先從官方主辦的全台詩人聯吟等活動開始，後來台灣各地區的漢詩社團紛紛成立，直至最後全台聯吟大會成為正式且規律的活動為止。印刷媒體即報紙刊物不僅僅作為上述現象的重要幕後推手之一，同時更要注意的是，傳統漢詩、文人與印刷媒體刊物之間的主從關係轉換。

首先，謝雪漁、魏清德或傅錫祺等後來作為各自主持瀛社、櫟社的核心人物，過去原本多是報紙文藝欄的主要編輯<sup>239</sup>；另一方面，報紙文藝欄對於漢詩的助益則不僅在於其促使漢詩跨越了受限於台灣地形、交通的區域限制，同時也讓台灣文人開始意識到印刷媒體本身具備作為傳播工具上的強大效力，進而開始嘗試去仿效、創造屬於他們自己的印刷媒體刊物。

1919年元旦，《台灣文藝叢誌》(以下簡稱《叢誌》)由去年才以台中櫟社作為班底組成的台灣文社發行出版。作為台灣人自主創立的首份漢文文藝雜誌。《叢誌》在其發行至1924的六年期間當中，不僅企圖改革傳統因為科舉所形成的制藝詩文觀，同時也強調詩文並重；並且在回應當時漢詩文衰頹的現象之外，更提供了全島漢文人一個連結的公共空間<sup>240</sup>。換言之，《叢誌》的創刊即已代表台灣文人逐漸從原先依附於日資印刷媒體刊物的寄生狀態當中，逐漸地往獨立自主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叢誌》的出版不僅與台灣文社成立之初便積極拉攏、組織全島文人的行動有所呼應；在出版後更進一步地讓影響力透過報刊媒體散布到全台各地。

《叢誌》固然意味了台灣文人一島化視野的成形與獨立出版印刷媒體的企圖；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應了台灣印刷媒體世代自主性發展初期所受到的限制所在。首先，由於法令上的要求，《叢誌》必須於文社規則中強調自己作為文藝雜誌的身份定位<sup>241</sup>；除此之外，由於尚未擁有自己的印刷設備，《叢誌》偶爾也會受到《台灣日日新報》印刷不及的影響，而必須被迫延後其發刊的日期<sup>242</sup>。這些現象反映出 1.媒體管制政策與 2.缺乏印刷資本與技術掌握在台灣民眾發展啟蒙

<sup>237</sup> 黃美娥，〈日治時期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古典台灣》，頁185。

<sup>238</sup> 黃美娥，〈日治時期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古典台灣》，頁191-194。

<sup>239</sup> 黃美娥，〈日治時期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古典台灣》，頁213。

<sup>240</sup> 吳宗曄，〈《台灣文藝叢誌》(1919-1924)傳統與現代的過渡〉(台北：國立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16-20。學友吳宗曄慷慨提供他的論文及其整理的詳細目錄，在此表現感謝。

<sup>241</sup> 吳宗曄，〈《台灣文藝叢誌》(1919-1924)傳統與現代的過渡〉，頁29-30。

<sup>242</sup> 吳宗曄，〈《台灣文藝叢誌》(1919-1924)傳統與現代的過渡〉，頁34-36。

意識上的具體限制。

即便《台灣文藝叢誌》是一份由過去所謂傳統文人所組成的文藝雜誌，內容中卻存在著不少與新學、西洋、現代的描述或論述，與 1920 年代才發行的《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等有著一定的相似度。好比說，那些後來留學於日本的台灣人，包括林呈祿、楊肇嘉、蔡培火、王敏川等人，事實上都是透過由總督府所發行的印刷媒體開始了他們對於公共空間的積極參與。同時，諸如〈德國史略〉<sup>243</sup>、〈權力之觀念〉<sup>244</sup>、〈天文學說〉<sup>245</sup>、〈天然之文章與人為之文章〉<sup>246</sup>、〈女子教育之必要〉<sup>247</sup>、〈地界叢談〉<sup>248</sup>、〈生活之意義〉<sup>249</sup>、〈歐美思潮與羅馬字〉<sup>250</sup>等文章，在未注明出處的情況下，其實也很難分辨出這些文章究竟何者出自於《叢誌》，或者是刊載在《台灣青年》。

於是，1919 年發行的《叢誌》其實在意識啟蒙的面向上與 1920 年由東京台灣留學生發行的《台灣青年》刊物沒有太大的不同，充其量，只是在啟蒙性文章的數量比例或使用的文字上有些差異而已。同時，更不能忽略的在於：當《台灣青年》等過去被視為是較富有「社會運動」、「文化運動」色彩的刊物散布於台灣之際，那些包括《台灣詩薈》、《詩報》等刊物其實也都同時地在台灣發行，也都意識到印刷媒體作為一個工具在形塑團體共識與認同的強大功能，都積極地從接受、依附到主動地創立屬於他們自己的印刷媒體刊物。

因此，不管是過去所謂的傳統文人或者是知識份子，都在接受、依附到主動經營印刷媒體的過程當中，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印刷媒體世代當中的世代單位，構建了印刷媒體世代的實存世代。一旦接受反抗意識乃是自意識啟蒙脫胎的觀點，則有關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討論便不需要如過去一般地去突顯所謂傳統文人的現代經驗與現代感受<sup>251</sup>，同時也不會過分地去誇大所謂知識份子在反抗殖民統治的動能與成果。不管過去被稱作為傳統文人或知識份子，這些台灣人在脫離了所謂草創期(1896-1919)階段以後，自 1920 年代左右開始各自展開他們對於印刷媒體的新的參與方式——改變了他們以往作為附庸、依附角色的自在世代，往主動、積極成立印刷媒體刊物、介入公共空間的自為世代移動。尤有甚者，更從世代單位之間普遍具備的現代啟蒙認知，往更基進的反抗意識移動。

從《台教會》到《叢刊》到《台灣青年》、《台灣民報》，意味台灣人從依附日資印刷媒體到逐漸地嘗試創辦屬於自己的刊物。不論是年紀較長的魏清德、謝

<sup>243</sup> John Finnemore 著，林少英譯，〈德國史略〉。收錄於《台灣文藝叢誌》第 1 年第 1 號。頁 1-10。

<sup>244</sup> 蔡式毅，〈權力之觀念〉。收錄於《台灣青年》第 1 卷第 1 號。頁 31-35。

<sup>245</sup> 吳賜斌，〈天文學說〉。收錄於《台灣文藝叢誌》第 1 年第 4 號。頁 3-4。

<sup>246</sup> 樵隱，〈天然之文章與人為之文章〉。收錄於《台灣文藝叢誌》第 1 年第 6 號。目錄未著頁碼。

<sup>247</sup> 陳英，〈女子教育之必要〉。收錄於《台灣青年》第 1 卷第 2 號。頁 19。

<sup>248</sup> 陳福全，〈地界叢談〉。收錄於《台灣青年》第 1 卷第 8 號。頁 3-4。

<sup>249</sup> 德富蘇峰著，許三郎譯，〈生活之意義〉。收錄於《台灣青年》第 1 卷第 8 號。目錄未著頁碼。

<sup>250</sup> 田川大吉郎，〈歐美思潮與羅馬字〉。收錄於《台灣青年》第 1 卷第 2 號。頁 32-33。

<sup>251</sup> 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及其著作，可以用黃美娥出版於 2004 年的著作《重層現代性鏡像》為代表。

雪漁，或是年紀較輕的王敏川、楊肇嘉等人都同樣地因為日資報刊而養成了投書報刊、介入公共空間的認知與習慣。況且，當台灣本地文人逐漸嘗試創辦屬於自己的刊物之際，台灣留學生則在日本內地得到了更為豐富地、包括民主、自由等現代啟蒙知識與政治意識，同時也更見識到作為台灣印刷出版產業母國自身的蓬勃發展

《台灣青年》等啟蒙性刊物雖然始發於東京，但其自轉型為《台灣》以後便積極地拓展其在台灣的讀者市場，並且在與台灣文化協會、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彼此配合、組成聯合陣線的情況下，具備了遠較其他印刷媒體刊物更多的、反抗殖民地統治的反抗動能。但是，不能忽略的地方在於：由傳統文人所創辦的《叢刊》其實在內容上也存在著許多啟蒙色彩的論文篇章，同時從《台灣青年》創辦初期的資金來源，或者是後來與《台灣民報》分頭並進的台灣文化協會來看，可以一再地發現其實都與霧峰林家等相關人士有著密切的關連。於是，過去所謂傳統文人及其所代表的社會階層及其人際網絡，其與 1920 年代以後被稱為「社會運動」、「文化運動」的台灣民眾之間本來就不應該是斷絕的；同時，始自 1917 年但在 1920 年代才開始沸沸揚揚的文化抗日運動，背後所具備的反殖民意識也未嘗不是殖民統治現代文明開化過程中的意外脫胎。

### 第三節、「世代單位」的分立、對抗、聯合

#### 一、世代單位的分立現象

上述業已討論台灣印刷媒體世代位置與實存世代的形成背景，但是關於此一世代的真實面貌，還是有待對於世代單位進行論述分析之後，才能進一步地瞭解其之所以、又是如何地在過去被區分為兩個、或者是數個知識社群的主要原因。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下，台灣人只要擁有基本的知識基礎或經濟能力都必然地被涵蓋在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位置，同時，透過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等等的不同途徑，這些台灣人士也有部份逐漸地開始介入印刷媒體的出版與生產過程，由本來的自在世代轉變為具有主體能動性的自為世代。

然而，世代單位與世代單位本身的關係並不見得是一致的；透過曼海姆的理論其實可以瞭解：世代單位間可能也存在著彼此衝突的矛盾關係，而並非僅僅只是面貌一致的單一群體。事實上，由於印刷媒體刊物在出版前必須糾集一定數量的同人、資本，出版後又容易在閱讀下形成集體的認知、認同效應。是故，1.爭取大眾支持進而也與 2. 啟蒙知識的掌握、3. 印刷技術及其設備的取得一同成為了 1920 年代以降台灣印刷媒體世代逐漸由自在世代轉變成自為世代的重要特徵。進而也讓印刷媒體世代的各個世代單位之間，存在著所謂 1.分立、2.聯合與 3.對抗的各種現象

由於日本統治初期台灣人在掌握現代印刷設備與技術方面的不足，讓台灣人

即便可以克服財力方面的限制，仍然必須利用島內的報社、海外的出版社或書店才能將作品付梓<sup>252</sup>。不過，這個來自於殖民地傳統卻被殖民者接受了士紳階層，以及他們所習慣使用的語文、書寫文類、交際方式等等，並不僅僅只是完全以其舊有的特徵依存延續，台灣文人透過以往慣常利用的漢詩、文人結社的相處方式，或者透過參加總督府所舉辦的藝文活動來保持以往偏向人與人親身接觸的交往習慣，同時也透過日資媒體參與總督府限制下「有條件開放」的公共空間。

即便台灣人在印刷媒體的輸入、出版等方面受到了總督府的監視與篩選，但是在以「協力者」的次要角色參與印刷媒體報刊的出版之際，他們還是因此透過閱讀、翻譯與改寫仲介等種種方式，擴大了文化啟蒙的傳播層面，也逐漸地讓士紳這個名詞的義涵產生質變，在道德智慧的層面外更添加了許多關於現實知識上的視野。一方面，台灣人開始透過參與由總督府所主導的藝文活動與出版刊物之際，或許便是他們未來逐漸地朝向積極主動角色轉變的開端。另外，透過 1920 年代前後發行的幾份報刊發刊詞中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線索，可以用來說明：何以這些台灣人都當時都選擇了相同的行動，進而具備了被劃分作為同一世代成員的理由。

本島自改隸以而後，凡欲攻漢學者，於文不受制藝所拘，於詩勿為試帖所厄，上下千古，縱意所如，此誠文運不振之秋，詩界革新之會也。……由是觀之，為此國之人，只求此國之學，而不更求他國之學者，其亦拘泥之甚矣，夫以歐洲之語言文字，因時制宜，且不可不學，而況於漢文乎。<sup>253</sup>

面對 19 世紀以降文明接壤的衝擊，有關文化的危機感是印刷媒體世代普遍擁有的共同特徵，這段引自《台灣文社設立之趣旨》的文字，反應出漢學縱使脫離了科舉八股的限制，卻仍受到了西學傳播的挑戰，而顯現出所謂「文運不振」的失落與危機感。除此之外，其他諸如過去所謂傳統文人的印刷媒體刊物，像《台灣詩薈》、《詩報》等，也都在創刊詞中出現類似的話語、顯示其對於漢文化失落的危機意識。

今人恆謂漢學不如西學。顧談者其人。大都不知漢學。亦不甚解西學。<sup>254</sup>

<sup>252</sup> 例如李春生的《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便是在《台灣新報》上發表後，才再由福州美華書局刊印出版。

<sup>253</sup> 著者不明，〈台灣文社設立之趣旨〉，《台灣文藝叢誌》（台中：台灣文社，1919），卷 1，頁碼不明。

<sup>254</sup> 魏潤庵，〈詩報發刊詞〉，《詩報》創刊號，（桃園：吟稿合刊會，1930）。頁 1。



蟹行文字之曼衍於瀛壖也。漢學危微。欲墜未墜之秋。<sup>255</sup>

西力東漸，大地溝通，運會之趨，莫可阻遏。…漢學式微，教育未咸。<sup>256</sup>

然而，所謂傳統文人的感受，在 1920 年於東京發行的《台灣青年》創刊號當中其實也顯示出同樣的不安：

不幸にも我が台灣地理的に偏■で且狹小である。昔人はその為めで、文化的世界の大勢に落伍したものである。甚だ残念でならぬ。<sup>257</sup>

是故，如上所述的這種關於文明的危機感，幾乎可說便是當時台灣文化菁英所普遍存在著共同焦慮。另外，印刷媒體刊物則幾乎成為了面對此一困境時所採取的共同因應策略。諸如像是：

同時得以保存我黃種人自昔發達之燦爛文化精華。然後進而廣採世界大同智識。<sup>258</sup>

夫欲啟發社會之文明。必先吸收高尚之文化。尤當順應世界之潮流。然後可使民智日開。而進於文明之域。若是者非廣為介紹內外之思潮。莫能奏效此發刊雜誌所以為當務之急也。<sup>259</sup>

這般順應潮流、保存文化、啟發民智的種種訴求，也就成為了他們透過媒體刊物所企圖達到的共同目的。本論文認為：這種集體的意識感知與行為傾向，一方面是他們(不管是過去被稱為傳統文人或知識份子的台灣民眾)過去之所以被研究者強調其「現代」色彩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本論文之所以將他們歸類到相同世代的理由所在。

<sup>255</sup> 邱筱園〈詩報發刊詞〉，《詩報》創刊號。頁 7。

<sup>256</sup> 〈台灣詩薈發刊序〉，《台灣詩薈》(台北：台灣詩薈發行所，1924)創刊號，頁碼不明。

<sup>257</sup> 「不幸的是我台灣地處偏遠又狹小。以前的人因此而認為我們落後於文明世界的大多數人。這真是令人感到萬分的遺憾。」〈卷頭之辭〉，《台灣青年》(台北：東方書局復刻，1973)創刊號，頁 1。

<sup>258</sup>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台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頁 2。

<sup>259</sup> 王敏川，〈「台灣青年」發刊之趣旨〉，《台灣青年》創刊號，頁 41。

啟蒙知識的接受雖然是台灣印刷媒體世代之所以形成、分立的條件；但是，倘若無法在印刷技術的層面上取得突破，則世代單位便永遠只能在印刷媒體產業當中處於被動參與的次要角色，更無需尋求其他台灣社會大眾的支持。是故，當台灣民眾自 1920 年代前後開始嘗試掌握印刷媒體的生產過程之際，其實便是在克服技術與政治上的阻礙之後，由本來習慣的結社、集體創作並結集出版以及轉移現有的人力資源等的條件之下，更進一步地將自己投身於印刷媒體的生產過程當中，擴大了世代單位在生產與傳播上的功能。這個由接受到生產的轉變過程，意味了世代單位不再僅僅只是讀者、業餘的作者，同時也是編輯者、出版者，開始具備了凝聚集體共識的有效功能。

一方面，透過印刷媒體刊物的出版，媒體刊物提供讀者與作者一個彼此溝通、交流的公共空間。另一方面，這些媒體刊物從撰稿出版到發行傳播的過程中，其實也延續了原本文人社團所具備的菁英性格，在語文、創作文類與知識傾向上具備了各自的喜好與傾向。因此，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成員在介入印刷媒體刊物的出版發行之際，其實便是在原本的同人的特質之上，更進一步地加上了「同時性」與「現實性」的特徵。「同時性」與「現實性」特徵的形成幫助台灣民眾開始進一步地進入意識一島化的形成過程，而不致於完全被官方所主導。但是印刷媒體世代之所以分立，進而在形塑同時性的同時無法產生一致的認知與認同，主要還是在於其在 1.現實上的認知、2.對總督府統治的態度以及 3.對台灣文化的想像與期待等方面都大相逕庭，導致世代單位之間彼此對抗或聯合的各種情況。

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成員彼此分立的現象也與總督府的媒體管制政策有著明顯的互動關係。好比說，1896 年起台灣人印刷媒體世代的自在世代便因為現代印刷媒體刊物的引入而持續存在；但是，約略自 1920 年代才開始出現的、印刷媒體世代的自為世代則是伴隨著 1920 年代文化抗日運動而蓬勃發展，並且在「同人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的協力之下，進一步得到挑戰日本殖民統治的動能。因此，本論文注意到的是：以往論述往往在突顯世代單位彼此對立的這個情況下，忽略世代單位在參與印刷媒體生產與傳播的過程當中其實都同樣歷經了由購買到販賣、從投稿到編輯、自接受到出版的相同過程。好比說，在過去被視作為是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代表人物的蔣渭水與連橫，在介入印刷媒體生產與傳播的過程當中，其實都並無二致的成立過書局，參與過報刊雜誌的發行運作以及在當中進行論述上的戰爭。另外，他們各自所創作的文類、議題等其實也多有重疊、無法被截然二分。

是故，就在世代單位之間彼此源發於相同的世代位置、文化場域，卻進而產生彼此對立對抗的認知與訴求的情況之下，如何重新檢視印刷媒體世代之間的聯合與對立情況，便為本論文在底下所要進行的主要嘗試。

## 二、世代單位的聯合策略

台灣留學生自 20 世紀初期到內地接受高等教育與現代啟蒙知識的洗禮，進

而也讓過去在六三法體制下所形成的(日本內地與台灣外地各自屬於不同法領域的)情況產生變化。原先橫互於台灣、日本的地理邊界開始因為台灣留學生的頻繁往來而被跨越；本來流傳於日本內地的現代化知識與文明啟蒙等知識、概念，也開始因為人的移動而產生了各式各樣的流通現象。

台灣本地社會從六三法、三一法到最後演變成法三號的政治環境變遷過程中<sup>260</sup>，逐漸打破了原先由總督府利用法體制所建立的特殊封閉情況。因此，台灣留學生雖然在日本內地得到了許多過去在台灣未必有機會接觸到的刊物與思潮，但是其與台灣本地的社會變遷、台灣民眾積極參與他們所號召的行動有著不可忽視的緊密關係。

在底下的討論中，本論文將說明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聯合策略，藉此說明：一旦聯合策略的結構越為緊實，其所能產生的動能也就越大，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去挑戰總督府的殖民統治政策。所謂的聯合策略指的是 1920 年代印刷媒體世代結合將同人社團、印刷媒體與社會運動緊密扣連，進而得以抨擊殖民統治的歷史情境。在此，本論文選擇以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報》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作為個案，一來由於三者是台灣文化抗日運動的共同主力<sup>261</sup>，二者其歷時最久、影響也最深的諸多特性，更有助於本文進行闡述論證。三者，當社會運動逐漸解消沉寂，同人團體與印刷媒體的合作關係仍然讓台灣人保持著一定參與公共空間的可能性，但所具備的反抗動能卻也隨之降低。

根據總督府方面的記載，蔣渭水與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的學生及畢業生等於 1920 年 11 月便成立了文化公司，購買並散布來自中國與日本的新聞雜誌與圖書。然後，才在東京發起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降於 1921 年時與林獻堂協議，在 10 月 17 日舉行了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大會<sup>262</sup>。透過時間上的剖面對比，可以得知當台灣留學生於日本發行《台灣青年》雜誌之際，留在台灣本地的醫專學生何禮棟、李應章、李海水等人，也正在與蔣渭水商量如何地來組織一個新的文化團體，同時更透過成立書局的方式，主動地來控制知識來源(即圖書雜誌等)的流通管道。

上述顯示，文化抗日運動固然受到了國際潮流的啟蒙誘發，但在強調海外留學生的貢獻之際，卻也不該忽略了台灣本地人士對於文化抗日運動的積極參與。文化抗日運動自形成之際便呈現出明顯的聯合陣線特徵，像是在〈台灣文化協會章程〉當中，包括第四條「本會以贊成本會目的之男女組織之。」、第五條「本會發刊和漢文之會報頒布於各會員。」與第九條「會員每月需繳會費金五拾錢(學生五折)一年分三期預繳，但不妨預繳數年分。」等規定，都可以看出文化協會

<sup>260</sup> 關於台灣日本統治時期的法律變遷，可以參考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台北：聯經，1999)，頁 86-115。

<sup>261</sup>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中：晨星，2000)，頁 327。

<sup>262</sup>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頁 329-330。

在成立之際企圖聯合不同性別、身份，甚至是語文使用習慣的台灣民眾<sup>263</sup>。除此之外，透過台灣文化協會〈會報〉委託台灣雜誌社印行，以及讀報社中往往特別訂購中國地區的新聞雜誌供人閱讀的這些情況，也可以發現這個文化抗日陣營的地理範圍已逐漸從台灣擴大至日本、甚至於中國。

這無疑證實了台灣當時作為文化交疊區域的這個特徵，中國與日本作為台灣重要的知識、資訊來源，許多頗具啟蒙意識的報刊媒體皆需自兩地進口，甚至於連文化協會本身的機關誌〈會報〉也要仰賴位於東京的台灣雜誌社來幫忙刊行。再加上，這個文化抗日運動陣營自一開始也並非抱持種族主義的意識型態立場。例如，治警事件當中為台灣人被告辯護的日籍律師，以及在《台灣青年》等刊物當中大量投稿的日籍人士等，便已經為這個文化抗日陣營的聯合陣線特徵作了最有效的注腳。

本論文之所以刻意強調印刷媒體的影響與價值，在於縱觀台灣文化協會當時的活動內容，其實也具備了結合台灣社會不同媒體進行宣傳的這項特徵。從台灣文化協會本身發行會報、成立讀報社、利用美台團播放電影，以及藉由巡迴演講的方式取代台灣人始終無法掌控的無線電廣播，都可以看出當時台灣民眾在宣傳工具的多方嘗試<sup>264</sup>。然而，上述那些宣傳管道往往伴隨著文化協會的分裂而一起瓦解；僅有台灣民報系刊物(即自《台灣青年》到《台灣新民報》)卻不僅始終配合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成為了繼日本統治初期台灣武裝抗日運動覆滅以後再一次與日本官方進行持續交鋒的主要陣線。甚至於當 1927 年文協分裂，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逐漸沒落終至被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取代之際，《台灣民報》在台灣社會的影響力上倒不減反增，始終可以與總督府所扶持的官方報刊一較長短([圖二]：曼海姆概念下日治時期 1920 年代台灣印刷媒體世代)。

不過，雖然直到 1930 年代左右印刷媒體與社團組織、政治運動緊密結合的情況仍然持續維持。但是一方面發行規模最大的《台灣民報》，其背後所代表的政治立場已經因為團體一而再、再而三的分裂而退卻失能，逐漸地往商業、大眾化的方向移動<sup>265</sup>；另一方面，左翼組織與刊物雖然仍舊保持著較為基進的批判力道，卻又偏偏無法擺脫殖民地統治下對於印刷媒體刊物在出版時的種種限制。於是就在 1930 年代以降，台灣印刷媒體世代即使仍然保持著同人團體的特質，並持續地創辦屬於他們自己的印刷媒體刊物，卻也開始脫離 1920 年代時的政治色彩，與社會運動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而本來徘徊於報刊篇幅中的政治(自治)議題，也逐漸地被經濟、文學、文化或者是語文等方面的其他議題所取代；直到戰爭期以降，才再一次地因為戰爭動員而回到印刷媒體的場域當中。

<sup>263</sup> 以上〈台灣文化協會章程〉，轉引自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頁 334。

<sup>264</sup> 關於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可以參考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不過必須說明的是，即便上述內容呈現出 1920 年代台灣人對於不同媒體工具的使用嘗試，但在整個日本統治時期當中，還是只有印刷媒體是台灣人能夠主動生產、控制的媒體工具。

<sup>265</sup>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頁 219-220。

因此，印刷媒體世代這個概念不僅吻合於以往台灣文化抗日運動史的敘述脈絡，重點更在於：如果 1920 年代台灣人所進行的文化抗日運動，代表台灣漢人從原本傳統民變的型態朝往近代反殖民統治運動的方向前進<sup>266</sup>，則不可被忽略的關鍵，在於印刷媒體究竟是如何地改變這些台灣人的認知，並促使他們更進一步利用它來取得反抗殖民統治的有效動能？總而言之，印刷媒體—同人團體—社會運動的聯合策略不單單只企圖團結台灣社會中的不同性別、階級或職業身份，同時在形成同人團體之後更利用印刷媒體刊物進行宣傳，以擴大其社會運動的群眾基礎，進而達到抵抗日本總督府殖民統治的具體功效。更重要的是，即便印刷媒體世代在形成之際便存在著許多明顯的對抗關係，卻也恰好證實了：台灣人印刷媒體刊物自 1920 年代前後踏上歷史舞台，就一路持續延續到終戰的歷史發展。

### 三、世代單位的對抗關係

1920 年代以降，印刷媒體世代單位彼此之間所發生的許多場論戰與過去論爭不同的地方在於：世代單位開始明確地利用印刷媒體區分自我與他者，並刻意強調彼此之間的不同，以藉此爭奪大眾、爭取其他旁觀者(讀者)的支持。於是，即便台灣印刷媒體在普及度上遠遠低過於殖民母國，同時直到 1930 年代台灣各種文藝雜誌往往處在虧損的情況<sup>267</sup>，但是台灣印刷媒體在發行的數量上並沒有因此而受到阻礙，反而直至 1937 前都持續地向上攀升。以台灣的文藝型雜誌為例，至少在 1921 年《台灣青年》創刊、乃至 1923 年《台灣民報》半月刊開始在台灣發行的同時，尚有包括如上述提到的《叢誌》、《台教會》與《台灣詩薈》等媒體刊物存在；而待至 1927、1928 年文化協會改組以降，則有更多左翼色彩的報刊出版，都在在證實了印刷媒體世代世代單位分立的歷史現象。

世代單位之所以分立的主要原因，在於當台灣進入殖民地統治，台灣人在接受教育多軌化因素的影響下，讓台灣民眾不再僅僅只有由儒教所主導的書房教育；殖民地現代化教育與社會教育、留學教育等等不同的受教途徑，都讓台灣人的文化資源愈形地豐富。再加上，書籍報刊方面也由原本的福建沿海一帶，增加了上海與日本等地，也豐富了台灣民眾的知識來源。因此，在這個所謂文化交疊地域的空間當中，台灣民眾的知識養成途徑也就開始產生分化、獨立的特殊情況。於是，台灣印刷媒體世代處在文化交疊區域的情況，終究讓印刷媒體本身所具備的創造「一致性」的功能，在受到印刷媒體來源的「多向性」(中國、日本、台灣)與「多元化」特質所影響，讓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認同與認知呈現出遠較其他地區複雜、游移的不確定情況。好比說，台灣印刷媒體在使用語言的方面，便在 1920 年代以降逐漸地從原本的二元構造，逐漸分裂成包括中國白話字、羅馬字、漢字、台式白話文、日文等不同的語文訴求<sup>268</sup>；至於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民

<sup>266</sup> 翁仕杰，《台灣民變的轉型》(台北：自立晚報，1994)，頁 154-155。

<sup>267</sup> 藤井省三著，張季琳譯，《台灣文學這一百年》(台北：麥田，2004)，頁 58。

<sup>268</sup> 李承機，〈殖民地台灣媒體使用語言的重層構造〉，若林正丈，吳密察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頁 201-239。

眾在政治認同上的歧異與紛雜，一定程度上也同樣受到印刷品來源的間接影響。

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分立與聯合，在後來的許多面向上都形成了彼此對抗、論爭的結果。這些論爭之所以在過去的討論當中成為了研究者所特別專注的部分，在於台灣人印刷媒體的出現固然有助於台灣民眾去創造屬於自己的同時性認知，但是在現實層面，即對於總督府殖民統治的因應態度、對於台灣文化的認知、認同與想像等都不盡相同，進而導致彼此爭論、辯解的歷史現象。根據研究者的整理，可以發現早在 1906 年起台灣文人便已經出現對於古典漢詩革命的相關論爭；同時自 1920 年以降，每年都有台灣文人藉由媒體報刊提出對於傳統漢文創作的建議與反省<sup>269</sup>。也就是說，自日本統治初期印刷媒體便已經被台灣民眾作成是彼此溝通、討論的應用工具。然而，受到媒體刊物本身尺度，或者是刊物本身同人性格的影響，早期台灣印刷媒體刊物中的討論氣氛較少出現基進的革命式話語，而往往偏向改良、修正的論述基調<sup>270</sup>。這種較為緩和的氣氛，到了 1920 年代以降台灣印刷媒體刊物開始林立之際，便一躍轉為世代單位彼此之間針鋒相對的緊張情況。這種各言爾志、各有立場的歷史現象，在過去往往被強調是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之間的認知落差。

1923 年 12 月 16 日清晨，總督府對全島請願份子展開由北到南的大整肅，當天被搜查並扣押的共有四十一人，被搜查且被傳訊的有十一人，只被搜查的有十二人，僅被傳訊的有三十五人，共計九十九人，史稱「治安警察法違反檢舉事件」，又多簡稱為「治警事件」。治警事件發生後，包括《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等偏向於總督府的官方媒體大多不置一詞，但《台灣民報》卻在第二卷第十六期大篇幅的報導法庭中檢察官與律師的論辯，以及當事人林幼春、林呈祿、陳逢源等人的答辯內容<sup>271</sup>。

就結果論而言，官方報刊所選擇的默視態度，在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自治警事件之後重整旗鼓的情況對比之下，不論是政治或策略方面都顯得格外正確。正因為報刊媒體具備著凝聚共識的有效功能，所以《台灣民報》在治警事件當中所代表的意涵，便是世代單位在掌握印刷媒體這項宣傳工具之後，終於得以擺脫原先受制於總督府報刊的直接限制，促進台灣民眾對於公共事務(不管是政治或者是經濟面向)的關心與參與<sup>272</sup>。況且，即便以往台灣文學史的研究當中往往將新舊文學論戰視為是一場新與舊、保守與革新、抗日與親日的對抗。但是，與其將這場論爭的意義放置在它突顯了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之間在諸多面向上的不同，倒

<sup>269</sup> 翁聖峯，〈第四章 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發展史(上)〉，翁聖峯，《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2006)頁 82-93。

<sup>270</sup> 根據翁聖峯的研究，1920 年以前有關文學方面的論爭僅有十則，其中連橫與許子文曾分別主張詩界革命與破除迷信，興起一些波瀾。但連雅堂一事隨即在文友調停下平息，論戰的規模與時間長短上都無法與後來的論戰相比。翁聖峯，〈第四章 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發展史(上)〉，翁聖峯，《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頁 82。

<sup>271</sup>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 82-83。

<sup>272</sup> 有關治警事件後台灣民眾對於文化協會人士與事務的參與，可參考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 87。

不如說它事實上呈現出自此次論戰開始，台灣社會不分過去所謂的傳統文人或者是知識份子，都各自開始藉由屬於或偏向自己立場的印刷媒體來發表論述，並藉此攻擊對手，以爭奪當時台灣社會大眾的支持。

好比說，張我軍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當時出版於東京的《台灣民報》；而連雅堂的文章，則主要刊行於在台灣印行的《台灣詩薈》。這種各占山頭的情況當然不只是隔海嚷嚷，《台灣民報》在台灣文化協會與讀報社的傳播散布之下，在當時的台灣社會公共空間中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台灣詩薈》也同樣是傳統文人們所會集的機關重地。是故，兩人的文章不僅僅具備了號召我族、對抗外族的功能，同時也在印刷媒體本身所具備的同時性特徵影響之下，讓這個有關文學典律的意見之爭，變成了當時台灣社會普遍討論的現實性問題<sup>273</sup>。

從新舊文學論戰的這個案例，可以看到的是自 1920 年代起世代單位開始藉由印刷媒體來散布、形塑特定的概念與意見，並企圖尋求大眾支持。事實上，研究者已證實了新舊文學論戰本身並不僅僅只是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的論爭，它同樣也包括了彼此合作的面向<sup>274</sup>。況且，自此以降台灣民眾各自利用印刷媒體陳述意見、彼此交鋒的歷史現象便開始屢見不鮮，這些發生於印刷媒體世代當中的爭執，進而也在印刷媒體的出版與傳播之下，產生了有異於過去的社會現象。好比說，諸如《台灣民報》與《台灣日日新報》對於「御用紙」的爭議；或者是 1927 年以降因為台灣文化協會分裂而成立的《台灣大眾時報》、《新台灣大眾時報》等與原來舊文協的《台灣民報》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像是《台灣戰線》、《伍人報》、《洪水》、《第一線》等原來就具備明確政治訴求的印刷媒體刊物等等都存在著集團性的同人特質，同時也同樣地訴求著其他台灣大眾的支持。

總而言之，面對日治時期報刊媒體上的諸多論爭，本論文以為與其要用種族、年齡差異或者是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的區分方式，倒不如更進一步地就不同世代單位及其組成的同人團體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認知、認同傾向上來加以著眼，更能看出世代單位之間的差異所在。若非台灣民眾普遍積極地成立報刊、介入公共空間，則 1920 年代以降幾次規模宏大的文學或政治論戰，便很難具有形成的可能性。是故，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分過去所謂的傳統文人或者是知識份子都理所當然地應該被歸類在印刷媒體世代的成員當中。因為，在他們彼此對抗、對立的情境之下，至少還有一點特徵是相同的：他們都同樣地透過印刷媒體本身的宣傳效果來企圖得到更多台灣民眾的支持、加入他們的陣營，以有助於他們打敗同樣利用印刷媒體進行宣傳的論述對手。更何況，世代單位之間的論爭往往不僅僅於印刷媒體上開展；社團組織與印刷媒體原本便是機關組織與機關誌

<sup>273</sup> 除了《台灣民報》與《台灣詩薈》外，尚有《台灣日日新報》、《台南新報》、《人人》、《黎華報》等刊登相關的文章。翁聖峯編，〈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文獻一覽表暨統計表〉。收錄於翁聖峯，〈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頁 343-418

<sup>274</sup>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頁 106-113。因此，或許更應該被懷疑的是，過去的台灣文學史論述究竟是在什麼樣的知識論基礎之下，才會將論述的主要雙方、即張我軍與連雅堂二人各自視為是所謂知識份子或傳統文人的社群代表？

的關係，更在透過活動、乃至於運動進一步地得到印刷媒體刊物本身蓬勃發展的主要動能。

#### 第四節、小結

日本統治時期以降，伴隨而來的殖民地現代教育與社會教育，配合現代印刷媒體的到來而將台灣民眾帶入印刷媒體的時代當中。另一方面，台灣傳統地主制及其領導階層們在總督府對漢文、漢文人的依賴之下，除了進入日本資本的印刷媒體擔任漢文欄記者之外，更因為總督府的交通建設與全島性的文人聚會而逐漸取得一島化的「同時性」認知，以及印刷媒體的參與經驗。

於是，台灣民眾自 1919 年起開始擺脫過去諸如投稿於《台教會》雜誌的被動參與角色(自在世代)，轉而成為主動成立報刊的積極角色(自為世代)。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形成一方面體現了自己處在文化交疊區域的此項特徵，同時也在形塑共同認知上，取得了「現實性」的特徵。是故，受到文化交疊區域影響下所形成的世代認知與認同(包括文類、文字、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便在各自所擁有的印刷媒體刊物當中呈現出不同的競合關係(分立、結盟，甚至於對抗)，進而影響了後來研究者的認識與判斷。

透過印刷媒體世代的這個角度，有助於從以往傳統文人或知識份子的社群分類，進一步地去承認他們在文化場域與行動方面的相似之處。首先，自 1920 年代以降不分所謂傳統文人或知識份子其實都已經積極地去成立屬於自己的印刷媒體刊物；同時，這個印刷媒體刊物往往具備著特定文字、文類或政治立場上的傾向與訴求，進而不單單與總督府、甚至是台灣民眾的印刷媒體產生歧見、彼此論爭。尤其重要的是，印刷媒體世代對於群眾們的需求，改變了過去因襲自清帝國統治時期以降台灣社會官紳共治的不公平現象。也就是說，公共空間的形成讓台灣的一般大眾得以抬頭，逐漸地浮現在歷史的舞台當中。

印刷媒體世代這個概念並非否定以往推崇文化抗日運動的既有論述，相反地，本論文透過「印刷媒體—同人團體—社會運動」的觀察角度，提出印刷媒體世代本身所具備的動能往往在於三者相互合作、協調的情況之下，才可以得到最大的積極效果、甚至於一定程度上去挑戰籠罩於台灣社會的殖民統治結構。這不僅有助於區隔不同台灣人印刷媒體在該時期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也有助於在擺脫民族主義、反殖民或後殖民立場的既定概念下，直接對於不同台灣人印刷媒體刊物賦予褒貶。以下，本論文將透過日治時期台灣聞人陳逢源的生命經歷，討論台灣印刷媒體世代如何結合「印刷媒體—同人團體—社會運動」取得反抗動能，進而促使了 1920 年代台灣文化抗日運動的勃興；並且就文化抗日運動最後的瓦解崩壞，確立印刷媒體本身之所以被突顯為世代特徵的理由與依據。





## 第四章 印刷媒體世代的個案研究：以陳逢源(1893-1982)為代表

### 第一節、陳逢源與印刷媒體刊物

#### 一、書房與漢詩文

本章節主要透過日治時期台灣閩人陳逢源的生平經歷，嘗試從個案對於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論述進行補充，作為歷史詮釋上的證據。本論文之所以選擇陳逢源作為討論時的個案，主要的考量在於：「社會結構所連結的，並不是有名有姓的個人，而是任何一個佔據了由社會關係所指定位置的人。<sup>275</sup>」也就是說，倘若印刷媒體世代的概念可以成立，則任何生活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社會中的台灣人都應該可以被放入本論文的框架中來進行詮釋，進而區分他們究竟屬不屬於這個世代的世代單位？在這個世代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另外，其他一個可以解釋的理由是：陳逢源在以往的研究成果當中曾經分別被定位成為所謂的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也曾經與「世代」議題有所連結。換言之，使用陳逢源為個案不僅僅在理論層次上具備著與前行研究對話的空間；同時在歷史研究方面，也因為陳逢源的生涯跨越了整個日本統治時期，並接受過台灣傳統的書房教育與殖民地現代教育、分別任職於日本或台灣資本的公司，幾乎直接涉入台灣民族社會運動的發展脈絡，經歷治警事件、滿洲事變、日華戰爭、太平洋戰爭與皇民化運動等重大的歷史事件。又，除了陳逢源個人的生命經歷及其相關研究的關連性之外，陳逢源至今仍保存於中央研究院南都藏書室的圖書，以及其發表於台灣民報系等其他媒體刊物的著作，都有助於瞭解當時印刷媒體刊物在台灣的流通與傳播、再生產現象。因此，底下本論文便首先透過家世背景與陳逢源個人的生平經歷，就其與印刷媒體刊物的接觸歷程，討論當中所透露出來的時代意涵。

陳逢源出生於 1893 年，父親陳挺是台南地區擁有近 50 多甲地的中小地主，更是擔任過區長的地方頭人。因此，陳家的家世背景代表的其實便是台灣自清領時期延續下來的傳統社會結構。陳挺擔任日本統治下的轄區區長，但陳逢源卻先進入到傳統的漢書房接受教育，反映的便是當時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傳統與殖民力量彼此拉扯的特殊現象。陳逢源於 7 歲時被父親送至前清秀才王鐘山所開設的書房求學；2 年後才因為巡查屢次到府上勸導而轉學於台南第一公學校就讀。當然，此事或許可以解讀為殖民力量與傳統力量之間的消長。但是，台南第一公學校的校地延用的其實還是過去清帝國統治時期所興建的台南孔廟，而陳逢源本來的書房老師王鐘山也被應聘至台南第一公學校擔任漢文教師<sup>276</sup>。

<sup>275</sup> 萬毓澤，〈第二版導論〉，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頁 21。

<sup>276</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20。

即便陳逢源自認為書房教育對他的影響並不顯著<sup>277</sup>，但是漢詩創作及其就漢文方面的使用能力等，都可以看出書房教育、傳統地主階層依存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各種現象。更別說，漢詩創作是陳逢源過去受到學界關注的第一個面向<sup>278</sup>，往往被投射了所謂漢民族主義的政治色彩<sup>279</sup>。基本上，過去的研究大多將其個人使用的創作文類界定成其在政治立場上的表態，或者說，從文類的傾向進行知識社群上的區分，將陳逢源認定為二世文人，或者用來解釋創作者的動機與目的。陳逢源自 1913 年國語學校畢業、任職於三井會社起便開始參加傳統漢詩社如南社、春鶯吟社等，他的作品不僅顯示出具有漢民族意識的這個面向<sup>280</sup>，同時也呈現出台灣人搖擺於抵抗或附和日本殖民統治的尷尬情況<sup>281</sup>。

陳逢源的漢詩創作及投稿經歷，其實與後來 1920 年代台灣人逐漸透過社團、同人組織來凝聚集體意識，並且利用印刷媒體刊物進行宣傳、凝聚集體意識有著一定的相似。陳逢源 1913 年在加入南社後與許南英、趙雲石、謝石秋等人結識<sup>282</sup>。南社或春鶯吟社雖然沒有屬於自己的機關誌，但是陳逢源在詩社同人的彼此切磋下，不僅詩藝日益精進，同時也開始投稿於《采詩集》等印刷媒體刊物<sup>283</sup>。後來當台灣民報系刊物出版，《台灣青年》改為《台灣》時陳逢源便持續地發表自己的漢詩創作，比如當《台灣民報》於 1923 年 4 月 15 日創刊當期，他便發表了以〈祝台灣民報發刊〉為名的四首作品；後來在因為治警事件下獄時，包括陳逢源、蔣渭水等人也都曾經在獄中發表了多首漢詩<sup>284</sup>。

1930 年代以降，陳逢源對漢詩的喜好也未見消退，《台灣新民報》中仍然可見他的作品。他不僅僅在《南音》雜誌上發表對於台灣舊詩壇的議論<sup>285</sup>，甚至於在出版他的中國遊記時，也夾帶了近 60 首的漢詩。因此，透過對於陳逢源漢詩發表情況的考察，其實再一次地確定：過去將台灣民報系刊物定位為「知識份子」的「現代印刷媒體刊物」的這項認知，其實忽略了它本身內涵中所具備的、來自台灣傳統漢古典文學與文化的養分與元素。同時，也因為陳逢源的漢詩創作其實是持續到戰後的，所以也被研究者賦予了具備漢民族意識的象徵色彩<sup>286</sup>。然而，

<sup>277</sup> 陳逢源對書房的描述：「書房中所教的漢文，如果說是中國國學，實在是太誇大了。書房是供兒童啟蒙學習的私塾性質的學校，所用的教本，內容很淺」。簡錦松，〈簡錦松訪問記錄(未刊稿)〉[出生]，頁 8-9。

<sup>278</sup> 如施懿琳及其指導學生李貞瑤的研究成果。

<sup>279</sup> 黃頌顯編，《陳逢源選集》，頁 1-4。

<sup>280</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62-72。

<sup>281</sup> 有關陳逢源於戰時期的認同變遷，可參考藍士博，〈從「差序」到「對立」：戰時期台灣旅人陳逢源的中國遊記〉，《第一屆東亞國際新任研究員學術交流大會論文集》(韓國：東國大學，2010)，頁 5-10。

<sup>282</sup> 黃頌顯編，《陳逢源選集》，頁 64。

<sup>283</sup> 陳逢源早期便曾投稿於《采詩集》當中。可參考施懿琳，〈從采詩集看台日漢文人的書寫話語〉，《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2002)。

<sup>284</sup> 陳逢源在因治警事件而入獄時期所發表的作品包括〈寄內〉、〈舊恨〉、〈天生〉、〈寄南強〉、〈寄耕南〉、〈寄柳居〉等，分別發表於《台灣民報》3 卷第 17 號、第 18 號。

<sup>285</sup> 如〈對於台灣舊詩壇投下一巨大的炸彈〉一文便是分別發表於《南音》1 卷第 2 號、第 3 號。

<sup>286</sup> 黃頌顯編，《陳逢源選集》，頁 1。

雖然陳逢源在過去的研究中因漢詩作品而被視作為是傳統文人(二世文人)，不過就其作品與同人社團、印刷媒體刊物之間的互動關係，其實顯現出來的並非所謂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彼此對立的歷史實況。另外，從陳逢源於 1923 年發表於《台灣》第 4 年第 4 號的〈目的與手段〉一文可以得知，其在流利的日文書寫能力之外，同樣也具備著相當程度的漢文書寫能力。因此，漢書房或漢詩文的教育環境與創作經歷雖然是研究陳逢源時的一大途徑，但是與其要將之視作為陳逢源個人具備漢民族(抗日)意識的證據，不如將之視作為其文化素養的一大來源。透過陳逢源的個案其實可以發現：語文(日文或漢文)或文類(漢詩或日文散文)上的差異並非是當時用來區隔敵我(日本人與台灣人)或者你我(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的有效工具。

更值得注意的，其實是台灣人在日治時期透過社團組織的緊密結合，逐漸地從印刷媒體刊物的被動參與者，朝往積極參與的主要角色前進的這個傾向，其實是不分語文、文類或者是知識社群都同樣經歷過的相同過程。因此，即便陳逢源個人在漢詩或漢文上的書寫實踐未必可以以漢民族意識來擴大解釋，但其所體現的卻確實是書房教育與台灣文人結社的歷史發展。同時，漢書房與漢詩所具備的文化象徵意涵，其實也是台灣印刷媒體世代本身所具備的、來自台灣本地傳統的元素與成份、文化交疊地域的基礎。

## 二、國語學校與書局

陳逢源與印刷媒體刊物之間的關係不僅受到教育環境的影響，同時也與當時台灣社會印刷媒體刊物的流通現象有所關連。1907 年陳逢源公學校畢業後北上就讀總督府國語學校。按照當時台灣社會的一般現象來看，能夠就讀於私塾、書房或者是公學校的台灣子弟一般都具備著較好的家世背景<sup>287</sup>，更別說是當時與總督府醫學校並列的國語學校。

總督府醫學校與國語學校所錄取的學生，不但經歷過入學考試的激烈競爭，其家世背景更是台灣社會領導階層們的後生子弟<sup>288</sup>。謝國興指出：「在陳逢源就讀的時代，國語學校的定位是台灣的『高等普通教育』，也是最高學府，畢業後若欲深造，只能去日本或西渡中國大陸讀大學。<sup>289</sup>」然而，陳逢源當時雖然在教育環境上受到如此的結構限制，但是不可否認的：這個本身存在局限的殖民地現代化教育，終究還是對殖民地人民的智識開化方面產生了相當大的啟蒙作用。

陳逢源在自述中指出，買書看書是他一生的興趣。而父親從他小時候便相當支持他購買書籍<sup>290</sup>，於國語學校就讀時更是大幅度地「擴張」了他在讀書一事上

<sup>287</sup> 〈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台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91)，頁 126。

<sup>288</sup> 謝明如，《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台北：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170-173。

<sup>289</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26。

<sup>290</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台北：允晨，2002)。頁 13。

的眼光與實踐<sup>291</sup>。除此之外，陳逢源也曾經在口述訪談中明確指出：《東洋經濟新報》、《鑽石》等經濟雜誌<sup>292</sup>以及丘淺次郎的進化論相關書籍<sup>293</sup>，是其學生時代印象相當深刻的課外讀物。因為包括經濟學、法制、哲學、文學等方面都是陳逢源在就讀國語學校時期才開始發展的知識範圍。其中又尤其以經濟學這門學科，是在老師三卷俊夫的啟發下，成為影響陳逢源一生的重要學科<sup>294</sup>。所以即便國語學校的學歷只等同於中學，但無論是自然或者日本、世界史地等等的相關知識，陳逢源都是在國語學校時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又尤其，總督府國語學校所在地的台北是各式印刷媒體刊物的集散地與配發所，更提供了陳逢源在取得印刷媒體刊物(報刊、書籍)上的諸多方便。

本論文並不否定以往認為殖民地現代化教育本身所存在著「不完全」特質，但同時也認為：我們不應該完全忽視殖民地現代化教育對台灣民眾的啟蒙作用。況且，從事隔五十年後，陳逢源仍然可以清楚說出書籍與報刊名稱的情況，更可以看出當時這些書籍對他所造成的深刻影響，顯示出台灣讀者當時已經形成對於定期刊物、單本書籍以及特定知識領域的接受現象<sup>295</sup>。換言之，從陳逢源就讀於國語學校的經驗中也可以得知：日本統治時期以降台灣社會進入了印刷媒體時代的氛圍當中，是時台灣社會領導階層及其後代、任何在經濟條件上較為充裕的台灣民眾都可以取得相較過去更多的印刷媒體刊物，作為他們吸收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知識來源。是故，台灣民眾於印刷媒體時代當中不僅仍然保持著過去對於單本書籍的閱讀習慣；報紙、雜誌等定期性刊物也同樣是他們一併閱讀的材料之一；尤有甚者，更進而養成了對於特定知識領域的鑽研偏好。

以目前收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南都藏書室中的陳逢源藏書為依據，可以推估陳逢源於日本統治時期便擁有大量的單行本書籍；另外，如果就這些書籍的出版地來進行考察，則可以發現：因為身處於「讀書過疎地域」的台灣，所以陳逢源個人的圖書收藏雖然主要也以日本方面的出版品為主，但卻也不盡然都只是來自日本方面的書籍。這樣子的情況其實也反映了台灣因為先後歷經不同政權統治，進而搖擺於不同知識、文明之間的曖昧情境。好比說，陳逢源的藏書當中包括出版於日本東京、大阪、京都；中國上海、長沙<sup>296</sup>以及台灣台北等地所出版的書籍。況且，一個有趣的地方更在於，當中有許多與中國方面有關的書籍，

<sup>291</sup> 簡錦松，〈簡錦松訪問記錄(未刊稿)〉[國語學校]，頁 7。

<sup>292</sup> 簡錦松，〈簡錦松訪問記錄(未刊稿)〉[國語學校]，頁 11、[三井物產]，頁 7。

<sup>293</sup> 其中由於目前中研院所存之南都藏書庫中已無丘淺次郎的著作，所以根據陳逢源就讀國語學校之際，即 1907-1911 年間的出版資訊，大致可以推敲出或許為《人類進化の研究》、《生物進化論》、《進化論講話》《增補進化論講話》等書籍，詳細情況，還有待未來作更進一步的考察。〈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台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91)，頁 129。

<sup>294</sup> 簡錦松，〈簡錦松訪問記錄(未刊稿)〉[國語學校]，頁 11。

<sup>295</sup> 雖然《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一書的成書時間為 1991 年，但是事實上口述訪談的時間，是在 1967、1968 年左右。至於〈簡錦松訪問記錄〉則未標明訪談時間。

<sup>296</sup> 根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中的南都藏書室中文書籍目錄，在總數 581 本中文書中，約有 177 本出版於 1945 年以前、且非出版自日本的書；扣掉出版地不詳的 8 本以後的情況，為重慶 1 本；桂林 1 本；北京 1 本；南京 1 本；長沙 16 本；上海 149 本，比例約近九成。

諸如《支那通史》、《支那研究》與《支那長生秘術》，以及諸如《琵琶記》、《西廂記》等中國的傳統戲曲，都是由日本的出版社出版。陳逢源所收藏的圖書不僅僅體現了「文化交疊區域」當中圖書來源多向性與多元性的特徵，同時也反映出當時東亞區域知識傳播的特殊交疊現象。

由陳逢源的經歷可以發現：殖民地現代化教育與印刷媒體刊物的傳播是促成台灣成為文化交疊區域的兩個主要因素。首先，殖民地現代教育有效率且持續培養許多在生物年齡上相對年輕，同時具備現代啟蒙知識、未來可能繼承其父祖在社會當中佔據領導地位的台灣青年。再者是，原本存在於台灣社會的所謂的傳統文人，同樣也可以透過流通日益頻繁迅速的印刷媒體刊物來取得與現代文明有關的知識與資訊。換言之，不管是過去所謂的傳統文人或者是知識份子，他們其實都生存在相同的文化世代。另一方面，就如同陳逢源在就讀國語學校之際反而開始了他對經濟學等現代知識的喜好；他也同樣透過出版於日本東京等地的出版品，間接卻又更頻繁地吸收原本源於中國的漢古典文學、詩詞或者戲曲。

一旦印刷媒體刊物本身並不單單承載著所謂的現代文明，那麼漢詩文、詩詞曲賦等文學、文化典籍等便同樣可以透過印刷媒體的便捷特質，再次在台灣社會當中形成更加普及化的影響，從而讓年紀與閱讀偏好二者在印刷刊物日益普及的情況下失去了必然的連結關係。是故，倘若文化交疊區域本身多向性與多元性的特色影響了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單位，成為了他們的共同特徵；那麼這些在內容上兼具傳統與現代、殖民與啟蒙的印刷媒體刊物，便也因為傳播媒介本身的「同時性」特質，而讓當時的台灣人身處在同樣的文化環境當中，形成了他們之所以與陳逢源一同被認定為相同世代的時空環境、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位置。

### 三、從會社行員到報刊記者

透過陳逢源個人的教育與閱讀經歷，可以藉此判斷他應該處在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位置當中，可以被視作為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成員。然而，陳逢源如何由本來的自在世代轉變為自為世代？或者說，陳逢源究竟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之下，由本來的業餘投稿者變成了《台灣民報》的專職記者？甚至投身於文化抗日運動的陣營之中？首先，本論文便從陳逢源自國語學校畢業以後、任職於三井會社的生命經歷來開始談起。

陳逢源於 1911 年進入三井物產，擔任月薪 18 圓的基層雇員。任職三井物產的這 9 年間，因為陳逢源的家世背景不差，加上待遇又足提供其日常生活上的開銷，過得頗為優渥。陳逢源一方面繼續閱讀經濟學相關的著作、雜誌，同時也因為實務上的見識，幫助他在理解台灣整體經濟的實際情況上有著更深刻的體認<sup>297</sup>。然而，陳逢源自國語學校畢業進入日資會社工作到離職的過程，其實也反映出總督府在殖民地統治過程中所存在的矛盾與縫隙。

<sup>297</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60。

謝明如的研究指出：作為總督府直轄下的總督府國語學校，不僅是台灣師範教育人才的培養搖籃，同時也是一般實業人才的供應源頭<sup>298</sup>。因此，諸如陳逢源等國語學校的畢業生，當他們在學校中取得現代文明啟蒙的知識以後，卻沒有完全地被總督府所控制的官僚系統吸納，反而回到社會與實業界，一定程度上便讓當時台灣相對薄弱的民間社會逐漸茁壯，進而成為未來文化抗日運動得以形成的人力資源。好比說：像陳逢源一般的國語學校畢業生(不管是師範部或國語部)，後來成為政經領袖的便高達 101 人、成為政治領袖的也有 40 人，以上的數據在與其他任教於公職的 17 人相比之下，便可以發現殖民統治的縫隙所在<sup>299</sup>。如果再加上當時台灣社會中所存在的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不平等待遇，更往往導致這些台灣人菁英的不滿。

總督府雖然可以利用教育資源的不平等來籠絡台灣的領導階層，但卻無法解除台灣社會當中日台不平等的情況，好比 1920 年陳逢源離開三井會社的原因，主要在於公司內部日籍、台籍員工的差別待遇、以及對升遷制度的不滿<sup>300</sup>。這種情況反而鬆動了本來建立好的利益結構，進而讓這些受過殖民現代化教育的台灣民眾成為後來台灣文化抗日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但是，必須留意的是陳逢源離職與他後來加入文化抗日運動間，並不存在著任何的必然關係。相反地，陳逢源作為台灣傳統中小地主的後代，在經濟方面沒有後顧之憂才應該是他得以斷然請辭的主要理由。況且，陳逢源家庭的經濟資本也同時提供了他找尋其他投資契機的必要開銷。好比說，陳逢源在 1920 年 3 月辭職以後，隨即在 4 月投資台灣勸業信托組合，並擔任取締役(即董事)，5 月任職台南信用組合的理事。另外，也分別於 1920 與 1922 年分別到日本、中國找尋投資創業的機會。

陳逢源赴海外投資的想法終究沒有實現<sup>301</sup>，不過卻意外促成他參與文化抗日運動陣營的契機。早在 1914 年之際，陳逢源便曾經參與台灣同化會台南支部的成立大會，並且在席間發言：以為台灣人在本來不應該贊成的同化政策下，或許可以暫時減低總督府的高壓統治手段。陳逢源在這次經驗中與本來就結識的朋友如王受祿、韓石泉等人重逢，並且一起與新結交的蔡培火等人交換了對於同化、平等的意見<sup>302</sup>。所以，陳逢源後來在離開三井會社以後，也才會因為與林呈祿等人為舊識的關係，而開始持續地在《台灣》中發表包括漢詩、讀書心得、雜感與政治論述等等的相關作品<sup>303</sup>。

陳逢源最後之所以於 1920 年代成為《台灣民報》的經濟記者，其實與他後

<sup>298</sup> 謝明如，《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台北：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2)。

<sup>299</sup> 謝明如，《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台北：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168-169、295-298)。

<sup>300</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61。

<sup>301</sup> 例如陳逢源本來計劃到中國發展，到中國後認為當地投資環境不佳，便放棄返回台灣，才有後來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可能性存在。參考：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83-93。

<sup>302</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77-78。

<sup>303</sup> 〈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 139。

來日益投入台灣民報系刊物、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人生抉擇有著相當密切的因果關係。他在結束中國之旅後，因為蔣渭水的邀請而與蔡培火一同主持台灣文化協會的台南支部，正式地加入文化抗日運動的聯合陣線。1923年陳逢源首次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且擔任了第3次赴日請願的台灣人代表；同一年則在《台灣民報》仍是《台灣》雜誌附刊之際便投資台灣民報社，擔任監察人。換言之，陳逢源的記者生涯自一開始便並非來自於其學經歷方面的專業，同時更在兼職記者的身份中具備著濃厚的政治運動色彩<sup>304</sup>。

陳逢源與其他參與台灣民報系刊物的台灣民眾一般，都是因為積極介入印刷媒體刊物的出版發行，而從原本的自在世代轉變成更主動積極的自為世代。加上台灣民報系刊物本身與文化抗日運動的緊密關係，以及不管是台灣文化協會或者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都代表著反官方的意識型態。所以陳逢源在該時期發表的時論內容也就因此而更具備著挑戰殖民統治的態度與立場。不過，就在分析陳逢源的論述內容之前，嘗試對其記者身份作出定位，不僅有助於跳脫以往使用知識份子或傳統文人的身份定位，同時也可以更進一步地就職業的角度瞭解：當時參與台灣文化抗日運動陣營同人們所代表的身份意涵。1923年4月15日陳逢源於《台灣民報》中發表了〈對台灣青年之希望〉這篇文章，內容中除了列舉保守家、現實家、理想家、經世家外，更於文章中以記者一詞自稱，可見已有明顯的職業身份自覺。從日本近代史的角度著眼，記者身份一直以來便是所謂知識份子的類型之一<sup>305</sup>。另外在其他針對記者這項職業所作的研究也同樣顯示：日本早期的記者往往有著政治家、教育家等不同的身份，直到1920年代以後才逐漸地因為制度化、產業化的影響下而開始單純化與專業化<sup>306</sup>。

陳逢源在1920年代開始擔任記者之際，台灣人的印刷媒體產業才剛要萌芽，與日本的新聞媒體產業發展有著相當程度的差異。首先，相較日本報業在歷經1923年東京大地震後所產生的寡占現象<sup>307</sup>；同樣歷經震災的《台灣民報》雖然也影響到刊物的發行，卻沒有中斷其企圖介入本來由日本資本掌握的報刊市場的方針。再者是，當1920年代日本新聞業已逐漸擺脫原本與政治組織、政治運動緊密連結的關係之際<sup>308</sup>，台灣民報系刊物卻相反地處於台灣總督府的對立面，試圖結合其他台灣大眾的支持。當日本新聞界已逐漸跳脫原本大新聞與小新聞的對立，轉而朝向中新聞這種兼具時事與娛樂，以報導為中心導向的報刊<sup>309</sup>，台灣民報系刊物卻反而帶著強烈的啟蒙性格，以及因為殖民地統治的限制而仍然只以雜誌形式發行的經營模式。

<sup>304</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199。

<sup>305</sup> 從日本近代史的觀點來切入，則所謂的知識份子往往具備著如下所述的幾種類型，即：(一)、志士型；(二)、幕臣論客型；(三)、幕臣報人型；(四)、教師型。可參考：李永熾，《日本的近代化與知識份子》(台北：水牛，1991)，頁16-20。

<sup>306</sup> 河崎吉紀，《制度化される新聞記者》(東京：柏書房，2006)。

<sup>307</sup> 河崎吉紀，《制度化される新聞記者》，頁51。

<sup>308</sup> 河崎吉紀，《制度化される新聞記者》，頁19。

<sup>309</sup> 河崎吉紀，《制度化される新聞記者》，頁21。



當日本報業已於 1920 年代開始專業化發展，台灣人的印刷媒體產業才開始萌芽，並且一定程度上重複了日本報業早期的發展足跡。當時台灣人的記者身份與其學歷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同時在台灣民報系的組織中，人際關係與在政治上所抱持的立場才是其是否成為《台灣民報》記者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台灣民報》更因為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合作關係，使得其記者往往具備著日本早期所謂「大記者」的特徵(即一方面擁有其他不同的社會身份，同時在議題的焦點上也特別著重於當時的政治與政策)。

是故，陳逢源從三井會社社員轉變為《台灣民報》記者代表的並不單單只是轉換職場跑道而已，相反地，這其實反映出台灣人逐漸地由掌握啟蒙知識到取得印刷媒體工具，透過宣傳進一步尋求結合其他台灣民眾，嘗試改變殖民統治壓迫現狀的努力。換言之，過去所謂的台灣文化抗日運動，就歷史角度著眼代表的是部分台灣社會領導階層逐漸從原本「官紳共治」的結構當中，主動積極爭取台灣民眾的支持，以改變其原本與殖民者合作的附庸身份。另一方面，如果以世代的角度，便也是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成員從原本的自在世代轉變為自為世代的發展與演變過程。

## 第二節、啟蒙論述的提出

### 一、讀書的趣味

在現代知識的傳播過程當中：1.閱讀、2.書寫、3.出版三者往往是彼此勾連、交織，進而被放在同一條思考脈絡中進行討論的不同層面。有別於清帝國時期透過石碑進行禮教宣傳，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特徵在於利用了現代印刷大量、普及與迅速的幾項特色，更有效地傳播了「讀書」的功能與效益。透過史料的爬梳，可以發現陳逢源在其著作中往往特別強調讀書對於個人精神生活上的陶冶，並藉此宣達企求台灣大眾覺醒、奮發的職志。然而，一個必須留意的地方在於：諸如陳逢源等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成員往往在經濟上較為優渥，也較當時其他台灣人有更多接觸印刷媒體的機會。所以諸如陳逢源等人在文章中往往不僅僅會告訴讀者：目前世界上究竟存在著「那些」新知、有那些相關書籍，同時更往往會介紹它們的內容，以方便讀者們理解。

假如創辦印刷媒體刊物的目的在於啟迪民智，那麼關於相關書籍的介紹文章似乎便成為了一種引薦世界思潮的最好作法。陳翠蓮在研究當中指出：1920 年代陳逢源的論述基礎主要建立在阿部次郎、桑木巖翼、左右田喜一郎與朝永三十郎等人的想法，偏向於人格自由的自由主義傾向<sup>310</sup>。因此，底下便透過對於陳逢源幾篇相關文章的內容，討論此類文章所存在的共同特色，以及其本身所具備的歷史意涵。

<sup>310</sup> 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頁 106。

陳逢源在發表〈詞林—劉銘傳〉詩作以後，再次以〈輓近世界の潮流を洞察せよ〉投稿於《台灣》雜誌，並且於1922年6月時被刊登發表。自此以降，陳逢源的文章在台灣民報系刊物中便屢見不鮮。內容當中也開始出現與其他書籍有所交集的現象，如〈台南公園の池畔に立ちて〉、〈新年號の雜誌を讀みて當來の植民地統治思想如何〉、〈植民政策としての友聯主義〉等都可算是相關的著作。這些文章不僅僅經常性地提及西方與日本的學者、著作，往往也會附帶陳逢源的個人描述，甚至是評論。好比說，〈台南公園の池畔に立ちて〉一文中陳逢源便提到マルクス(馬克思)與カント(康德)；並且於〈植民政策としての友聯主義〉當中，透過黑格爾與康德的學說來反駁當時台政新報主筆柴田廉氏的〈台灣同化策論〉。另外，包括山本美越、松岡正男、朝永三十郎、高柳賢三、ルーソウ(盧梭)、アントンメンガー、ワエルス等人，也都是陳逢源文章中曾經提到的人物。

這些現象顯示：當台灣印刷媒體世代開始掌握印刷媒體，也開始掌握介紹、引進現代文明知識，甚至與它進行對話、交流的基本能力。至於陳逢源最具代表性的此類文章，當推發表於1925、26年的〈讀書的趣味——良書的介紹〉與〈讀東鄉博士的《殖民政策與民族心理》的感想〉。陳逢源於〈讀書的趣味〉一文，首先便鼓勵有為的台灣青年應該多多培養讀書的嗜好，並且透過自己個人的經驗為例，認為「書卷是我的愛人、戀人、好友、先生、日食吧！」<sup>311</sup>；更將自己介紹的書籍定位在給一般的人士作參考的、中等學校畢業生的程度。

這篇文章中所列舉的書籍大多為日文出版，同時也標出作/譯者名稱、冊數、價錢與出版社；另外，也對每一本書籍提出他個人的評論與看法。其實相當明顯地便是企圖透過自己的介紹，讓其他台灣民眾得以產生購買、閱讀的動機。文章最後也提到未來他計畫也向台灣讀者介紹中國方面的出版品，顯示日文書籍雖然在當時台灣社會的讀書市場謂為主流，但也同樣存在中文出版品的銷售管道與市場空間。

縱觀〈讀書的趣味〉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十二本書籍，可以發現內容的範圍包括文化、經濟、農業、政治與婦女問題等等，顯示出陳逢源當時關注、以及希望台灣民眾關注的主要面向。尤其從這份書單當中可以得知，陳逢源不單單只傳遞了來自日本的圖書資訊，更利用其他書評來為自己的建議增添公信力。好比說，陳逢源於《世界文化史大系》一書便以美國國際書籍評論(The International Book Review)的評選結果為由，以為「它的價值，可說是世界公認的，我也不必再詳說了。」<sup>312</sup>另外，台灣讀者其實也透過日文書籍的出版而有了更多瞭解國際社會現況的機會與空間。好比說，像《丁抹的農業》(注：〈丹麥的農業〉)或《支那新人與黎明運動》這類的書籍，都讓台灣民眾得以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瞭解台灣以外地區的發展現況。

<sup>311</sup> 黃頌顯編，《陳逢源選集》，頁50。

<sup>312</sup> 黃頌顯編，《陳逢源選集》，頁51。

另外，陳逢源在〈讀東鄉博士的《殖民政策與民族心理》的感想〉這篇文章，詳細地介紹了這本書的出版經過，以及作者東鄉實之所以反對同化的理由。從陳逢源一併提到山本美越乃、泉哲、柴田廉等人便可以得知，其對於殖民政策的相關論述與著作應該保持著持續閱讀的興趣與習慣。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在於，對於山本美越乃與柴田廉兩本同樣使用民族心理作為根據的著作，陳逢源雖然有著全然不同的褒貶評價，但實際上也並沒有因為立場(反對同化政策)上的一致，而忽略了對於山本美越乃著作的質疑。由此可知，僅僅受過殖民地現代教育的陳逢源也已經透過個人的閱讀與努力，具備了與學術著作對話的基本能力，並且藉此來捍衛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與立場。透過陳逢源在文章最後「希望台灣的為政者、教育家，和一般人的士應該要讀一讀，做個參考吧！<sup>313</sup>」的呼籲，也可以瞭解到他企圖讓其他台灣人能因為閱讀相同的書籍，進而產生共同知識基礎的企圖。

由此可知，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成員由於個人經濟條件上的寬裕，自成長階段便較其他台灣民眾有著更多接受新知的機會。於是，就在其從自在世代轉變為自為世代以後，如何傳播他們的個人閱讀經驗，讓更多人與他們處在同樣的知識水準、進而塑造集體共識，也就成為他們在克服印刷技術限制後所企圖達成的目標。因此，諸如此類的文章在內容上不僅介紹當時世界上流行的知識、資訊，同時也往往因為對於殖民統治的看法差異，而投以相當程度的好惡褒貶。類似的意見，其實在〈最近之感想・一、後藤子的殖民政策〉或〈王金海君新著の《金錢信托》を讀む〉等文章中都可以發現端倪。

## 二、文明、文化論述與殖民地統治政策

台灣民報系刊物過去一般被視為是啟蒙大眾的宣傳工具，不管透過史料或者就其同人組織的名稱，也可以發現「文化」二字有著相當程度的曝光率，經常地出現在當時的報導當中。謝國興認為：「1922年至1926年間，是陳逢源以演講、撰文積極地參與文化啟蒙活動的時期，1927年起他任職於大東信托，此後撰文以經濟、金融專業問題為主<sup>314</sup>。」其中，他又將陳逢源於1922-1926的文章分類成：殖民地地位、財政經濟、文化進步等三個面向。相同地，黃頌顯也注意到陳逢源的所謂「文化主義」其實與其參與文化協會講演會的活動是有所關連的，並且從當時的演講題目如「文化運動之意義」、「文化的意義」、「現代文明之特色」等便可以得知<sup>315</sup>，文化啟蒙確實為陳逢源當時所特別在意、強調的焦點。

然而，究竟當時陳逢源所認知的文明與文化內容究竟為何？以及，其所謂的文化與文明之間是否存在著什麼樣的差異？透過文本方面的爬梳，得知陳逢源於第一次發表在《台灣》雜誌中的文章〈輓近世界の潮流を洞察せよ〉，便透過所謂的大亞細亞主義的萌芽，談論近來印度、中國方面(古代文明)的振興。後來，

<sup>313</sup> 黃頌顯編，《陳逢源選集》，頁65。

<sup>314</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114。

<sup>315</sup> 黃頌顯編，《陳逢源選集》，頁9-10。

又分別在〈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殖民政策〉、〈人生批判原理としての文化主義〉、〈文化の普及と創造〉等文章有著對於文明、文化的相關討論。

事實上，所謂的文明與文化至今仍然是台灣學研究中所經常注意的焦點，又尤其是因為所謂的文明、文化議題往往與殖民、啟蒙多所牽連，進而糾葛成模糊難辨的混雜狀態。是故，透過陳逢源當時對於文明與文化的討論，不僅僅可以瞭解其當時的個人思維；一定程度上，也有助於理清文明、文化兩個名詞在台灣的傳播系譜。1923年，陳逢源於〈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殖民政策〉一文中指出：文明與文化的不同，在於前者有世界的意涵，而後者則有地方的意思。另外，前者往往代表物質層面，後者則較強調精神方面。西洋文化的兩大主流是希臘、羅馬，東洋文化則為中國、印度。又，陳逢源認為一個地方不可能兼具所有的優點，好比說，法國人長於美術，德國人的科學與音樂調為翹楚。再加上，文化有其普遍與非普遍的特質，例如和服等日本文化的產物並不具備普遍性，但是像電燈、汽車等便具備著普遍性。終歸到底，陳逢源以為應該將其他地方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導入台灣，以形成具有台灣色彩的獨特文化<sup>316</sup>。

同年2月，陳逢源在〈人生批判原理としての文化主義〉中則將當時在台灣如火如荼進行的台灣文化協會與所謂的文化主義結合，以豐富其個人對於文化方面的相關論述。陳逢源認為已往歷史的時代往往是停滯的，只有時間在飛躍流逝；不過近幾年來在歐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之下，短短五年間產生了極端的新思想、頑固的舊思想與在當中的中間思想，形成了思想混亂的時代。而十八世紀以來對於物質文明的讚美，也因為戰爭的發生而開始受到檢討。包括大亞細亞主義、民族自決主義等等，根本上都是被支配者對於支配者所進行的解放運動。

所以陳逢源認為：所謂的文化主義是人格解造運動的基礎與社會改造的原理。但是，他同時也意識到，近年來文化已經在當時的台灣成為一種流行語，如文化運動、文化政策、文化村等等。因此，他回歸文化一詞的語源，從德文與英文來思考文化的兩種意涵，即包括德語(クルツール)中所指涉的精神的、地方的；以及英語(シヴイリゼーション)所認為的物質的、世界的。在陳逢源的認知當中，精神文明(文化)與物質文明(文明)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對立。但是另一方面，他其實也意識到有關文明或文化的界定，本身也存在著因為立場、方法上的不同而形成的差異與落差，主要來自於將文化作為與自然相互對立的這個角度出發。於是，陳逢源的文化主義主要還是以真善美為目標，提倡人格自由的文化主義；並且將文化主義定位為以新康德主義(新理想主義)為基礎的批判哲學。

有趣的地方在於：陳逢源一方面承認自己對於康德的學說瞭解有限，卻又在文章中將康德的思想作為自己論述的學說根據；另外，陳逢源也以為文化主義終究還是要從經濟的角度來思考有關生存權的問題。所以他對於砂糖原料採集區制

<sup>316</sup> 〈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殖民政策〉，《台灣》第4年1月號第1號。台灣雜誌社，《台灣》(台北：東方出版社復刻，1973)，頁18-33。

度、保甲制度、匪徒刑罰令與同化政策等殖民地統治政策，也都有強烈的批判。不過，從文章最後陳逢源提到的桑木博士、左右田博士、牧野博士等日籍學者可以看出，當時台灣印刷媒體世代在知識創見之外，仍然存在著對於西洋文明、乃至於日本學界的依賴。同時，從文章中將文化主義與殖民地統治政策的批評加以結合的情況，也可以看出是時台灣印刷媒體世代在論述上的「入世」傾向<sup>317</sup>。換言之，即所謂文化或文明的討論，終究還是直指殖民地統治差別待遇的問題核心。

這種文化論述與政治意見結合的情況，其實早在陳逢源幾篇諸如〈台南公園の池畔に立ちて〉或〈目的與手段〉的文章中就已經露出端倪，至於那篇發表於1923年7月名為〈文化の普及と創造〉的文章，事實上則根本就是陳逢源參與台灣文化協會講演會時所使用的講演稿。陳逢源在文章當中將文化定位為因為各地方不同狀態、氣候與人種所形成的特色，並且透過對於西方文化發展史的爬梳，將當代社會的主要問題進一步地定位為因為受到布爾喬亞文化、民族文化、男性文化影響下，所形成的階級問題、民族問題、兩性問題。又，陳逢源也透過自己到上野公園參觀法國現代美術品展覽會的經驗，論及文化普及與文化向上這兩項議題；最後才將文化的活力與自治能力畫上等號，強調自治能力是國民文化創造力能否發揮的具體成果；將台灣文化的提升與自治能力的養成以為是互為因果的邏輯關係<sup>318</sup>。

是故，陳逢源的文明、文化論述終究還是將總督府殖民地統治政策作為其批評的主要核心。必須注意的地方在於：這些所謂的文明、文化論述一方面填補了文化抗日運動本身的思想內涵，跳脫過去武裝抗日運動在思想上的貧乏狀態；另一方面，文明、文化論述也讓當時台灣人的文化抗日運動呈現出較為溫和、理性的中性色彩，不致於貿然觸碰到總督府的忍耐底線。如此既為表裡的文明、文化論述一方面體現了當時東亞知識流通的歷史情境；同時，如果另外考量到印刷媒體對於形塑集體意識上的功能，那麼印刷媒體世代其實也是透過這些文化、文明論述的印刷與傳播，創造他們與其他台灣人擁有共同歷史、有著相同理想與當前必須對抗的目標等相關情境。一定程度上，便已經顯示出當時印刷媒體世代成員已然擁有與清帝國讀書人口不同的同時性與現實性特徵。

### 三、友聯主義與「文明差序」論

陳逢源於台灣民報系刊物所發表的諸多議論當中，友聯主義是一個值得被特別提出來討論的子題。友聯主義事實上並非當時台灣文化抗日運動的主流論述，除了陳逢源外罕見於其他台灣人的論述當中。但是，友聯主義的提出其實代表著台灣印刷媒體世代在1920年代終於成立屬於自己的印刷媒體之後，不再像過去只是透過閱讀印刷媒體吸收現代啟蒙論述的被動狀態，而是更進一步地建立屬於

<sup>317</sup> 〈人生批判原理としての文化主義〉，收錄於《台灣》第4年2月號第2號。台灣雜誌社，《台灣》（台北：東方出版社復刻，1973），頁40-46。

<sup>318</sup> 〈文化の普及と創造〉，收錄於《台灣》第4年7月號第7號。台灣雜誌社，《台灣》（台北：東方出版社復刻，1973），頁34-38。

自己的「學說」，爭取論述方面的主動權。另一方面，也似乎是試圖與日本學人在論述方面一較長短<sup>319</sup>。

謝國興指出：陳逢源所提出的友聯主義係為對 **federalism** 的翻譯，一般翻譯成聯邦主義或邦聯主義<sup>320</sup>。黃頌顯則評價：「此飛躍性的創見，意味著陳逢源對於政治體制宏觀的見解<sup>321</sup>。」陳逢源提出的友聯主義首見於 1923 年 1 月《台灣》雜誌〈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殖民政策〉一文，陳逢源以為：日本土地狹小但人口膨脹的實際情況，再加上美國、加拿大、澳洲三國開始拒絕日本移民，成為日本發展時所面對到的主要問題。是故，他提出了友聯主義，即希望日本負起擔任亞細亞主義指導主的使命來帶領亞細亞各國，並將第一次世界大戰才剛剛結束不久的當時視為是大好的時機<sup>322</sup>。然而，即便如此陳逢源還是意識到日本本身國力上的不足，以及亞細亞各國對於日本的不信任等等；所以在這篇文章的後續當中，陳逢源便提及了：日本對於殖民地朝鮮與台灣的統治，其實也是日本能否讓中國或亞細亞各國投以信任的指標所在，更進一步地去表達他個人反對同化政策的立場。

在〈植民政策として友聯主義〉這篇文章當中，陳逢源對於何謂友聯主義有著更為深入的看法。本文一開始就針對著《台政新報》負責人柴田廉於《台灣同化策論》中所表達的意見進行批判，首先便將同化主義斥為是無權威的老古董；再利用內地日本籍學者對於殖民地統治的論述來批判台灣總督府的殖民政策。他提到：所謂的民族意識、自覺與自決的精神不但隨著教育與時代精神的影響，在國際上所呈現的波蘭、印度、菲律賓等國在自治、自決上的要求，其實也是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是時代進化的必然性產物。陳逢源便是透過此「必然性」為依據，批判柴田廉在台灣同化政策上的意見，認為其所謂日本(母國人)和新附民(台灣人)從政治到經濟到文化上的互通的大目標，雖然是相當理想的解釋；卻相對地忽略了，同化政策本身明顯地帶有強制、專制的色彩，更是少數優秀民族(征服民族)對於劣等民族(被征服民族)的無理徵用。所以，陳逢源以為如果想要達到柴田廉所強調的「親善的境地」，則絕對不是所謂的「同化」，而應該是所謂「共存共榮」的基調。並進而提出所謂同化政策其實便是無視個人自由的專制主義，而自治主義，便是尊重個性的友聯主義的對立架構。

我們想知道的，並不是對於同化政策的批判，也不是提倡溫情的同化論。最終想表達的是以尊重人格個性為基礎，應當共存共榮的友聯主義

<sup>319</sup> 好比說，陳逢源於〈讀東鄉博士的《殖民政策與民族心理》的感想〉一文中便同時批判親總督府的柴田廉，以及親殖民地人民的山本美越乃的意見。

<sup>320</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116。

<sup>321</sup> 黃頌顯編，《陳逢源選集》，頁 9。

<sup>322</sup> 〈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殖民政策〉，收錄於《台灣》第 4 年 1 月號第 1 號。台灣雜誌社，《台灣》(台北：東方出版社復刻，1973)，頁 24。

federalism 的理論與實際。國民會因各地風俗習慣傳統語言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從消費面來看，卓越發展具國際性的貿易商品、科學工藝全部都已經普遍同一化了。這樣的情形是稱為混合、歸一而不是同化。我們不認為，日本文化對於異民族強破同化的行為是了不起的事情。文化不是同化，而是創造才對。<sup>323</sup>

陳逢源這段陳述可說是將友聯主義的精神內涵展露無遺，而陳逢源將柴田的意見上溯至心理學，再將自己的意見視為是承接黑格爾、康德的看法，事實上也讓他與柴田廉之間由單純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爭辯，提升成知識系譜上的競爭。事實上，在陳逢源提出友聯主義的當下其實已經接受了日本對於台灣的政治所有權。更細緻地來看，則是企圖在日本統治初期武裝反抗持續不斷的「敵我關係」逐漸轉變為「他我關係」的當下，更進一步地去堅持「差別」而拒絕「同一」。

不能忽略的是，陳逢源個人在 1910 年代其實是參與過同化會的。因此，友聯主義所代表的不單單只是陳逢源個人在思想方面的進步，其實也是當時台灣人政治理想普遍進展的一個側面，更反映出文化抗日運動本身的曖昧特質。一方面，文化抗日運動本身是追求自立、自主的，但在政治的現實上又不能最激進的訴求於脫離日本帝國統治。另一方面，文化抗日運動的精神內涵往往是獨立的、自主的，但在知識內涵上又不可能擺脫來自西洋文明的現代知識，甚至於必須與部份日本籍的學者結合成相同的陣營。因此，也就讓文化抗日運動本身存在著「文明差序」的論點與色彩。好比說，在〈植民政策として友聯主義〉當中，陳逢源便提到台灣知識份子受到世界思想的影響現象。另外，從上述提到陳逢源對於日文雜誌的閱讀與引薦狀況，也可以發現：所謂的「文明差序」一方面體現在知識，即由西洋到日本再到台灣的流通順序；另一方面，也存在於硬體，即台灣民眾往往都是透過日文書籍才能夠接受西洋文明的這個現實，形成了彼此相互混雜的曖昧情況。

1926 年陳逢源於《台灣民報》中連載了翻譯自羅素的文章〈自由思想與公開宣傳〉，是其少數的翻譯作品。當中有趣的地方在於陳逢源一方面不見得贊同文章中的全部意見，另一方面其實也未必能夠完全地掌握這篇文章的要旨，甚至自承「老實不少有錯誤的地方<sup>324</sup>」。便可以讓我們意識到：是時台灣文化抗日運動份子在現代文明知識與啟蒙過程中的貢獻與侷限之所在。而友聯主義的特徵，其實也反映在台灣人士在接受現代文明時對殖民國的一定依賴，以及其在抗日立場上所不得不採取的折衷訴求。總而言之，友聯主義事實上便提醒我們在所謂文化抗日運動的這個階段，未必然可以採用截然二分的對立觀點，而更應該關注台

<sup>323</sup> 〈植民政策として友聯主義〉，收錄於《台灣》第 4 年 5 月號第 5 號。台灣雜誌社，《台灣》(台北：東方出版社復刻，1973)，頁 58。

<sup>324</sup> 黃頌顯編，《陳逢源選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頁 110。

灣民眾在思想上的承繼與接受，以及在文化抗日運動中所採取的種種結盟、抵抗與妥協策略。

### 第三節、政治運動與政治論述

#### 一、政治運動與「治警事件」

陳逢源的文化啟蒙論述與他自 1920 年代起熱衷於政治運動有著必然關係。伴隨印刷媒體所能形成的集體共識(同時性)，印刷媒體世代也就進一步透過印刷媒體形塑其世代成員對於現實社會的感知與回饋(現實感)。於是，就在所謂分立、結盟，甚至於對抗的競合關係當中，印刷媒體世代在他們各自的印刷媒體中彼此競逐，進而改變清帝國統治時期以降台灣社會官紳共治的不公平現象。

陳逢源的政治參與經驗體現台灣民眾於 1920 年代成功結合「同人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三者作為其進行反抗運動時的能量來源。換言之，當台灣文化抗日運動興起之際，所採取的便是與過去不同的將原來的敵我關係，轉變成較為溫和的他我關係立場。換言之，如何在論述中創造形塑我族、對抗他群的效果，也就成為了台灣民報系刊物在整個文化抗日運動陣營中的功能所在。葉榮鐘指出：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報》、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不僅是台灣非武力抗日運動的共同主力，同時台灣民報還肩負「台灣人的喉舌」的功能，是重要的宣傳工具<sup>325</sup>。陳逢源的政治參與一方面體現在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組織活動，但其思想內涵則呈現在台灣民報系的刊物。又，不單單只是著作、甚至於其參與文化協會所舉辦的講演會的演講內容，也都部份地刊載於台灣民報系刊物，也就讓他當時的記者身份更具備著所謂「大記者」的特質。

當時參與台灣文化抗日運動的核心人物大多在經濟層面上佔據較為優沃的位置，因此也較其他台灣民眾更具備著轉換生涯跑道、身兼數職的資源與機會。陳逢源一方面投資台灣民報社作為股東，同時也擔任台灣民報社的經濟記者，1927 年大東信託成立，陳逢源自台南北上台中擔任調查課長。根據謝國興的研究，這段期間內陳逢源主要的工作乃包括大東信託的業務、為台灣民報撰寫經濟時評、參與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籌組與台中地區各社團活動等等<sup>326</sup>。然而，陳逢源自 1923 年擔任第三回請願代表後便持續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直到 1934 年運動終止之際仍持續在團體當中，可以得知在這段期間其仍持續參與台灣的政治與社會運動。即便台灣文化協會從成立到後來分裂成新舊文協，再轉變為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諸多變化，都沒有脫退。

1920 年代陳逢源等人因為職業身份及其學歷之間的不必然關係，從而透過人際網絡與政治立場一邊參與台灣文化抗日運動，一邊擔任《台灣民報》的記者。

<sup>325</sup>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頁 611。

<sup>326</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194。



因此不論在言論或行動上便都同樣表現出挑戰總督府殖民統治的積極企圖。透過上述文化啟蒙方面的文章可以得知，陳逢源當時的政治立場主要站在反對殖民統治的同化政策，同時也利用文化講演等群眾活動來擴大宣傳效果<sup>327</sup>。而他作為文化抗日運動成員的身份，更是在他 1923 年 2 月 16 日於台南自宅遭到台南州警務部長能澤外茂吉拘捕後，才進一步地鞏固與確定。

是時，陳逢源於當年 10 月下旬起持續在由文協所主辦的通俗學術講座，自 11 月 6 日起每週 2、5 講經濟學，原本預定講到年底。此次逮捕經檢察官來提訊，陳逢源才知道自己因為參與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組織活動而遭到逮捕，並且於 12 月 22 日被移送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局，押入台北監獄<sup>328</sup>。此次入獄到保釋共歷經 54 天，而後來發生於 1924 年 7 月 25 日的法庭審判，則是讓陳逢源一躍成為全島性知名人物的主要關鍵。

周婉窈認為：「此案就法理而言，被控諸人的罪名是否能夠成立，端視被告等人究竟有無違反治安警察法第八條第二項的禁止命令之情事。...本案政治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同化主義是否為日本統治台灣確定不變的方針。...在二審的審判過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關於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是否違憲的辯論。<sup>329</sup>」《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16 號中詳細刊登了第一審的審判過程，包括三好檢察長、渡邊暢、若井孝太郎、葉清耀等辯護律師，以及被告蔡培火、林幼春、林呈祿、陳逢源、蔣渭水等人的陳述。

陳逢源認為：殖民政策採取的是民族的優越感，忽略文化本身存在共同性與特殊性這兩種不同的特質，是不可以被強制的東西。再者是，同化主義在日本本地也非全部國民所贊成的政策，如內地殖民學者山本、永井等人所抱持的都是非同化主義的學說。所以，陳逢源主張共存共榮的友聯主義，即超越民族的世界主義，以及在謀求促進台灣人文化的前提之下，予以台灣人自治權。另外，陳逢源更以經濟的角度來立論，主張田健次郎的治台方針乃是使台灣作為被榨取的殖民地，進而導致了台灣內台人的不融合狀態。同時也彰顯了當時親總督府媒體在報導此次事件的不公平現象，可以說，是再一次地透過此次陳述，重覆了他之前在台灣民報系刊物中所提倡的論調<sup>330</sup>。

審判的最終結果判定陳逢源等人需入獄三個月不等，可以說成功地警告了當時方興未艾的文化抗日運動。但是，透過陳逢源與其他入獄人士出獄時的轟動場面，以及台灣文化抗日運動反而為之氣勢大振的情況<sup>331</sup>，可以得知《台灣民報》

<sup>327</sup> 〈文化の普及と創造〉，收錄於《台灣》第 4 年 7 月號第 7 號。台灣雜誌社，《台灣》(台北：東方出版社復刻，1973)。

<sup>328</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143-145。

<sup>329</sup>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 84-86。

<sup>330</sup> 台灣雜誌社，《台灣民報》第 2 卷第 16 期(台北：東方出版社復刻，1973)，頁 16。

<sup>331</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158。

當時在對於台灣本島與日本內地所達成的宣傳效果<sup>332</sup>。也就是說，台灣文化抗日運動因為印刷媒體的宣傳協力而更加擴大了台灣文化抗日運動的群眾基礎，自此鬆動了台灣本來存在的官紳共治結構，提高了一般庶民百姓對於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也因為台灣民報系報刊持續經營至 1944 年才被總督府合併為《台灣新報》，所以透過《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的內容，也可以探究台灣文化抗日運動後來之所以分裂、瓦解的主要原因；以及陳逢源在之中所扮演的身份與角色。以下，本論文便透過陳逢源兩次分別與許乃昌、蔣渭水發生的爭論，討論台灣文化抗日運動的分裂，以及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成員在意識型態的差異之外，共同尋求大眾支持的目的與特徵。

## 二、陳逢源與許乃昌的〈中國改造論〉論爭

這場論爭始於 1926 年陳逢源的一篇文章〈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其實也與當時文化協會內部意見逐漸產生分歧有著直接的關係。事實上，1920 年代末期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與後來台灣人印刷媒體的蓬勃發展，都與 1927 年文化協會分裂時的左右路線之爭有著極大的關連。這不僅僅來自於每個歷史人物的政治選擇，同時也涉及到個人生命經歷、知識來源與考量層面等不同因素的交集共構。也就是說，不論是 1927 年文協的分裂或 1929 年文協的再分裂，絕對不僅僅只是部分人士彼此結盟並與其他人決裂的非理性行動，而是存在其社會環境上的實際因素，有它不得不發生的歷史成因。

表面上參與「中國改造論」的主要成員只有兩位，實際上卻代表了台灣社會兩大路線與陣營以及其背後所代表的不同觀點<sup>333</sup>。不過，除此之外不能忽略的是陳逢源與許乃昌兩人不同的「中國經驗」以及其在教育背景上的差異，也是這場論戰之所以爆發的主要原因。陳逢源於「中國改造論」論戰發生前只在 1922 年經日本轉往中國旅行，主要的目的則是找尋發展事業的機會；許乃昌則是往返於東京與中國上海間，更曾經到莫斯科的孫逸仙大學就讀。於是，倘若我們再關注於陳逢源畢業於國語學校，而許乃昌則大多於海外求學的差異點，則除了「左(許乃昌)」與「右(陳逢源)」的這點差別之外，其實更意味著「外地(許乃昌)」與「本島(陳逢源)」的內外不同。

陳逢源的意見主要來自於田崎博士的〈支那改造論〉，論述內容則主要建立在中國的社會組織仍然停留在封建制度，所以在面對到帝國主義侵略的影響時，必須選擇效法日本或者是俄國的道路。也就是說，一者是如日本先往資本主義邁進，二者便是如俄國一般地成為共產主義國家。陳逢源認為中國與俄國不論在所處的地位、環境，以及國民性等等都有所不同，所以不能步她的後塵。一來中國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過於嚴重；二是中國的國土易受侵略，即使採取共產主義也

<sup>332</sup>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 87-88

<sup>333</sup> 陳芳明在這篇文章中對於陳逢源與許乃昌的論戰背景、內容與歷史意義作了相當詳細的說明。陳芳明，〈「中國改造論」：論戰與 20 年代台灣左翼思想的傳播〉，《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延續與斷裂》(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2005)，頁 184。

無法抵抗列強的武力壓迫。因此，陳逢源認為中國應該先讓商工階級有所發展，以進而壓倒軍閥的割據勢力。在這樣子的認識下，陳逢源認為獎勵股份公司的成立是有所必要的，也就是說，便是以為中國必須往資本主義的方向前進<sup>334</sup>。

上述的內容顯示：陳逢源與許乃昌之間的最大爭執點，在於中國社會究竟應該要「姓社」還是「姓資」？不過，有趣的地方在於陳逢源與許乃昌的意見其實就內涵上未必有很大的差別，只是方法與手段的優先次序不同而已。陳逢源認為要以發展資本主義的方式來與帝國主義對抗，許乃昌則認為應該先打倒軍閥、從根本的去反對帝國主義。但是發展資本主義與打倒軍閥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衝突，好比說，國民政府在北伐成功後所積極推動的，不也正是以扶持民族資本為主的經濟建設、所謂的「黃金十年」。

除了直接地將兩人的文字放在彼此交會、交織、交戰的情境，從另一個角度將陳逢源與許乃昌的話語各自置放在「台灣」的脈絡，便是在比較所謂「正確」與否的論述外，直接探究其言論「可行性」的一種途徑<sup>335</sup>。許乃昌對於中國的觀察固然具備現實基礎與更高的準確性，但也因為馬克思主義與共產國際的理論限制，終究使他毅然決然地相信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可以聯合起來，不受任何其他的因素阻礙。是故，當許乃昌嘲弄陳逢源只會使用抄襲而來的數據、沒有從事實際的研究之際<sup>336</sup>，卻忘了審視自己的論述，終究只是對於「中國」場域的親身體驗，未必可以被挪移、運用在「台灣」現場。許乃昌的意見遺忘台灣本身處在殖民地統治下的殖民社會，與中國半殖民地的社會現況有著極大的差異，未必具備強大的反抗動能。反之，陳逢源的論述在以「台灣」取代「中國」的語境底下，則仍然具備著相當的可行性。

陳逢源意識到的「右之不行，左又何能」，實際上顯示的是台灣社會自 1905 年以降武裝抗日行動終結以後，逐漸由原本「敵我型」的衝突移轉至「對手型」、「合作型」的具體認知。1927 年，台灣文化協會在中國改造論論爭之後正式分裂，並因此產生了舊文協/《台灣民報》與新文協/《台灣大眾時報》的分立關係，其實也等同於 1926 年時陳逢源與許乃昌論述的延長戰線。黃頌顯認為：此次論戰代表台灣人民希望中國富強的期待與在中國百姓們別無二致的<sup>337</sup>。陳芳明則在爬梳連溫卿的文章時，證明了兩人其實是透過「中國」來影射「台灣」，頗有指桑罵槐之意<sup>338</sup>。

陳逢源與許乃昌論戰中的發言代表不同的改革訴求與革命傾向，其實也是當

<sup>334</sup> 黃頌顯編，《陳逢源選集》，頁 118。

<sup>335</sup> 陳芳明，〈「中國改造論」：論戰與 20 年代台灣左翼思想的傳播〉，《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延續與斷裂》，頁 195。

<sup>336</sup> 許乃昌，〈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台灣民報》，第 142、143 號。1927 年 1 月 30 日、2 月 6 日。頁 11-12、頁 11-14。

<sup>337</sup> 黃頌顯編，《陳逢源選集》，頁 20。

<sup>338</sup> 陳芳明，〈「中國改造論」：論戰與 20 年代台灣左翼思想的傳播〉，《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延續與斷裂》，頁 195。

時台灣社會存在的兩道思想潮流。不過如果以印刷媒體本身所具備的宣傳功能，兩人的論爭事實上更是潮流本身，是激化思想分野、讓台灣民眾對於這兩種不同政治選擇在意識上更加深化的一個要因。換言之，台灣文化抗日運動聯合陣線的鬆動與印刷媒體世代彼此衝突矛盾有著一定的關連，甚至於在印刷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終至不可挽回的地步。

### 三、陳逢源與蔣渭水的「左右」論爭

1927年新舊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以後，陳逢源與其他在政治立場上較為右傾的台灣人士(如蔡培火、蔣渭水等人)共同組織了台灣民眾黨，持續以《台灣民報》作為機關誌。事實上，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直接促成了文化抗日運動的蓬勃發展，1927年與1928年是台灣文化抗日運動的勃興期。1927年出現的運動團體共有54個，1928年則有26個<sup>339</sup>，其中更配合《台灣大眾時報》、《伍人報》、《洪水報》等印刷媒體刊物的普遍刊行，讓台灣的文化抗日運動進入了氣象一新的另一個階段。然而，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不應該單純地視其為新舊文協、左右立場的分道揚鑣，存在於新舊文協中的其實包括了以連溫卿為代表的左翼青年與以蔡培火為主的人道主義、啟蒙運動的支持者(右派)，還有立於兩者中間標榜全民運動的蔣渭水一派。

所以1927年文化協會的分裂乍看雖然成為了左、右兩翼的不同陣營，但是台灣民眾黨當中卻隱藏著蔣渭水與蔡培火兩條不同的路線。簡炯仁認為：「民眾黨於成立之初，面對著敵對的新文化協會，為顧及黨內勢力分散之危險，兩派之對立尚不敢公然將彼此之衝突趨於尖銳化，加上此時林獻堂的權威和人望，尚能維持民眾黨表面的和諧；可是，黨內這種妥協的態度，無異助長了蔣派的氣勢，使之更趨妥協，相反地，卻造成蔡派態度轉為消極。<sup>340</sup>」於是，台灣民眾黨終在彭華英於第二次黨員大會後辭職而迅速左傾，並且藉由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跨黨事件清除蔡培火人馬(陳逢源、洪元煌等16名跨黨份子)之後，更進一步修改黨綱，終至1931年二月十八日於台北召開第4、5次黨員大會時遭到解散<sup>341</sup>。透過陳逢源與蔣渭水於1931年進行的「左右論爭」，可能有助於瞭解：究竟台灣民眾黨自組成之際的兩種不同路線是如何地終至發展成水火不容的境地；同時，也因為台灣民眾黨於分裂不久後就遭到解散，台灣文化抗日運動也從本來的成長期轉為衰老期，終至一蹶不振。「左右論爭」是否呈現出這個歷史發展的根本緣由，也就成為本文在此企圖探索的面向。

謝國興指出，蔣渭水於陳逢源與許乃昌論戰之際發表的諸多言論，可視為是社會上穩健智識階層的想法，同時也與陳逢源文章中的意見頗有呼應之處<sup>342</sup>。不過本來在政治立場上與陳逢源較接近的蔣渭水，何以在後來產生落差，甚至進而

<sup>339</sup> 簡炯仁，《台灣民眾黨》，頁36。

<sup>340</sup> 簡炯仁，《台灣民眾黨》，頁176。

<sup>341</sup> 簡炯仁，《台灣民眾黨》，頁212。

<sup>342</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172-174。

決裂，在報紙上彼此攻訐？事實上，文化協會在分裂之後，新文協透故其機關誌《台灣大眾時報》對舊文協等人多有批評，再加上國民黨後來的清黨分共，讓蔣渭水一時之間成為了批判左派的健將；但是，台灣民眾黨本身自成立以來就並存著的左右兩條路線，終究還是促使其選擇了與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一般的「統一戰線」策略至 1930 年台灣自治聯盟正式成立後衝突瓦解<sup>343</sup>。普遍認為：台灣民眾黨在蔣渭水的領導下逐漸左傾，終至不能見容於立場較為保守的蔡培火等人，加上工友總聯盟成立之後的迅速壯大，更讓蔣渭水對台灣民眾黨創立之初的民族運動路線產生動搖，傾向以階級鬥爭為主的運動路線<sup>344</sup>。

1931 年陳逢源利用克良與蔣渭水進行爭論之際加入筆戰，是時正是陳逢源等於 1930 年遭民眾黨開除黨籍、台灣民眾黨亦於 1931 年遭到總督府禁止不久。原本克良於〈吾人的看法〉文中，主要就台灣民眾黨遭到總督府禁止後，是否另組新政黨一事提出質疑，認為拒絕組織新政黨的決議，可能影響到舊民眾黨的歷史與其既往存在的價值。同時，也以「民眾」為由，認為政治運動的領導者應該順應民眾的訴求，而不是玩弄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話語<sup>345</sup>。克良的這篇文章隨即於下一期的《台灣新民報》中得到蔣渭水的回應。蔣渭水於〈對民眾黨禁止後的短評的短評〉提出，由於受到客觀局勢轉變的影響，當前的決定並不會影響到民眾黨過去的歷史和其存在的價值。另外並提出民眾指導者與民眾在從事解放運動時的不同，以為前者是以戰略戰術、後者是以常識來判斷解放運動的手段<sup>346</sup>。自此以降，克良與蔣渭水在另外的文章中便針對時空環境的變化究竟為何？對於馬克思主義、孫文思想的瞭解是否正確？理論與台灣的政治現實環境是否吻合等彼此交鋒。

陳逢源在克良與蔣渭水已數度交手後，才在 1931 年 4 月 4 日以〈討究渭水君的理論的重大矛盾〉一文加入戰局。文章的主要內容是批評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從一開始的孫文主義轉變為馬列主義意識型態；同時批評蔣渭水認為「三民主義可以發展到馬列主義」的說法為不透徹的理論，並且認為孫文的思想應該屬於觀念論，位於與馬列主義唯物論相互排擠、矛盾的對立面<sup>347</sup>。蔣渭水則於〈「御都合主義」是資本主義代辯人的專賣品〉一文中，透過孫文的生平及其在〈民生主義〉中的言論片段，以及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善意態度等等進行反駁。後續，三人則又分別發表了〈台灣今後的解放運動若是單純的襲用理論恐無補於實際〉<sup>348</sup>、〈御用學者的妄論〉<sup>349</sup>、〈哈哈！蔣家店的理論已宣告破產了〉<sup>350</sup>、〈形式與

<sup>343</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177-179。

<sup>344</sup> 簡炯仁，《台灣民眾黨》，頁 170。

<sup>345</sup> 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上)》(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8)，頁 315-317。

<sup>346</sup> 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上)》，頁 311。

<sup>347</sup> 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上)》，頁 345-347。

<sup>348</sup> 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上)》，頁 341-344。

<sup>349</sup> 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上)》，頁 348-352。

<sup>350</sup> 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上)》，頁 353-356。

實質請不可看錯罷) <sup>351</sup>等文章。

此次論戰不知什麼緣故而中止，而蔣渭水也於是年 8 月 5 日因為傷寒驟逝。雙方彼此即便有所交集卻又終究沒有結果的情況，其實等同於延續了台灣民眾黨的對立氣氛。透過文章中諸如「資本主義陣營中的勇士」、「發見他的理論果然與築在沙上的樓閣上一樣」、「我希望南都生君，撥些割股票和享樂的工夫，力攻孫文全集，庶免立論證據薄弱陷入武斷妄論的毛病，或者是你有意矯揉造作，故意歪曲以彌補你的反動思想」等情緒用語，以及相互指稱對方為「御都合主義」(機會主義)的情況中可以看出，雖然本次論戰是由克良揭開序幕，事實上卻是之前被歸類於蔡培火派、因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而被民眾黨開除的陳逢源與蔣渭水之間的短兵相接。

除了政治意見的表述外，此次論戰還顯現出以往少見的、對於一般庶民大眾的關注，以及對於知識來源正確性的重視。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重要特色，在於自為世代透過印刷媒體產生影響力時，不再如以往「官紳共治」一般地無視庶民大眾的存在，相反地，「大眾」在論戰中成為雙方的焦點，並且對大眾與運動領導階層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詳細的討論。這種情況當然與社會運動需要一般大眾的支持有關，而包括陳逢源等人發表在《台灣新民報》等媒體刊物的相關政治意見，其實便也是他們各自爭取、鞏固群眾基礎的手段工具。

此次論戰另一方面顯示出印刷媒體世代在論戰之際，不再只是發表個人意見或感想的片面之詞。相反地，論戰雙方不但同樣搬出自己論述背後的知識來源，尤有甚者，諸如馬列主義等當時普遍流行的理論學說，更是他們彼此攻訐、否定對方意見的最好切入點。好比說，蔣渭水便大量引用了高資基、馬克斯、列寧的著作來回應克良的質疑；而克良同樣引用其個人對於露西亞社會民主勞動黨之所以於 1907 年聽從列寧的意見，進而參與更壞的義三國會的相關知識回應。另外，在陳逢源引用戴季陶的著作，並以康德的學說為後盾的同時，蔣渭水也援引《三民主義》以及吳稚暉、胡漢民、汪精衛的說法來予以反駁。換言之，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論爭其實往往成為了「諸神的戰場」。世代成員們各自援引知識上的救兵，或者是直接質疑對方擁抱的知識系譜是否正確<sup>352</sup>？也就是說，論戰不僅僅透過當前的印刷媒體刊物而達到了傳播的功能，同時也對應了那些被援引的知識系統，那些作者們過去閱讀過的印刷媒體刊物。

這場發生於 1931 年、沒有結論的論戰其實也意味著：台灣印刷媒體世代本來透過「同人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凝聚動能、對抗總督府殖民體制的策略方針，在意識型態分裂、組織分立內耗的狀態下，終究導致了文化抗日運動的空前挫敗。1931 年台灣民眾黨遭到解散之後，本來抱持著「解消論」的蔣渭水

<sup>351</sup> 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上)》，頁 356-358。

<sup>352</sup> 像蔣渭水便於〈御用學者的妄論〉一文的最後，直接提出「最後我希望克良君將你所說的世界史，日露戰史等的著者書名及其你所根據的語句引出來給我看看吧。」的質疑，相當明顯地便是在質疑克良在資料引用上的正確性。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上)》，頁 352。

等人在蔣渭水於 8 月突然過世後便各自離散。相對的，則是《台灣新民報》於 1932 年 1 月 9 日獲得發行日刊許可，且於該年 4 月 15 日開始發行之後，逐漸地與政治組織、政治運動脫離直接的關係，轉而成為了以大眾化新聞為訴求的印刷媒體刊物<sup>353</sup>。

根據楊肇嘉的回憶錄指出，陳逢源於《台灣新民報》中擔任論說委員與經濟部長<sup>354</sup>。謝國興也指出：「1931 年 2 月，台灣民眾黨因明顯左傾，被台北警署勒令解散，而陳逢源早在民眾黨組成之時(1927 年)，已形同退出政治活動了。<sup>355</sup>」所以陳逢源後來任職於《台灣新民報》時，所具備的身份便不再如《台灣民報》時期一般地具備著大記者的身份，而是小記者的職業、專業色彩。在下一節的篇幅中，本論文將透過陳逢源的記者身份與經濟論著，企圖證明在「同人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的結構瓦解之際，台灣人印刷媒體世代所擁有的反抗動能隨之解消，開始受到總督府政策若有似無的影響。尤其在 1937 年日華戰爭展開以後，更是明顯地演變為台灣人在戰爭期中的矛盾與搖擺。

#### 第四節、記者身份的回歸及其經濟論述的轉向

##### 一、「小記者」身份的回歸

1932 年 4 月 15 日《台灣新民報》正式發行日刊，取得了與日資報刊競爭的相等地位。陳逢源在口述訪談記錄中指出：「因台灣民報之言論比較激烈，所以伏字很多，改為『日刊台灣新民報』時，則言論比較穩和，但還是另眼看待。<sup>356</sup>」台灣新民報社以羅萬俔出任社長，總社設於台北市，並於上海、廈門、東京、大阪、台中等海內外設有 13 處分社。在短暫任職於大東信托又因故離職以後，陳逢源在楊肇嘉大力支持下於 1932 年台灣新民報社第一屆董監事任滿改選，進入《台灣新民報》編輯局擔任經濟部長，從此歷經《台灣新民報》更名為《興南新聞》、太平洋戰爭等都沒有改變<sup>357</sup>。

《台灣新民報》雖然是《台灣民報》擴大經營下的具體成果，但是其在成員組成上便透露出較為穩健的保守色彩。陳逢源認為《台灣新民報》在編輯方面網羅了台灣議會派的中心人物，包括編輯長林呈祿、政治部長吳三連、社會部長黃呈聰、整理部長黃周、經濟部長陳逢源等人<sup>358</sup>。而陳逢源也由過去身兼數職、積極參與政治運動的「大記者」，重新回歸到以專業為導向的「小記者」身份。

<sup>353</sup>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2004)，頁 219-220。

<sup>354</sup>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 434。

<sup>355</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111。

<sup>356</sup> 〈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 141。

<sup>357</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190-206。

<sup>358</sup> 〈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 153。

台灣新民報有經濟版一頁，經濟部之稿件均集中於本人，加以刪改，編輯並註標題。凡有經濟評論，社論等均由余執筆。社論係由各部長及主筆輪流撰述，所以四、五天就要寫一篇，緊急時則要隨時撰寫，那時除負責編輯經濟版、撰社論、專論外，並要到台灣總督府、各銀行及民間採訪，日程為上午採訪，下午寫稿，改稿，到下午七時纔製版完竣，嗣後看排版之稿樣再予修改，每天晚上都到七時以後纔吃飯。<sup>359</sup>

稿量需求的大幅度增加，是《台灣民報》轉變為《台灣新民報》之後所首要克服的難題。透過日本報刊資本的協力，台灣新民報社在組織規模的擴大、人員職業化與工作專業化等方面都有著長足的進步，也讓《台灣新民報》在成立之際便迅速地步入軌道。陳逢源指出，任職於台灣新民報社時期每日忙於取材編輯，為一生最緊張的一段時期。除此之外，因為當時台灣人擔任新聞社部長的社會地位相對較高，所以陳逢源除了在《台灣新民報》與後來的《興南新聞》發表議論之外，也經常接到日本雜誌與《台灣時報》的邀稿，日本統治末期更出版了諸如《新台灣經濟論》、《新支那素描》、《兩窗墨滴》、《台灣經濟與農業問題》等諸多遊記、經濟時論、小品集等著作<sup>360</sup>，都是他在擔任記者這項職業時的斬獲。

然而本論文之所以使用「回歸」一詞形容陳逢源自 1932 年起的記者生涯，主因在於這種記者身份其實早在日本統治初期時便已然存在。換言之，正因為《台灣青年》、《台灣》都只是按月發行的雜誌，《台灣民報》即便有報紙之名，發行週期也是自半月刊、旬刊、週刊的過程逐漸縮短。所以陳逢源等台灣人士即便早在 1920 年代便開始以「記者」自稱，但與諸如謝雪漁、魏清德等單純任職於《台灣日日新報》文藝欄的記者們，在日常生活與工作內容上便有著極大的不同。《台灣新民報》的出現讓台灣人的印刷資本終於可以與日本資本處在同一個競爭平台，但是在政治立場上的退卻，讓台灣新民報社無法產生如日本報社大記者型的風雲人物，而是如《台灣日日新報》文藝欄的漢文記者一般地往專業化、職業化的方向發展。

由於台灣新民報社失去了與政治運動組織的共同協力，導致在時局逐漸轉趨嚴峻之際，難以堅持其一開始堅持的意識型態立場。陳逢源自承：「在台灣新民報時代，言論雖無完全自由，但仍有些自由。改稱興南新聞後則新聞自由已打折扣。到最後合併為台灣新報時則言論也統制完全無自由，只有報導。<sup>361</sup>」是故，陳逢源於《台灣新民報》時期所發表的經濟著作是否體現出如此的歷史情境，與其在《台灣》、《台灣民報》時所發表的著述又有什麼樣的不同，便是本論文在底

<sup>359</sup> 〈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 154。

<sup>360</sup> 〈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 125。

<sup>361</sup> 〈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 156。



下企圖討論的重點。

謝國興認為陳逢源的經濟論述內容豐富，所涉及到的議題也相當全面，大體來說，具備著如下所述的四種特色：

第一，前期(1920年代至1930年代前期)的論述火力較強，對政策、施政的批評十分尖銳。後期因環境影響，不得不有所克制。第二，善於利用長期統計資料作分析的依據，對問題的根由常從其歷史淵源論起，故論述往往具有經濟史的性質。第三，其論述內容經常將台灣與日本內地比較，對於今日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經濟史，仍具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第四，其財經論述除了針貶時局與政策外，通常帶有抗議日本殖民統治的經濟榨取，以及為台灣人爭權益的目的，早期言論自由時期尤其明顯。<sup>362</sup>

由此可知，陳逢源的經濟論述應該與寫作當時殖民地統治的時空環境有著明顯的互動關係。這個從大記者往小記者、從基進到穩健的論述轉變過程，事實上也體現了台灣印刷媒體世代(自為世代)和總督府殖民統治結構之間的互動關係。以下透過「結構」與「行動」的概念，有助於細緻化以往台灣學研究習慣採取的「殖民 VS. 反殖民」觀點。台灣民報系刊物的出現並不單純對立於總督府的殖民統治政策，相反地，包括陳逢源等參與台灣民報系刊物、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台灣人士都接受過總督府的殖民地現代教育，並且從中取得了對於文明、文化的基本認識。

台灣總督府進行的殖民統治結構並不應該被單純地視為是一個平滑的整體，它在現代文明啟蒙與暴力榨取剝削之間的搖擺，以及其一方面試圖改變殖民地台灣，卻又必須接受傳統社會結構殘留依存之下所形成的權力縫隙，進而讓殖民地人民逐漸地學習到如何透過印刷媒體刊物取得結構能力，並以之與殖民統治結構進行一連串的對立、對話與對抗。也就是說，當台灣民眾成功地結合「同人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產生的極致動能便是在行動與論述上對總督府的殖民統治政策進行挑戰與質疑。這個企圖擺脫殖民統治的動機並非全然無視於當時台灣作為殖民地的現實環境；而原先利用殖民統治結構所訴諸於民族的文化抗日運動則意外地因為轉化能力的作用，而讓台灣民眾間產生了民族與階級立場上的對立、造成文化抗日運動本身的瓦解。

因此，與其說文化抗日運動的解消來自於總督府的查禁；一部分的原因其實也來自於「同人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這個本來用來對抗殖民統治結構的有效工具，意外地回過頭來作用於台灣文化抗日運動一開始所採取的聯合陣線當

<sup>362</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231。

中。好比說，新舊文化協會分裂之後，當舊文協幹部於 1927 年 10 月 1 日的《台灣民報》中發表了〈文化協會脫離聲明書〉，新文協便隨即於 10 月 17 日的全島代表大會中通過「組織台灣民報不買同盟」的決議<sup>363</sup>，並相繼出版《台灣大眾時報》、《新台灣大眾時報》等媒體刊物來與《台灣民報》抗衡。文化抗日運動自 1931 年以後便逐漸衰退，但是《台灣新民報》反而自 1932 年起正式發行日刊，延續了始於 1920 年代的台灣民報系刊物的一線香火。政治立場相對保守穩健的林呈祿、楊肇嘉、陳逢源等人在台灣左翼刊物相繼遭到禁止時，仍持續掌握《台灣新民報》的編輯大權，不僅反映出其在台灣社會中所擁有的經濟優勢；事實上也對應著他們相對保守、較能見容於總督府尺度的言論立場。而陳逢源從原先在《台灣民報》中的大記者特質轉變至《台灣新民報》時期的小記者身份，也不外乎只是這個大時代氛圍中的一個縮影。

## 二、1920 年代的經濟論述：殖民地財政自治論

陳逢源的經濟論述在 1920 年代便具備著明顯的政治經濟學色彩，與當時的政治訴求如台灣地方自治、設置台灣議會等也都有著明顯的連帶關係。1922 年陳逢源應《台灣》雜誌社的「現在台灣經濟界救濟策」徵文，與吳三連、彭永海、陳材洋等一同獲選刊登，自此開啟了他在經濟論述方面的討論。陳逢源《台灣》雜誌時期的經濟論述主要隱藏在政治色彩的文章當中，並且於《台灣民報》時期開始廣泛涉及到台灣東部移民村的發展情況、工業化發展與電力問題等等。

在 1922 年的〈現在台灣經濟界救濟策〉中，陳逢源展現其好用數據作為分析依據的行文特色。陳逢源認為：1.台灣金融的預備金與借出金相比，前者不及後者的 3 分之 1，和內地近 1 比 1 的情況有著相當大的差別。同時，在缺乏金融流通力的情況下，更受到自治制的增稅、台灣電力會社與嘉南大圳等的影響，讓台灣民眾處於資金枯竭、重稅的痛苦境地。所以，2.陳逢源進而主張減輕稅金上的負擔，讓中產階級可以減納 30% 的賦稅以降低負擔；3.由於內地中央預算與台灣預算的差別，在比較下發現台灣人口僅為日本的 20 分之 1，但預算卻達 10 分之 1。況且，中央尚有維持陸、海軍的預算需求。如果提升辦事效能，則陳逢源以為可以減少 2、3 成的人事開銷。4.陳逢源以為應該將砂糖消費稅編入台灣的會計當中、以提高台灣的稅收。這方面，陳逢源認為以台灣的砂糖多為內地人食用的理由，忽略台灣人亦同樣消費日本內地所生產的物產，同時，如果總督府的統治目的不單單只是略奪，而更有啟發民智的必要的話，則透過這種方式讓台灣接受中央補貼，也是應然之事。5.陳逢源透過 1919 年、1920 年間砂糖價格上漲 3 至 4 倍，但原料採收價格僅有 50% 到 200% 的上漲，以為砂糖會社的股利分配實為剝削農民之所得，如果取消此制度，則台灣大多數農民才可以成為振興經濟的主要助力。6.陳逢源認為農民富裕有助於政府的稅收；同時，日本人口的增加也會在未來增加台灣米的重要性，所以在透過收入方面的計劃下，建議總督府導

<sup>363</sup>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頁 391。

向米作中心主義。7.文章最後則是認為台灣的經濟復甦必須寄望於基隆、淡水、鹿港等成為自由貿易港，並且以香港為例，認為台灣也可以有其一班的繁榮<sup>364</sup>。

由陳逢源與吳三連等人共同入選徵文的情況，可以發現僅僅畢業於國語學校的學歷並未限制陳逢源對殖民地經濟的分析與判斷。4人同樣論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台灣農村凋敝的情況，以及建議取消砂糖原料採集制、砂糖消費稅與蔗作偏重主義等<sup>365</sup>，代表台灣印刷媒體世代即便存在著學歷上的差異，仍然可以透過對於現實環境的考察，以及流通於台灣島內的相關書籍來弭平教育背景上的落差。陳逢源在這篇文章的第1、2項建議當中，主要的訴求事實上在於節流而非開源，是對於台灣總督府施政的批判，同時為台灣民眾的經濟負擔打抱不平。另外，這篇文章也透露出陳逢源將台灣視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一再批評日本總督府與日商資本的合作關係。更別說強調維護台灣傳統地主制的米作中心主義，以及寄望台灣成為自由貿易港的種種訴求，其實都與當時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政策大相逕庭。

當然，陳逢源此番論述忽略的是日本視台灣為殖民地的根本立場，卻也透露出陳逢源以台灣(人)利益為考量，爭取台灣人在政治方面外、經濟層面的自主與自治，與其在《台灣》中的許多政論文章，有著一定程度的呼應之處。《台灣民報》發行以後，陳逢源也經常性地發表經濟方面的相關文章。像〈東台灣的事情一班〉、〈台灣工業化的考察〉、〈日月潭電力消化問題〉、〈日本資本主義的高度化的台灣〉等等都屬於此類的作品。謝國興指出：陳逢源的經濟論述相當全面，包括了金解禁與再禁、工商產業的評論與建言、台灣的租佃問題、股票投資與證券交易所等種種面向<sup>366</sup>。

然而，本論文在此更關注的是陳逢源的財政自治論。1926年陳逢源發表了〈台灣的財政自治論〉一文，內容可說承繼了其於〈現在台灣經濟界救濟策〉所抱持的看法。陳逢源於文章中指出，台灣總督府的預算等同於殖民母國預算下的特別會計，是極端的中央集權主義。他同時列舉出英國治理澳洲、加拿大的獨立財政；與法國、荷蘭等管理部份殖民地的地方分權主義，作為底下批判日本殖民統治的開頭。他在文章中指出：因為權宜上的考量而採取集權財政制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台灣財政業已獨立、文化又持續向上發展的情況下，便必須考量到集權財政的弊端。首先，總督府的預算編列並沒有受到殖民地人民的監督；再者是帝國議會的議員與殖民地沒有利害的關係，無法詳細審查總督府的預算內容；另外，一旦殖民地與母國的利益有所衝突，殖民地人民不可能寄望帝國議員會替其喉舌、把守殖民地人民的權益。

<sup>364</sup> 陳逢源，〈現在台灣經濟界救濟策〉，《台灣》第3年12月號第9號（台北：東方出版社復刻，1973）。

<sup>365</sup> 周馥儀，〈開展公共領域·擊向糖業帝國主義〉（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7），頁41。

<sup>366</sup>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221-231。

因此，陳逢源認為對於已然覺醒的殖民地人民來說，集權財政已然是不可持續下去的「舊殿堂」。同時更介紹法國統治下阿爾及利亞的制度作為他山之石。追根究底來看的話，陳逢源認為倘若殖民地財政在沒有受到殖民母國支持之際，便應該是開始財政自治的時間點。而台灣自明治 37 (1904) 年開始財政獨立，每年並由海關稅、砂糖消費稅與其他內地商品的消費稅，提供內地數百萬元收入，卻連自己的預算開支都沒有辦法監督，可說是相當的不合理。是故，文章最後陳逢源以為應該要改造總督府的評議會，讓評議員得以用民選的方式產生，而不該僅僅只是將各州市街庄的施政預算讓官選的議員作形式上的審理<sup>367</sup>。

陳逢源兩年後發表的〈對地方自治制度改革的意見(一)〉<sup>368</sup>也可以看到他在改革地方自治制度方面的意見，由此可知，1920 年代陳逢源的政治立場與經濟論述其實是相互配合的，同時也與其於 1920 年代積極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先後擔任過第 3 回、第 7 回請願代表的政治行動有著彼此呼應的緊密關係。陳逢源的立論主要都建立在強調台灣本身已經付出了相當的義務，所以也應該擁有自治的權力；除此之外也更加證明了本論文中所謂「同人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三者結合作為文化抗日運動積極動能來源的說法。於是，當 1930 年代《台灣民報》更名為《台灣新民報》，而台灣文化抗日運動也已然解消、退縮的情況下，從大記者轉變為小記者的陳逢源在經濟論述上的立場是否也同樣地產生偏移，反映台灣印刷媒體世代在反抗動能減弱之際，逐漸地傾斜移轉，則就有待以下的篇幅來進行討論。

### 三、1930 年代的經濟論述：戰爭期中的「轉向」

1932 年起《台灣新民報》正式發行日刊，延續了自 1920 年代的台灣民報系刊物香火，同時也讓台灣人的印刷媒體刊物終於與日系資本的刊物處在相同位置的競爭關係。但是，在正面肯定《台灣新民報》時不應該輕易地將《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視為是完全相同的媒體，進而忽略了它們不論在出版週期、形式或內容上的明顯差異；除此之外，《台灣新民報》雖然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成員上有著一定程度地重疊關係，但是在政治立場以及與台灣一般民眾之間的關係也都已經有著相當的變化。《楊肇嘉回憶錄》中認為《台灣新民報》仍然保留了自《台灣民報》成立以來的「民族意識」<sup>369</sup>，但是就在隔了幾頁的內容當中，卻出現了使人不明究理的一段敘述：

台灣新民報的出現，可說是台人多年的希望如願以償，也可稱日人控制台

<sup>367</sup> 陳逢源，〈台灣的財政自治論〉，《台灣民報》1926 年 1 月 1 號第 86 號（台北：東方出版社復刻，1973）。

<sup>368</sup> 陳逢源，〈對地方自治制度改革的意見(一)〉，《台灣民報》1928 年 1 月 22 號第 192 號（台北：東方出版社復刻，1973）。

<sup>369</sup>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 427。

人的尺度放寬。然而，由全班的情勢看來，日本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帝國主義，開始對外侵略的時期，台灣為它的殖民地，有關經濟事項，都受其約束……<sup>370</sup>

雖然《台灣新民報》日刊網羅了十餘年來與《台灣民報》有關、有意為台灣民眾服務的優秀份子<sup>371</sup>，同時也是右派知識份子重新組織、再出發的象徵。但是，1931年2月台灣民眾黨才剛剛遭到總督府下令禁止。一旦考慮到總督府於當時才剛施行經濟方面的管制限縮，又怎麼可能接受《台灣新民報》成為更具批判力的宣傳工具？是故，《台灣新民報》的發行是否反映出政治環境上的變化，又是否存在著殖民地知識份子的「轉向」跡象，也就成為本論文在此試圖討論的重點。

一九三〇年代以降，「轉向」成為了日本本島普遍流行的名詞。在滿洲事變後民眾逐漸右傾與日本政府對於左翼人士的大規模逮捕、囚禁下，促使了大批「轉向者」的出現。鶴見俊輔在分析「轉向」的時提出「強制力的作用和自發性，是兩個不可或缺的層面<sup>372</sup>」。鹿野政直也同樣在關於「轉向」的討論當中，針對轉向的方式提出了如下的分類：「(一)完全放棄以往的立場，移到對級；(二)一步一步逐漸讓步，以倫理主義式的自我構築或獨特的美學救贖「背叛」的重傷；(三)改以虛無主義為世界觀的底層；(四)思想並沒有退卻，但是在行動中引退。<sup>373</sup>」不過，日本的轉向歷程與殖民地台灣的歷史情境間存在著一定的落差，1930年代台灣文化抗日運動方面的「轉向」，反倒更接近於「由原先在政治面向上的抗爭，逐漸轉型成單單以輿論來和日本人一較長短」。

李承機的研究指出：《台灣新民報》打破原來「御用三紙」的壟斷情況，不僅在報紙的「質」上求突破，同時也更強調讀者的「量」、即「大眾化」的訴求。1932年開始，完全由台灣人資本所組成的日刊新聞開始與日本人資本的新聞競爭，形成日刊新聞市場的「台灣人 VS 日本人」的對立情況。報刊獲准發行固然可以視為是總督府「言論開放」的政策成果，卻不能忽視由軍部所倡導的「非常時期」、新聞出版檢閱的尺度並沒有隨之放寬<sup>374</sup>。另外，由於《台灣新民報》後來改名為《興南新聞》，並持續發展到1944年才被總督府要求合併為《台灣新報》。所以，透過陳逢源於《台灣新民報》時期的經濟論述，其實也有助於考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自1930年代開始的「轉向」跡象

在今日《台灣新民報》的史料出土狀況不佳的情況之下，陳逢源的經濟論述

<sup>370</sup>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435。

<sup>371</sup>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434。

<sup>372</sup> 鶴見俊輔 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台北：行人，2008)，頁28。

<sup>373</sup> 鹿野政直 許佩賢譯《日本近代思想》(台北：五南，2008)，頁126。

<sup>374</sup> 換言之，總督府雖然在「量」的方面採取了較為寬鬆的管制，卻在「質」的方面予以管控。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2004)，頁219-220。

單行本更成為了今日考察當時《台灣新民報》內容的一條途徑。陳逢源自 1926 年開始除了兩次分別與許乃昌、蔣渭水就政治議題進行筆戰外，著作逐漸偏向於台灣經濟的各個面向(順帶一提的是，漢詩方面的創作也沒有間斷)。包括台灣的工業化、金融體制、電費、水果、農倉、稻米、蔗糖、芭蕉、鳳梨等文章，後來也分別結集出版。陳逢源的經濟論述越到日治時期末期就越散佈在《興南新聞》、《台灣經濟年報》、《台灣時報》、《台灣公論》、《台灣農會報》、《台灣產業組合時報》等報刊媒體<sup>375</sup>。顯示出其對於台灣輿論界與時俱增的影響力。

林易澄認為：陳逢源的經濟論述雖然隨著戰爭的發展而往往受到檢查，進而呈現出妥協與理想的嘗試<sup>376</sup>。但是在更先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時，陳逢源便隨即進行了一趟長達 50 天左右、橫越中國中北部以及滿洲、朝鮮的旅程。旅途中的遊記則在 1939 年時與 1934 年的南中國遊記和另外 3 篇出版前所寫的文章結集出版。所以，如果 1937 年中日戰爭被視為是台灣社會被納入戰時體制的第二階段，那麼陳逢源發表在《新支那素描》的三篇論述，便可以被視為是該時期陳逢源對於戰爭展開之後，台灣作為大日本帝國殖民地的一員究竟又要如何自處的思想反映。

首先，關於中國大陸受到戰火摧毀的部分，陳逢源認為：經濟的恢復，首要在治安方面的維持上，如何維持已經佔領的都市、鐵路與交通線的安全，再逐漸的由市內擴展到村落，是無法短時間內解決但必要處理的問題<sup>377</sup>；再者是，不論國民黨方面如何使用游擊戰略，陳逢源以為必須快點摧毀蔣政權與共產黨，以扶持有力的中央親日政權<sup>378</sup>。況且，這次戰爭雖然不應該拖長，但卻不僅僅只是與中國單方面的作戰，同情、援助蔣政權的外國勢力也是必須考量到的因素。如果想要找到解決過去極力宣傳的反日民族意識，則日本方面與佔領北京、南京後所分別成立的臨時、維新兩政府，如何在統治方面相互合作、在人才的選擇上找到信望足以領導中國大眾的領袖<sup>379</sup>，不僅僅需要與中國的知識份子取得合作，更要在意識型態方面找到足以取代被「工具化」為反日思想的三民主義的新思想體系——即利用中國的知識份子階級來排除過往的民族主義，以「東亞協同體」來予以取代<sup>380</sup>。

在呼應日本國策的同時，陳逢源也提出對於日本統治者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它包括了對外宣明中國的完全獨立<sup>381</sup>；以孔子思想重建東亞道德的新意識型態<sup>382</sup>；在經濟的重建上以日本、中國的共同經營為原則<sup>383</sup>；在人員的任用上必須真

375 陳逢源，《台灣經濟と農業問題》(台北：萬出版社，1944)。

376 林易澄，〈二戰時期陳逢源的經濟構想——統制經濟下的台灣道路(四)〉，請參考「台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jw!luduCo2SGHRYWizLEAu0T/>，不著頁碼。

377 陳逢源，《新支那素描》(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9)，頁 3。

378 陳逢源，《新支那素描》(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9)，頁 4。

379 陳逢源，《新支那素描》(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9)，頁 11。

380 陳逢源，《新支那素描》，頁 13。

381 陳逢源，《新支那素描》，頁 14。

382 陳逢源，《新支那素描》，頁 15。

正地符合共存共榮的口號等等<sup>384</sup>。務求就 1.眾智的聚集<sup>385</sup>；2.治安的維持<sup>386</sup>來尋求新中國建設的主要方向<sup>387</sup>。如此，陳逢源認為才能夠同時提供長期應戰的軍備需求，以及另一方面提供長期建設下所需要的資金與物資。

就如同陳逢源一方面希望戰爭快點結束，一方面又認為戰爭無法很快結束的矛盾一般。上述陳逢源各種對於日本政府的諫言，事實上除了最後在總動員法下的經濟再整編政策<sup>388</sup>有具體實施外，都沒有在行動上或效果上有很大的斬獲。日本政府既無法快速的消滅國、共兩黨，也無法讓中國人民相信中國在日本的佔領下會得到完全的獨立、更無法建立一個有能力收攬民心的新中國政府。然而，必須注意的地方在於：即便陳逢源在這三篇文章當中主要討論的是中日戰爭後的中國社會，並且從現實面去強調：唯有讓佔領區的政治、經濟利益與帝國政府勾連，才能夠達到真正共存共榮的理想境地。但是不能忽略的是，陳逢源在字裡行間隱藏的其實也是試圖迴避所謂的民族口號，進一步地透過「無民族色彩」的論述基調，保障台灣本地領導菁英的政治與經濟利益<sup>389</sup>。

陳逢源由本來殖民地政治經濟自治論轉變為將殖民地台灣與大日本帝國視為相同「生命共同體」的精神「轉向」，其實也可以透過「利益」觀點進行思考。倘若我們排除民族主義式的論述，則陳逢源於 1930 年代以降發表的論述，其實也意味著這群印刷媒體世代在客觀環境的變動下，僅能透過有限的結構能力以維護他們的「利益」，保持他們有別於日本人/總督府/大日本帝國的根本訴求。縱然這個堅持伴隨著戰事的吃緊而越加地難以維持，但印刷媒體(《台灣新民報》、《興南新聞》)作為這群印刷媒體世代們的有力工具，卻至少一直維持到 1944 年才真正地遭到合併，消失在台灣歷史的舞台。總而言之，脫離政治運動、小記者身份的回歸終究讓陳逢源無力保持原本非官方的意識型態立場，透過他在糖業、米業等的相關經濟論述中可以得知，他在 1920 年代強調殖民地自治的人道主義已經產生變化，取而代之的是以利益為導向、將殖民地台灣與大日本帝國透過戰爭此一要素給緊緊捆綁。是故，即便陳逢源在諸如食糧增產、船腹節約、民生工業物資自給等口號往往隱藏了台灣工業化、強化本地資本、自主新農業團體、米作優先的預設立場<sup>390</sup>，不能說全然背叛了 1920 年代以來的堅持的論述立場；但是這種任由總督府牽制、宰割的情況，卻毋寧是在 1932 年《台灣新民報》於政治組織瓦解、政治立場退縮下成立，便已決定了它接下來十餘年的最終結局。

---

<sup>383</sup> 陳逢源，《新支那素描》，頁 17。

<sup>384</sup> 陳逢源，《新支那素描》，頁 18。

<sup>385</sup> 陳逢源，《新支那素描》，頁 20。

<sup>386</sup> 陳逢源，《新支那素描》，頁 21。

<sup>387</sup> 即 1.交通恢復；2.資源開發；3.安居樂業；陳逢源，《新支那素描》，頁 19。

<sup>388</sup> 陳逢源，《新支那素描》，頁 23。

<sup>389</sup> 林易澄〈二戰時期陳逢源的經濟構想——統制經濟下的台灣道路(四)〉，請參考「台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jw!uduCo2SGHRYWIzLEAu0T/>，不著頁碼。

<sup>390</sup> 林易澄〈二戰時期陳逢源的經濟構想——統制經濟下的台灣道路(四)〉，請參考「台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jw!uduCo2SGHRYWIzLEAu0T/>，不著頁碼。

不過，透過《台灣新民報》的發展軌跡，其實也更進一步的強化了使用印刷媒體作為世代特徵的論述依據。首先，當社會運動逐漸退縮、台灣文化抗日運動分崩瓦解之際，原先「同人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的結構只剩下同人團體在政治以外的領域活動運作，印刷媒體刊物卻反而逆向地持續蓬勃發展。因此，使用印刷媒體作為此一世代的辨識特徵，便不僅可以上溯至台灣民眾的知識來源，同時也可以關注其自接受到生產印刷媒體刊物的發展脈絡，避免以往使用親日或者是抗日與否的二元對立觀點。除此之外，透過台灣民眾與印刷媒體刊物的互動內容，事實上也可以斷定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與清帝國時期的台灣讀書人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具備自我成為一個世代的特徵。

## 第五節、小結

本論文於第四章中透過陳逢源個人的生命經歷，展演台灣印刷媒體世代成員的形成與發展。受到台灣教育多軌化的情況所影響，包括傳統的書房教育與殖民地現代教育等對於陳逢源的知識養成都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進而讓他過去分別被投以了傳統文人或者是知識份子的個人身份。書房教育經驗代表台灣傳統社會在殖民地統治下的頑固依存，而陳逢源持續創作終生的漢詩，則直接反映了書房教育與漢詩社的影響與薰陶。然而，如同陳逢源等印刷媒體世代的成員往往具備著漢語與日文兩種語文能力，國語學校等殖民地現代教育不單單只具備著馴化的功能，其實也存在著啟迪民智的作用。是故，陳逢源雖然沒有到日本內地就讀高等教育，但在台灣作為文化交疊區域的情況之下，仍然透過當時普遍流通於東亞的印刷媒體刊物而讓自己具備著相當程度的現代知識。

當時的台灣社會其實便是一個共同的文化場域，不管過去被視為是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的台灣民眾，他們相當程度上都是透過印刷媒體刊物去共享一個既被限制、又被開發的文化視野。現代印刷的出現並不單單只對現代文明的傳播有所助益，事實上它也讓傳統的文化典籍得以迅速地擴大它的閱讀群眾，讓年輕的台灣民眾與他們的父祖共享同樣的文化資源。所以，利用參與文化抗日運動與否來進行區別傳統文人或知識份子的方式也就因而顯得過於粗糙，參與文化抗日運動與否事實上和具不具備現代文化啟蒙意識有著一定程度的差距。或許日本殖民統治無法處理殖民地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是刺激台灣民眾參與文化抗日運動的因素之一，但台灣民眾從具備文化、文明認知到最後起身反抗的過程當中，其實存在著許多不確定的生命選擇或機遇偶然。

陳逢源於 1920 年代起投身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報》、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經歷，反應出「同人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三者作為台灣民眾文化抗日運動時能量來源的歷史事實。在武力反抗趨於零星、沉寂的情況下，進而讓印刷媒體刊物成為台灣民眾在組成同人團體、乃至於進行社會運動時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但是，《台灣民報》本身所具備的政治功能，並不能抹滅其他台灣



人印刷媒體刊物如《台灣文藝叢誌》、《台灣詩薈》、《詩報》等在凝聚印刷媒體世代世代成員、台灣人集體意識的歷史意義。

倘若印刷媒體世代成員們要進行的是諸如文化抗日的政治運動，那麼便更需要透過印刷媒體刊物的宣傳功能，以達到其凝聚我群以對抗他族的理想與目標。透過陳逢源 1920 年代起發表的諸多論述可以得知：1.陳逢源與印刷媒體世代的成員們不再過分地仰賴人與人的親身接觸，而是以印刷媒體作為意見交流時的主要工具；2.他們擁有的知識基礎不再過於偏向道德層面的哲學智慧，反而開始存在著強烈的同時性與現實性特徵；3.即便總督府對於印刷媒體的出版與進口上有所限制，但圖書的大量生產、流通、普及還是提供殖民地人民更為大量的圖書資源，進而讓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發展其非官方的意識型態與知識、認知；4.台灣印刷媒體世代在脫離過去偏向接受層次的閱讀面之際，於創作出版的同時往往也更直接地去考慮到讀者、消費者的可能反應，甚至於在書寫當下便預設了讀者的存在，以達到彼此溝通或尋求大眾支持的可能。

總而言之，即便「同人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的結構崩壞終究讓文化抗日運動退縮、瓦解，但是從陳逢源自 1930 年代以後反而屢屢出版個人著作的單行本，以及台灣民眾持續參與文藝性質的同人組織、出版刊物的情況看來，還是可以確定印刷媒體本身在當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就是說，假如台灣印刷媒體世代成員參與文化抗日運動是自為世代在時代環境的條件允許下的延伸，則 1930 年代之後因為文化抗日運動的退卻、戰爭期的壓力而逐漸向軍國主義傾斜的這個過程，便不見得會對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形成有著直接的負面影響。整個日治時期在受教育人口不斷提高之下，便提供了印刷媒體世代自在世代持續擴大的成員來源；而印刷媒體世代自為世代則是直到 1944 年才因為總督府的新聞管制政策而一度斷絕，卻又於戰後不久便迅速地恢復生氣<sup>391</sup>。因此，倘若我們並不單純使用政治或民族的角度，進而採取社會、文化的觀看視野，那麼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概念其實也反映出：台灣民眾對於知識接受與創造過程方面已經與清帝國統治時期下的台灣社會有著極大的不同，存在著其獨有的特定歷史與世代特徵。除此之外，更因為終戰不久台灣便發生了 228 事件，又國民政府隨即遷台，都讓台灣民眾與印刷媒體的關係產生了極大的變革，無法上溯至戰前日本統治時期的歷史脈絡，進而也讓日治時期參與印刷媒體刊物運作的台灣人等成為一個特殊的世代，讓本論文的討論更具備了歷史特殊性的研究價值。

---

<sup>391</sup> 徐秀慧，《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頁 108。

## 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嘗試回顧台灣學研究中經常被使用的兩個詞彙：「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進而重新以卡爾·曼海姆的世代概念予以爬梳，提出「台灣印刷媒體世代」一詞作為未來進行日治時期台灣學研究的新思考端點。正因為時代的定義往往有所更迭，世代也與生物年齡或社會環境有所牽扯，所以當世代概念被運用以進行討論之際，必須留意的往往是世代與時代之間的關連，以及世代自時代中取得的、其之所以能夠形成的世代特徵。

在借用卡爾·曼海姆的世代概念與參考蕭阿勤的研究方法以後，本論文嘗試就世代位置、實存世代與世代單位的觀點，論述日治時期台灣讀書人口自成單一世代的可能性，進而提出：所謂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是指 1895 年以降，受到現代印刷媒體生產、傳播，以及讀書裝置、殖民地現代化教育、傳統書房教育、留學經驗等教育環境影響下，具備閱讀、書寫單一或多種文字的基本能力，處在相同文化世代的台灣人士(自在世代)；同時，在考量到自在世代與自為世代的差別下，更為強調始自 1919 年以降，逐漸透過發行報刊雜誌介入輿論，取得介入公共空間能力的部分台灣人文化菁英(自為世代)。

本文以為：過去隱藏在「知識份子/抗日/現代 VS. 傳統文人/親日/傳統」二元對立認知背後的，其實是來自於抵殖民的民族主義立場。然而，就在實際考察其中成員身份的重疊，以及歷史的交雜以後，可以發現他們其實都經歷了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也同樣受到了來自海上運輸網絡與島內縱貫鐵路交通網絡成形的直接影響，並且在殖民地現代化教育的興設、內地留學風氣的普及、印刷媒體的流通、社會教育與讀書裝置的設立等因素影響下，開始處在相同的文化場域與世代位置當中。

這些籠罩在相同文化場域與世代位置的台灣人起初是透過間接參與的方式與印刷媒體刊物產生連結，他們或者是單純的讀者，除此之外還包括了那些任職於日系資本報刊中的漢文欄記者、偶爾投稿於《台灣教育會雜誌》的台灣人與國語學校學生，這些起初接受現代印刷媒體刊物、或以間接方式附庸於日系報刊的台灣人當時已經吻合印刷媒體世代自在世代的成員特徵，直至 1919 年《台灣文藝叢誌》創刊以降，他們與其他的台灣人才逐漸地透過成立屬於台灣人自己的印刷媒體刊物，進而轉型成印刷媒體世代的自為世代。

印刷媒體世代的形成與日本總督府對台灣傳統社會的依存有著相當程度的關係，這些自清帝國時期便存在於台灣社會的士紳及其後代，一方面透過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現代化教育、印刷媒體刊物、讀書裝置、社會教育等取得了遠較於過去豐沛的圖書資源，進而被籠罩在相同的文化場域當中。因為受到了「文化交疊區域」的影響，台灣地區圖書來源的「多元性」與「多向性」的特徵，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台灣印刷媒體世代在認知與認同方面的歧異特質。換言之，正因為

使用語文、文類與政治傾向等都缺乏一條明顯的界線，所以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單位之間並無法單純地以生物年齡、教育背景或政治認同來進行分類，以解釋他們之間諸如分立、聯合與對抗的種種歷史現象。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1920 年代起台灣民眾不分語文、文類或政治傾向等等的差別，都已經充分意識到印刷媒體刊物的宣傳功能，並企圖透過其來達成自己的理想與目標。換言之，在掌握啟蒙知識與印刷技術以後，爭取大眾支持成為了台灣印刷媒體世代之間的共同理想與目標，進而呈現出所謂的分立、聯合與對抗現象。世代成員透過過去存在於台灣社會的結社慣習，配合與殖民統治一併而來的印刷媒體刊物、現代啟蒙知識，有效地發展出他們非官方、抵殖民論述的公共論述，演變成爲 1920 年代以降的文化抗日運動。

在後來的研究與認識中，世代成員間抗日或親日的這項差異被膨脹、擴大，進而掩蓋了他們同樣積極接受現代啟蒙知識、參與印刷媒體刊物的共同特質。在「同人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的合作狀態下，世代成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行動動能，進而凝聚有異於總督府的官方論述；然而，這個聯合陣線最後還是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解消，進而也讓原本處在文化抗日陣線的世代成員們開始轉向，調整自己的言論立場或行動姿態。

透過研究個案陳逢源的生命經歷，可以理解當時台灣人文化菁英的成長教育歷程確實處在所謂「文化交疊地域」的狀況當中，所以陳逢源一方面有漢學教育、漢詩文的背景，又透過國語學校得到關於政治、經濟等現代知識的文明啟蒙。陳逢源先是間接投稿於日資刊物，後來則在參與文化抗日運動陣營時，成爲台灣民報系刊物的專職記者。陳逢源由自在世代轉變為自為世代的過程，體現了「同人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較具行動動能的相關論述，但也因為如此，所以當文化抗日運動逐漸解消、台灣新民報發行日刊、陳逢源擔任專職記者以降，便也明顯可以發現其在身份與言論上的退怯、妥協。

本文有別於以往著眼於作家、文本與讀者的文學研究，從讀者如何介入印刷媒體的運作、發行，從而成爲作者、編輯的集體經驗出發，主要是利用世代理論與既有論述的歷史認識論進行對話；再以個案為例，初步理清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形成過程與具體樣貌。由於受限於學力與收集的資料，尚且無力論及印刷媒體世代的全體發展樣貌。但是，透過印刷媒體世代這個概念應該有助於未來後續研究探討：1. 世代成員接受與參與印刷媒體刊物的共同經驗；2. 世代成員因為印刷媒體刊物所形成的人際網絡(甚至是日台之間的交遊關係)；3. 世代單位與世代單位之間的分立、結盟與對抗關係；4. 世代單位與文化抗日運動的連結；5. 印刷媒體世代與當時台灣社會、其他台灣人的互動情形。總而言之，則是希望能夠爲當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提供另外一些思考與方法。

## 參考書目

### 壹、陳逢源著作

陳逢源，《台灣經濟問題の特質と批判》（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3）。

陳逢源，《台灣經濟問題の特質と批判》（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3）。

陳逢源，《新台灣經濟論》（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7）。

陳逢源，《台灣經濟と農業問題》（台北：萬出版社，1944）。

陳逢源，《新支那素描》（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49）。

陳逢源，《雨窗墨滴》（台北：台灣藝術社，1942）。

陳逢源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陳逢源先生紀念集》，出版項不明。

### 貳、相關研究著作

李貞瑤，《陳逢源之漢詩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

黃頌顯編，《陳逢源選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台北：允晨，2002）。

### 參、基本史料

#### （一）、日治時期報刊、雜誌、書籍

中島利郎編，《『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總合目錄(全兩卷)》（東京：綠蔭書房，2000）。

台灣教育會，《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南天書局復刻，1995）。

台灣新民報社，《台灣人士鑑》（東京：湘南堂 復刻，1986）。

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台灣人士鑑》（東京：湘南堂 復刻，1986）。

台灣雜誌社，《台灣》（台北：東方 復刻，1973）。

台灣雜誌社，《台灣民報》（台北：東方 復刻，1973）。

台灣青年雜誌社，《台灣青年》（台北：東方 復刻，1973）。

興南新聞社，《台灣人士鑑》(東京：湘南堂 復刻，1986)。

#### 肆、出版書籍

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譯，《創造歷史》(台北：群學，2007)。

C. Wright Mills 著，陳強、張永強譯《社會學的想像力》(北京：三聯，2005)。

George W. Barclay (1954),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in Taiwan*. Princeton University.

John Man 著，樂為良譯，《古騰堡革命》(台北：商周，2004)。

Mannheim Karl,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Paul Kecskemeti.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1984),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Wohl, Robert (1979), *The Generation of 191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2005)。

文訊雜誌社編，《記憶裡的幽香》(台北：文訊雜誌社，2007)。

王天濱，《台灣報業史》(台北：亞太圖書，2003)。

王天濱，《台灣新聞傳播史》(台北：亞太圖書，2002)。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台北：聯經，1999)。

王詩琅譯注，《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稻鄉，1988)。

布洛克，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台北：遠流，2004)。

矢內原忠雄，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台灣史料中心，2004)。

安德森著 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台北：時報出版，1999年)。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1992)。

吳密察，《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鄉，2006)。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台北：自立報系，1991)。

呂紹理，《展示台灣》(台北：麥田，2005)。

- 李丁讚，《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2004)。
- 李世偉，《日據時代台灣儒教結社與活動》(台北：文津，1999)。
- 李永熾，《日本的近代化與知識份子》(台北：水牛，1991)。
- 李永熾，《日本近代思想論文集》(台北：稻鄉，1998)。
- 李明水，《台灣雜誌事業發展史 重修台灣省通誌》(南投：台灣省政府，1986)。
- 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 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
- 李園會，《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制度》(台北：南天書局，)。
- 卓克華，《清代台灣行郊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稻鄉，1989)。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台北：允晨，2003)。
- 彼得·柏克著 賈士蘅譯，《知識社會史》(台北：麥田，2003)。
-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台原，1998)。
- 林偉盛，《羅漢腳》(台北：自立晚報，1993)。
- 林淑慧，《台灣清治時期散文的文化軌跡》(台北：學生書局，2007)。
-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台北：自立，1992)。
- 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台北：允晨，1999)。
-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台北：聯經，2006)。
-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係之研究》(台北：稻鄉，1996)。
-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台北：全華科技，2004)。
- 哈伯馬斯，曹衛東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台北：聯經，2002)。
-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高雄：春暉，2000)。
- 若林正文著，台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2007)。
- 翁仕杰，《台灣民變的轉型：歷史宿命與超越》(台北：自立晚報，1994)。
- 翁佳音，《台灣人武裝抗日史研究》(台北：稻鄉，2007)。
- 翁佳音，《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台北：稻鄉，2007)。

翁佳音譯注，《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稻鄉，1992)。

翁聖峯，《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2006)。

荊子馨 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台北：麥田，2006)。

張炎憲、李筱峯、莊永明編，《台灣近代名人誌》(台北：自立晚報，1987)。

張漢裕編，《蔡培火全集》(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2000)。

張錦宗、黃錦樹合編，《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2006)。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台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台北：稻鄉，2006)。

許世楷著，李明峻、魏郁君譯，《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台北：玉山社，2006)。

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台北：遠流，2005)。

許雪姬，《北京的辮子》(台北：自立晚報，1993)。

許雪姬，《板橋林家：林平侯父子傳》(南投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

許雪姬，《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93)。

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2003)。

陳其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2006)。

陳芳明，《左翼台灣》(台北：麥田，1998)。

陳芳明，《後殖民台灣》(台北：麥田，2002)。

陳芳明，《殖民地台灣》(台北：麥田，1998)。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台北：麥田，2004)。

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台北：前衛，1988)。

陳俐甫，《日治時期台灣政治運動之研究》(台北：稻鄉，1996)。

陳建忠，《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台北：五南，2004)。

陳建忠等合著，《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2007)。

陳昭瑛，《台灣與傳統文化》(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陳昭瑛，《台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台北：正中書局，2000)。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台北：麥田，2006)。

- 陳紹馨，《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1979)。
- 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台北：遠流，2008)。
- 鹿野政直著 許佩賢譯，《日本近代思想》(台北：五南，2008)。
- 麥克魯漢著 賴盈滿譯，《古騰堡星系》(台北：貓頭鷹，2008)。
- 麥斯基爾著，王淑瑋譯，《霧峰林家》(台北：文鏡文化，1986)。
-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1998)。
-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1996)。
-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台北：前衛，2004)。
- 黃昭堂著，廖為智譯，《台灣民主國研究》(台北：前衛，2006)。
- 黃美娥，《古典台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
-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台北：麥田，2004)。
- 黃通，張宗漢，李昌權編，《日據時代台灣之財政》(台北：聯經，1987)。
- 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市：台灣文獻館，2004)。
-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台北：自立晚報，1987)。
- 黃富三，《霧峯林家的中挫(1864-1885年)》(台北：自立晚報，1992)。
- 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台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11)。
- 楊永智，《明清時期台南出版史》(台北：學生書局，2007)。
-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台北市：三民，1970)。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1987)。
-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中：晨星，2000)。
- 詹雅能，《明志書院沿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2002)。
-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 駒込武，《植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2002)。
- 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問，吳美慧等記錄，《曹永和院士訪問記錄》(台北：中研院台史所，2010)。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

戴炎輝，《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經，2005)。

謝春木，〈新興中國見聞記〉收錄於《台灣人は斯く觀る》(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0)。

謝國興，《官逼民反》(台北：自立晚報，1993)。

簡炯仁，《台灣民眾黨》(台北：稻鄉，2001)。

藤井省三著，張季琳譯，《台灣文學這一百年》(台北：麥田，2004)。

鶴見俊輔，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台北：行人，2008)。

#### 伍、研討會論文集暨論文

《台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台北：播種者，2000)。

《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家文學館，2003)。

《跨界的台灣史研究》(台北：播種者，2004)。

《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文學館，2006)。

《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場域》(台南：國家文學館，2006)。

《台灣文學的東亞思考》(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

施懿琳，〈試析日治時期南都詩人陳逢源及其詩——兼談「二世文人」的類型與作品特色〉，「2000年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聖塔芭芭拉大學，美國加州。

秦賢次，〈張我軍及其同時代的北京台灣留學生〉，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漂泊與鄉土——張我軍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建會出版，1996)。

#### 陸、學位論文

川路祥代，《殖民地台灣文化統合與台灣傳統儒學社會》(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2)。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2004)。

周馥儀，《開展公共領域・擊向糖業帝國主義》(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2007)。

洪桂己，《台灣報業史的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57)。

劉妮玲，《清代台灣民變研究》(台北：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2)。

賴秀峰，《日據時代台灣雜誌事業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

謝明如，《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7)。

### 柒、期刊論文

CHANG HAN-YU AND RAMON H. MYERS, Japanese 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Taiwan, 1895-1906: A Case of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2-4:433-449.

吳文星，〈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流動〉，《台灣文獻》51卷6期，2000。

吳文星，〈日據初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肆應與變動〉，《(師大)歷史學報》15期，1987。

吳文星，〈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16卷3期，1978。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書房教育之再檢討〉，《思與言》26卷1期，1988。

巫永福〈台灣文學與中央書局〉，《台灣文藝》111期，1988.5-6。

柯志明，〈社會學家們，回來作歷史研究吧！〉，《台灣社會學通訊》43期，關於本文，可另外參考柯志明〈序文〉，《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3)。

柯志明，〈歷史的轉向：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台灣社會學》第10期，2005。

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台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台灣史研究》第14卷第2期。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7年6月。

許達然，〈十八及十九世紀台灣民變和社會結構〉，《台灣文獻》第51卷第2期，2000。

陳文媛〈台灣書房教育における教育勅語の実施〉，收錄於《景文學報》17卷1

期，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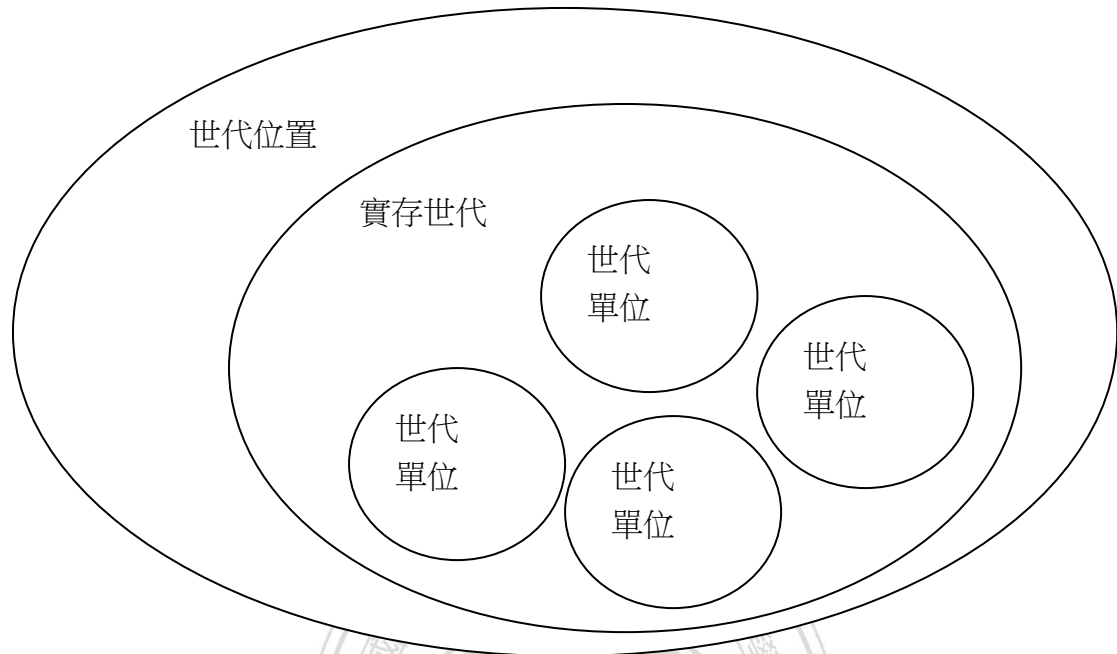
陳志豪，〈台灣歷史分期的省思〉，收錄於《史匯》VII，2003。

陳建宏，〈如何界定台灣歷史的分期：以台灣地區各大學歷史所的台灣史碩士論文為探討中心——1952-2002〉，《史匯》VII，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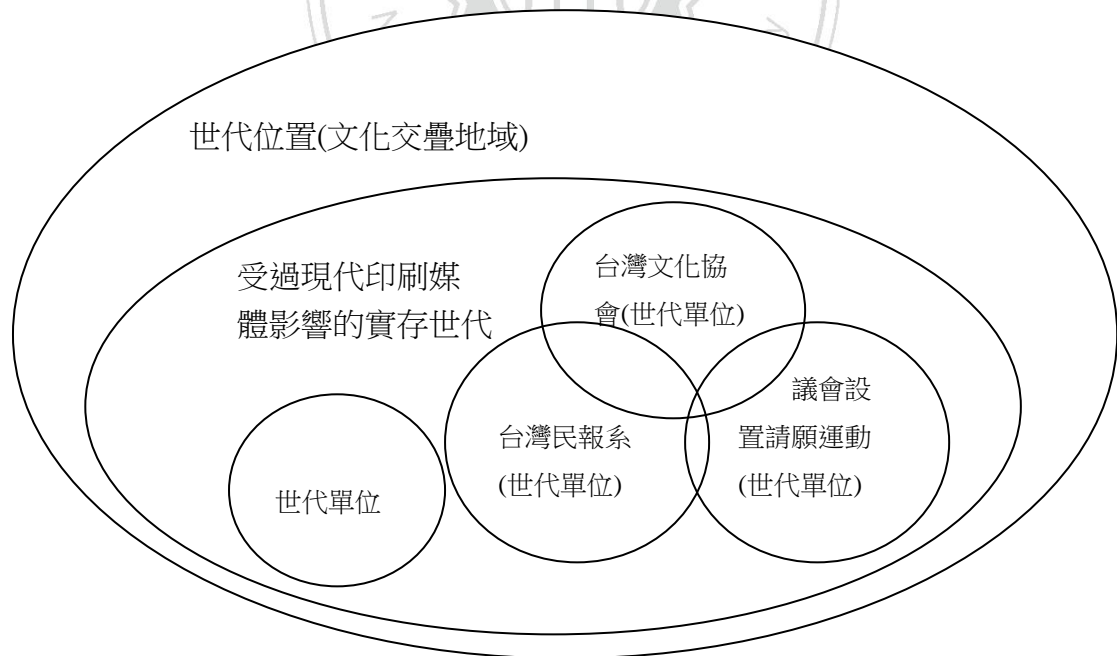


附錄：

圖一：曼海姆的世代概念與理論示意圖<sup>392</sup>



圖二：曼海姆概念下日治時期 1920 年代台灣印刷媒體世代



<sup>392</sup> 轉引自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頁 20。